

國民黨與進步黨的比較研究

張 玉 法

- 一、前 言
- 二、政黨領袖
 - (1) 國民黨
 - (2) 進步黨
- 三、組織與運動
 - (1) 國民黨
 - (2) 進步黨
- 四、地方勢力
 - (1) 華 南
 - (2) 華 中
 - (3) 華 北
 - (4) 東三省與新疆
- 五、結 論

一、前 言

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民國元、二年）年間，中國試行西方式的民主，政黨林立。在國會中對立者，曾有兩大政黨，一為國民黨，由清季的革命團體同盟會改組而成，成立於一九一二（民國元年）年八月，到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十一月被政府解散；一為進步黨，主由清季的立憲派和官僚派人組合而成，成立於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五月，到一九一四（民國三年）年三月仍繼續活動^①，其後洪憲帝

^① 張玉法「民初國會中的保守派政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八期頁五二。

制運動起，蕭散。

國民黨為激進派的政黨，大體與政府對立；進步黨為保守派的政黨，在洪憲帝制運動興起前，大體站在維護政府的立場。這兩個政黨所以呈現顯明的對比，與政黨領袖、黨綱、黨員均有密切的關係，兩黨在組織、宣傳和運動的方式上也不一樣。此處即就這些方面作比較研究，俾能了解國民、進步兩黨的本質及其政治行爲。

二、政黨領袖

政黨的成立，雖有種種要素，其最大關鍵，在於有全黨崇信的領袖，能指揮號召，以喚起一黨的精神，而發縱指示之^②。所以探研政黨組織，當首論政黨領袖。

(1) 國民黨

國民黨的理事長為孫中山。孫為革命時期的領袖，武昌革命後，因種種原因，把臨時大總統的位置讓給袁世凱，退而在野，謀盡力於實業，無意於從事政黨活動。一九二二年八月成立的國民黨是黃興和宋教仁兩人運動而成，宋教仁盡力尤多。宋教仁欲以革命派的力量，網羅各方面的支持者，與袁世凱政府和平競爭政權。黃興對宋教仁的想法與做法力加支持，以為一切舊勢力，只要加入國民黨，就可以改頭換面，成為革命的忠實擁護者。此處以孫中山、黃興、宋教仁三人為國民黨的領袖人物，他們也是國民黨的九位理事中，得票最多的三人：孫中山一千一百三十票，黃興一千零七十九票，宋教仁九百十九票^③。

孫中山 孫中山，名文，號逸仙，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旅居日本時，取名中山樵，世稱中山先生。廣東香山縣人，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生，世業農。早年求學於檀香山、廣州、香港等地，一八九二年（光緒十八年）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kong），富新思想，時思改革國政，與鄭士良、陸中桂、尤列、陳少白相結，謀革命。時清廷方事自強，但僅效習西方科技，孫頗不謂然。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一月，孫因經營廣州東西藥局失敗，回鄉與家人團聚，並草上直督李鴻章書稿。之後赴香港，與陳少白斟酌書

^② 黃遠庸「籌黨論」，「民國經世文編」第一冊頁一七七下。

^③ 張玉法「民初國會中的激進派政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七期，頁四五九。

稿字句，謂「吾輩革命有二途徑，一爲中央革命，一爲地方革命，如此項條陳得鴻章接納，則借此進身，可以實行中央革命，較地方革命爲事半功倍」，少白亦以爲然^④。

其後，孫偕陸中桂北游天津，上書李鴻章，作爲和平變革國政的第一步，書中有云：

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砲利，墨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⑤。

時中日戰雲密布，李鴻章無暇思考變更國政之事。孫原欲以和平方法，逐漸促使清廷「改行立憲政體，以代專制及腐敗的政治」，但因意見未被接納，乃轉而實行武力革命。事後他曾昭告世人：「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⑥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次年二月十八日設興中會總機關於香港。興中會在表面上是以「振興中華，維持國體」爲宗旨，持改良主義，但其「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秘密誓詞，則完全表現了民族革命和民權革命的決心^⑦。此後孫遊歷歐日，擴張會務，民生主義的思想亦逐漸形成。

從孫中山早年的談話和宣傳文件看來，孫重視民權革命和社會革命（民生主義），並不特別強調民族革命。一八九六年冬他在「倫敦被難記」中對清朝的專制大加非議，他說：

至中國現行政治，可以數語概括之曰，無論爲朝廷之事，爲國民之事，甚至爲地方之事，百姓均無發言或與聞之權。其身爲官吏者，操有審判之全權，人民生命受冤枉，無所籲訴^⑧。

次年八月他抵日本，對宮崎寅藏談話，特別標出共和主義，他說：

④ 孫中山在「上李鴻章書」中說：「文之先，躬耕數代，文於樹藝牧畜諸端，耳濡目染，洞悉奧竅。」又在「創立農學會徵求同志書」中說：「某也，農家子也，生於畝畝，早知稼穡之艱難。」見唐振楚編「國父書信選集」頁十四、十六。與陳少白對話，見馮自由「中國革命二十六年組織史」第八年，甲午。

⑤ 「國父全集」第五集頁一。

⑥ 「張溥泉先生全集補編」頁十八「中國國民黨黨史概要」引「倫敦被難記」。

⑦ 同上，頁十九～二十。

⑧ 同上，頁十一～十二。

余以人羣自治爲政治之極則，故於政治之精神，執共和主義。……共和政治不僅爲政體之極則，且適合於中國國民，而又有革命上之便利者也^⑨。

其後，康有爲、梁啟超推動變法失敗，逃到日本，孫謀與合作，作更積極之舉。梁一度有合作之意，嗣爲康所尼，轉肆力於君主立憲之鼓吹和運動，孫則繼續推動民權革命和社會革命。

關於民權革命，據一九〇〇年（光緒廿六年）孫中山致港督書，是以美國的制度爲藍圖，書中有云：

於都內立一中央政府以總其成，於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資分理。所謂中央政府者，舉民望所歸之人爲之首，統轄水陸各軍，宰理交涉事務，惟其主權，仍在憲法權限之內。設立議會，由各省貢士若干各以爲議員，所有該省之一切政治，徵收正供，皆有全權自理，不受中央政府遙制。惟於年中所入之款，按經撥解中央政府，以爲清洋債、供軍額，及宮中府中費用。省內之民兵隊及警察部，俱歸自治政府節制。以本省人爲本省官，然必由省議會公舉。至於會內之代議士，本由民間選定，惟新定之始，法未大備，暫由自治政府擇之，俟至若干年，始歸民間選舉^⑩。

一九〇三年（光緒廿九年）十二月三日，孫在檀香山荷梯厘街戲院演說，亦明白宣佈仿行美國之制，他說：

我們必須傾覆滿洲政府，建設民國，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國，選舉總統，廢除專制，實行共和^⑪。

這些是同盟會成立以前，孫中山對民權革命的一些主張。

關於社會革命，思想發萌在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間。據孫中山追述，一八九六年（光緒廿二年）冬倫敦蒙難之後，暫留歐洲考察政治，即以歐洲民權發達，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即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⑫。不過，孫何時將民生主義正式傳給革命同志，尚無定說，據何香凝的回憶，「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誓詞，最早於一九〇二年（光緒廿八年）河內興中會成立時採行^⑬；馮自由則謂此一誓詞採行於一九〇三年七月在日本

⑨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十九～二十。

⑩ 同上，頁三一。

⑪ 「國父年譜」（上）頁一五四引。

⑫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十八～十九

⑬ 引見 Bernadette Li, "The Origin of Chinese Marxism," Presented at University Seminar on Modern East Asia: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October 29, 1969, P.10.

青山開辦軍事學校時¹⁴。此一誓詞，孫中山於一九〇四年改組美洲致公堂時亦加使用，一九〇五年同盟會成立時，正式採為同盟會的誓詞。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革命思想，形成於興中會後期，部分革命同志願意全部接受，但也有部分同志不願意全部接受。譬如在同盟會成立時，有的與會人士抱狹隘的排滿主義，主張用「對滿同盟會」的名義，孫云：「革命之宗旨，不專在排滿，當與廢除專制，創造共和，並行不悖。」乃定名為「中國同盟會」。又有人要求取消誓詞中的「平均地權」一節，經孫詳加辯解，始獲通過¹⁵。雖然如此，從日後的文獻看來，許多革命同志並不完全堅守三民主義。譬如在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間，一度與同盟會聯合的光復會又與同盟會分途發展，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先後由章炳麟、陶成章主編，章、陶皆鼓吹狹隘的排滿主義，於民權、民生的要旨從未發揮¹⁶。又如一九〇七年（光緒卅三年）自同盟會分出的共進會，把同盟會誓詞中的「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再如一九一〇年自同盟會分出的「中國同盟會中部總部」，把革命的主義改為「推覆清政府、建立民主的立憲政體」¹⁷。

一般革命志士在理論上雖然分歧，孫中山則對三民主義堅守不渝。孫何時使用「三民主義」一詞？根據事後回憶，謂在一九〇五年（光緒卅一年），他說：「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予於是乃揭藥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又說：「同盟會成立未久，發刊民報，鼓吹三民主義。」¹⁸但就當時文獻看來，孫在撰述民報發刊詞時，雖闡述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尚未用三民主義一詞：

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¹⁹。

¹⁴ 「革命逸史」第四集頁十九。

¹⁵ 「國父年譜」（上）頁一七八。田桐記云：當同盟會成立之時，湘人張明夷以定名不當，謂既抱傾覆滿廷之志，當為對象立名。孫云：不必也，滿洲政府腐敗，我輩所以革命，即令滿人同情於我，亦可許其入黨。」見「革命文獻」第二輯總頁一四二。

¹⁶ 曼華「同盟會時代民報始末記」，「革命文獻」第二輯頁八一。

¹⁷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頁三六五、五三五、

¹⁸ 「國父全集」第二集頁八八～八九。

¹⁹ 「民報」第一號頁一～三。

孫正式使用三民主義一詞，見於文獻的，最早在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是日他在東京民報週年紀念會中講演，以「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前途」為題，對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作扼要敘述，對於三民主義，他說：

我們推倒滿洲政府，從驅除滿洲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來分作兩次去做。講到那政治革命的結果，是建立民主立憲政體，照現在的政治論起來，就算漢人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至於民生主義）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價的辦法。

對於五權憲法，他說：

英的憲法，所謂三權分立，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各不相統屬。……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要創一種新主義，叫做五權分立，那五權除剛纔所說之三權外，尚有兩種，一是考選權，一是糾察權^①。

此次講演，不僅正式使用了三民主義一詞，且正式在羣眾的場合提出了五權憲法的構想。

三民主義經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間民報的大力宣揚，許多革命同志已漸了解其義，並以此作為革命起事的號召。一九〇六年十一月，龔春臺起兵於江西萍鄉和湖南瀏陽一帶，曾發表宣言，揭櫫驅逐韃虜、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之旨，宣言云：

……不但驅逐韃虜，不使少數之異族專其利權；且必破除數千年之專制政體，不使君主一人獨享特權於上；必建立共和國，與四萬萬同胞享平等之利益，獲自由之幸福，而社會問題尤當研究新法，使地權與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會^②。

一九〇七年八月，王和順起兵於廣東防城，曾發表「告同盟諸兄弟暨吾鄉父老書」，揭櫫國民主義、民主立憲、土地國有之旨，書云：

民族主義足以復國，未足以強國，必兼樹國民主義，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根本，掃專制不平之政治，建民主立憲之政體，行土地國有之制度，使四萬萬人無一不得其所^③。

由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已經形成，此一思想又陸續融入各種革命宣傳文件，一

^① 見「民報」第十號。按香港「中國日報」使用三民主義一詞，較孫為早，見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頁一四四～一四五。

^②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六九一～六九三。

^③ 丁未九月初二日「中興日報」。

九一〇年（宣統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成立的舊金山同盟會和三月二十八日成立的檀香山同盟會，均以「廢滅韃虜清朝，創立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為誓詞²³。也許因為「廢滅韃虜清朝」與民族主義有關、「創立中華民國」與民權主義有關，而孫中山想把民生主義特別強調出來，到這年七月十九日在庇能重整同盟會務時，復把同盟會的誓詞易為「廢滅韃虜清朝，創立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²⁴。

庇能會議以後，孫中山因謀在廣州大舉，赴歐美各地籌款。到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廣州四二七之役以後，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中國同盟會中部總部，僅強調民族、民權主義，並主行內閣制，這與孫中山的思想頗有距離。而武昌革命爆發後，孫中山自美國取道歐洲回國，在抵達國門前，革命軍已與清軍議和，並對清內閣總理袁世凱有秘密承諾，即如袁能迫清帝退位，即推為民國總統²⁵。故孫中山在回國後，即面對着三項問題，其一為革命的主義問題，其二為南北議和問題，其三為民國建立後行總統制與內閣制問題。

內閣制的主要倡議者是宋教仁，孫中山抵上海時，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已議訂一總統制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宋教仁因主內閣制，屢議修改未成，終選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及清帝退位，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之位讓袁，民軍方面為求制袁，將總統制改為內閣制，孫並不贊同，故孫事後曾說，臨時約法，只有「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是他贊同的。

關於南北議和，孫中山原不贊同，他在抵達上海時曾答記者云：「革命之目的不達，無和議可言也。」²⁶。孫所謂革命之目的有二，一為歷次同盟會誓詞中所表現的三民主義主張，一為一九〇六年軍政府宣言中的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的革命三程序。但武昌革命爆發後，革命陣營因軍情緊急，孫中山又未在國內親自主持，已與清軍走向議和協妥的路。革命軍方面既已與袁世凱有密約，孫自不願為名位引起政爭，及袁迫清帝退位，孫乃以臨時大總統之位讓袁。

關於革命的主義，孫中山甫抵國門與同志會議後，即發表宣言，強調革命之目的，不止於民族主義，而止於民權、民生主義。孫於倡導革命的過程中，並不特別強調民族主義，尤反對光復會人以「殺盡滿人」為目標的種族主義²⁷。一九〇六年

²³ 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頁三七~三八、六六~六七。

²⁴ 「國父全集」第五集頁一一七。

²⁵ 錢基博「辛亥南北議和別記」，「江蘇革命博物館月刊」第十七期。

²⁶ 「國父全集」第二集頁九七。

²⁷ 徐錫麟被捕後在供詞中說：「我只拿定革命主旨，一旦乘時而起，殺盡滿人，自然漢人強盛。」見陳雄編「民族革命文獻」頁二四一。

他在「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前途」的講詞中說：

民族主義，並非遇着不同種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不同族的人，來奪我們民族的權。……兄弟曾經聽見人說，民族革命是盡滅滿洲民族，這話大錯。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定要撲滅他的政府，光復我們的民族國家²⁸。

他在就臨時大總統以後，應一位義大利記者訪問時說：

滿漢之間不再有任何界限。我們都是兄弟，……大家都為建設新共和國家而努力²⁹。

清帝退位後，實行五族共和，民族主義消退。嗣袁世凱繼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以宋教仁為首的一批同盟會人轉注意力於憲法國會的運動，俾與袁世凱和舊官僚派爭政權，孫中山則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民生主義的宣傳上。

關於民生主義，清末民初為形成時期，孫中山和其他革命同志的闡揚，先後有繁簡詳略的不同。一九〇六年軍政府宣言云：

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為國民所公有³⁰。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四月一日，孫中山解臨時大總統職，出席同盟會餞別會，即席講演「民生主義與社會革命」，謂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已達，唯民生主義尚未着手，為今後致力之重要目標；並謂社會革命為防患未然，一須平均地權，一須預防資本家壟斷，中國當採用國家社會主義政策，將國家一切大實業皆歸國有，不使一人獨享其利³¹。

到卸任民國臨時大總統為止，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原則可以說已經決定：一為平均地權，一為節制資本。其後孫於各地宣揚民生主義，或側重一點，或從兩方面發揮。四月三日，孫在上海同盟會機關部發表演講，謂民族主義為對外維持吾國家民族之獨立，民權主義為排斥少數人壟斷政治之弊害，民生主義即國家社會主義，在排斥少數資本家壟斷國家財富，使人民共享生產上之自由³²。四月四日，孫告訴上

²⁸ 「民報」十號。

²⁹ 朱傳譽「兩篇專訪、一個對照」，民國五十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央日報」副刊。

³⁰ 引見蔡書義「同盟會時期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一九五五年八月號「歷史教學」。

³¹ 「國父全集」第三集頁二〇。

³² 「國父全集」第三集頁三〇～三二。

海文滙報記者謂：政治革命以後，宜繼以和平的社會革命³³。四月九日，孫應湖北都督黎元洪之邀抵武昌，每蒞歡迎會，即講演民生主義，曾謂當今變革之際，推行平均地權政策，自較平常為易，必自此而後為真正之國利民福³⁴。黎為孫在鄂倡言民生主義頗為不懌，曾私語胡漢民謂：「武漢之局，方憂搖動不安，先生奈何言此？」³⁵

儘管有反對的意見，孫中山宣揚民生主義不稍懈。四月十二日他在接受大陸報記者訪問時說：

此後中國將採行社會主義，使國民生計優裕，故築造鐵路使內地與各口岸航線聯接，實為入手要圖。現在中國財力尚能興辦，惟將來推廣須待外國助力，政府當優訂條款，以招人投資，而不受制於資本家。若各項實業均將以私人興辦，若干年後即歸國有，並按此計劃編訂法律。……余不日將赴廣東，邀合富商集資發達天然利源。

記者問他將來組織商輪公司是否中外合股，孫謂屆時可組織聯合公司，定一期限，若干年後歸共和政府³⁶。

其後，孫中山至廣州，稽留月餘，每日出席各社團學校之歡迎會，發表演說，或論地方自治，或倡女子教育，而於平均地權尤殷殷致意。五月四日在廣州新聞界歡迎會演講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的要義，提出照價納稅及土地國有二策：其一、規定國家可以隨時照價收買地主土地，以防地主以貴報賤。其二、規定在定地價之後，由國家徵收地價稅，就是說按照既定的地價，國家向地主徵收百分之一的地稅，此後隨着地價之增漲，國家用累進稅的辦法，將土地的增價收歸國有，私人不得享其利³⁷。六月九日，在廣州行轅對各界談話，暢論平均地權之理，又對行政人員講地價抽稅問題³⁸。

時孫中山雖卸任臨時總統，但為同盟會總理，凡所闡述，可以代表同盟會的政治理想。孫自然希望同盟會的理想能夠實現，但由誰實現，就孫當時的言行看來，似欲促袁政府實現。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他自香港抵達上海，當時黃興已辭

³³ 「國父全集」第四集頁四六〇。

³⁴ 「居覺生先生全集」（下）頁五五五～五五七。

³⁵ 「革命文獻」第三輯頁六八，胡漢民自傳。

³⁶ 民國元年四月十三日「順天時報」四版，孫中山與西報記者之間答語。

³⁷ 「國父全集」第三集頁三三～四六有關各講詞。

³⁸ 「國父全集」第三集頁四六～四九，第四集頁四七一～四七四。

南京留守職居上海，二人日夕相聚，高談發展實業計劃，準備專辦鐵路事業，於十年內期其大成。有新聞記者問他是否擬往北京，他說鐵道計劃定後，當赴京商諸政府，促其實行³⁹。他在未赴京前，曾致函宋教仁申述他的看法：

民國大局，……若只從政治方面下藥，必至日弄日紛，每況愈下而已。必先從根本下手，發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國勢不搖，政治乃能活動⁴⁰。

時宋方謀擴大黨勢，並謀控制國會，組織政黨內閣，以獲政治實權，孫似不以為然。孫希望與政府合作，謀求同盟會理想的實現。

是年八月二十四日，孫中山應袁世凱之邀抵京，滯留約一月，與袁會談十餘次，談及鐵路、外交、實業各問題，孫希望袁練陸軍百萬人，自任經營鐵路二十萬里。孫中山留京期間，一面宣傳鐵路建設，一面宣傳民生主義。九月二日對北京報界講「鐵路建設政策」，擬募集外債，於十年內修築鐵路二十萬里。九月四日在北京共和黨歡迎會講「民生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謂民生主義並非均貧富之主義，乃以國家之力發達天然實利，防資家專利，故主張鐵路國有。時同盟會已改組為國民黨，孫被推為國民黨理事長，但孫並無意黨務活動，仍以實業為重。九月十一日，袁政府授以籌劃全國鐵路全權，是後孫即往太原、山海關、濟南、青島等地視察⁴¹，至十月十日在上海英文大陸報發表「中國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一文，略述在各地考察之經過及感想，並謂鐵路能使物產價值增高，於民生大有裨益⁴²。

十一月十四日，孫中山成立中國鐵路總公司於上海，並以中國鐵路總公司總理名義致電各省都督及議會，將築路的立法、籌款，以及築路人才的籌劃與來源，一一陳明⁴³。十一月二十八日，黃興亦受任為漢粵川鐵路督辦，黃並於十二月十六日由湖南赴漢口視事⁴⁴。國民黨三個重要領袖中的第一、第二領袖，至是皆致力於實業，宋教仁則仍致力於擴大黨勢與準備國會選舉。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二月十一日，孫中山以籌辦全國鐵路全權名義自上海啟程赴日訪問，滯留日本期間，曾考察其工商情況及有關鐵路的經濟問題，並聯絡其朝野名士、實業鉅子，以為進行之助⁴⁵。但至三月二十日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

³⁹ 「國父年譜」（上）頁四三三～四三四。

⁴⁰ 唐振楚「國父書信選集」頁六八。

⁴¹ 「國父年譜」增訂本（上）頁四七九～四八八。

⁴² 「國父全集」第六集頁六～七。

⁴³ 「國父全集」第四集頁二二五～二二六。

⁴⁴ 「國父年譜」（上）頁四四八。

⁴⁵ 張其鈞「中華民國史綱」（一）頁一八一。

仁在上海遇刺，二十二日身死，孫中山聞訊，匆匆於二十五日自滬返回上海。孫自日起程前，即電國民黨本部及上海交通部令黨人合力查出宋教仁被害原因，以謀昭雪。抵滬後，即與黃興、陳其美、居正、戴傳賢等會商應付宋案辦法，主起兵討袁，黃興表反對。四月十三日國民黨在上海舉行宋教仁追悼大會，孫中山與黃興均未出席，馬君武代表孫中山致祭並演說，謂宋教仁實死於官僚派之手，官僚派沒有整頓中國的能力，見有能整頓中國者，輒以殘忍卑劣手段暗殺之，故今後的競爭，乃官僚與民黨的競爭⁴⁶。

四月二十五日江蘇都督程德全宣佈宋案證據，事涉國務總理趙秉鈞。次日，孫中山與黃興聯名通電，主嚴究宋案主名。袁政府不理，且迅速與五國銀行團成立善後大借款二千五百萬鎊，積極準備以武力應付民黨。七月十二日以後，民黨於江西、南京、安徽、上海、廣東、福建等地起兵討袁。七月二十二日孫中山電促袁世凱退位，電中有「昔日為任天下之重而來，今日為息天下之禍而去」之句。嗣各地討袁軍先後失敗⁴⁷，孫中山為上海領事團所請乘德船離開上海，原擬赴廣東指揮軍事，因德船在福州卸貨耽誤行程，而廣東討袁軍已敗，遂轉船至臺灣，然後乘輪赴日⁴⁸。

黃興 黃興原名軫，字崑午，一九〇四年（光緒卅年）在長沙謀起兵敗，為便於奔走革命，改名興，字克強。湖南善化（長沙）人，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生。小於孫中山八歲，長於宋教仁八歲。先世均以耕讀傳家。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十五歲）入長沙嶽麓書院就讀，主持院務者為王先謙。一八九三年（二十歲）考取秀才，入縣學為諸生。一八九八年轉入武昌兩湖書院就讀，兩湖書院為湖廣總督張之洞所創。一九〇二年以湖北官費赴日本留學，進東京宏文書院，攻習教育，旋與陳天華、楊毓麟等創刊「湖南游學譯編」雜誌，宣傳革命⁴⁹。

黃興的革命思想，自謂「是在少時讀太平天國雜史而起」⁵⁰。這一點，與孫中山差不多，孫自謂少時喜聽長輩講洪楊故事。但孫的革命思想真正形成，應在他於檀香山、香港受教育的時期；黃的革命思想真正形成，應在一九〇二年留學日本以

⁴⁶ 「國父年譜」（上）頁四五八～四六〇。

⁴⁷ 「國父年譜」（上）頁五〇五～五三〇。

⁴⁸ 林百克著、徐植仁譯「孫逸仙傳記」頁二五九。

⁴⁹ 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一～四五。黃興赴日留學，劉揆一「黃興傳記」（頁一）、左舜生「黃興評傳」（頁十）均謂在一九〇一年。

⁵⁰ 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三一。

後。當時留日學界多傾向於民族主義，或站在中國的立場反對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或更因清廷不能抵禦外侮轉而反對滿清政府。

一九〇三年四月，留日學生反對俄軍續留東三省，組織「拒俄義勇隊」，黃興投入為隊員。五月，義勇隊先後改名「學生軍」和「軍國民教育會」，目標由拒俄轉為排滿。六月，黃興受推回國運動革命，至滬時，長沙明德學堂創辦人胡元倓聘為教員。七月經鄂轉湘，曾至武昌兩湖書院演說，宣傳革命。時宋教仁肄業於武昌文普通學堂，聞黃興言，深為悅服，遂相結納。

黃興到明德學堂任教後，即以明德學堂為中心結合革命同志，組華興會結合知識份子，參加者有張繼、譚人鳳、吳祿貞、陳天華、宋教仁等；設同仇會招徠會黨，響應者有哥老會山長馬福益及其所率之萬餘人；立黃漢會運動軍隊，由陳天華等負責；另與武昌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相結，由宋教仁居中聯絡。華興會謀於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五路大舉，因事機不密，於先一月事敗。

華興會事敗後，黃興脫險經滬赴日。一九〇五年七月孫中山抵日，黃興、宋教仁等得日人宮崎寅藏之介，與孫中山商合作革命事，終有同盟會的成立。同盟會所以能夠順利成立，並擁孫中山為總理，黃興有鼎助之功。在七月三十日的同盟會籌備會中，與會者對會名、誓詞發生爭論，黃興是竭力息止爭論並要求與會者簽名立誓的人；在八月二十日的同盟會成立會中，黃興是首先提議不必經過選舉手續即推孫中山為總理的人。同盟會成立之後，黃興被指定為執行部（由孫中山統理）庶務幹事，為總理以下黨務的首要負責人^①。

黃興加入同盟會後，有兩方面的表現最為突出：其一、對孫中山完全支持，不受省籍和團體背景以及黨內風潮的影響。其二、於革命的理論無若何創見，僅在擴張黨務和武裝起事上多所努力。關於前者，如一九〇七年章炳麟、陶成章等與孫中山交惡，掀動風潮，擬改推黃興為總理，黃站在孫的一邊，竭力維護孫的領導地位，終使風潮平息。關於擴張黨勢，如介紹閻錫山、譚人鳳等入盟；組體育會於大森，招徠同志，研習軍事；創勤學舍於東京，作為同志集會研究之所。關於武裝起事，如一九〇八年（光緒卅四年）二月在廣東欽州、廉州起兵，大敗清軍，又於五月去河口督師；一九一一年四月廣州之役中率軍攻督署，身受創傷；是年十月武昌革命爆發後，自香港經滬轉往武漢指揮軍事等^②。

① 同上，頁四九～八八，但謂黃任庶務部長；吳相湘「宋教仁」頁四五謂為庶務幹事，似較合理。

② 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九〇～二〇六。

黃興在同盟會中是僅次於孫中山的領袖人物，二人合作無間，在清末如此，在開國時期也是如此。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任大總統，黃任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孫退職後，黃轉任南京留守，旋亦辭職，追隨孫宣揚民生主義，並協和黨與政府的關係。在黨和一些社會團體中的地位，黃亦僅在孫下。如一九一二年三月三日同盟會由秘密轉為公開，選孫為總理，黃為協理；五月十六日南京國民捐總會成立，推孫為總理，黃為協理；七月二十一日，中華民國鐵道協會舉孫為會長，黃為副會長⁵³；八月二十五日國民黨選舉理事，黃得票數僅次於孫；九月十一日孫受任籌劃全國鐵路全權，十一月二十八日黃受任漢粵川鐵路督辦⁵⁴。

黃興與孫中山比較，孫理論與實務兼顧，而黃則偏重於實務。在民國建立前，黃興的公開講演留有記錄的凡三次，一次在華興會成立時，主張分省起兵，傾覆清廷；一次在民報週年紀念會時，鼓勵學生直接參加革命；一次在武昌受任革命軍總司令時，要求將士要努力、服從、協同⁵⁵。凡此，皆有關革命實務，與革命理論的闡揚，關係甚少。民國建立後，迄於二次革命爆發前，黃興留有記錄的講演凡三十二次，其中十一次為一般社交演說（包括對清皇族、對新聞界、對蒙藏統一政治改良會、對北京女界、對北京回教俱進會、對湖南女界、對五族共和聯合會、對北京軍警聯合會、對北京青年會、對天津日本人士、對湖南教育會），無關宏旨。在其餘的二十一次演說中，演講內容要點可歸納為十一種，此十一種要點共出現二十九次，計注重實業八次，宣揚民生主義六次，闡述革命史及提倡政黨道德各三次，提倡國民捐及企圖聯合吸收他黨各二次，提倡強力政府、軍民分治、政黨內閣、普及教育、制定良好憲法各一次⁵⁶。可以看出當時黃興的志趣像孫中山一樣，主要放在實業和民生主義方面。

關於民生主義，黃興在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三日上海同盟會夏季常會的演講中說：

本會本有特別之黨綱，……所謂特別之黨綱者，即孫中山先生夙行主持之民生主義。雖此主義，在他黨人多未認為必要，或且視為危險，實則世界大勢所趨，社會革命，終不可免⁵⁷。

⁵³ 同上，頁二三五～二九一。

⁵⁴ 「國父年譜」（上）頁四八四、四九二。

⁵⁵ 「黃克強先生全集」頁一五～一七。

⁵⁶ 據上書頁一七～五五所載各文加以分析統計。

⁵⁷ 「黃克強先生全集」頁二二。

又在六月三十日代表孫中山出席中國同盟會上海支部夏季常會的演講中說：

民生主義，孫先生曾屢次演說，惟外間尙未明晰。以世界大勢觀之，社會革命岌岌不可終日；吾人此次革命，即根據社會革命而來。民生主義繁博廣大，而要之則平均地權。反而言之，即是土地國有⁵⁸。

又九月十八日在北京社會黨歡迎大會的演講中說：

我國此次革命，非但種族上革命，非但政治上革命，其結果乃是社會上革命。……望諸君將社會革命包在政治革命之內，抱定國家社會主義，免去歐洲將來社會革命之事。提倡土地國有，使多數國民皆無空乏之虞⁵⁹。

這些也可以看出，黃興所談的民生主義，都是原則性的，不像孫中山那樣能够深入發揮。

關於實業，黃興認爲當以鐵路爲中心，而支援鐵路建設者爲礦業。一九一二年九月十六日在北京湖南同鄉公會歡迎會上說：

欲興實業，當謀鐵路；鐵路不發達，實業即不振興⁶⁰。

九月十八日在北京西北協進會歡迎大會上說：

鐵道政策，實爲今日必要之圖⁶¹。

又九月二十二日在北京鐵道協會歡迎會上說：

現政府所發表之鐵道政策，即是中山先生之鐵道政策。……鐵道修成，必有以供養鐵道者，而後鐵道乃能充實。故兄弟專注重於礦業。蓋礦業者，鐵道之滋養料也⁶²。

當時孫中山已受任籌劃全國鐵路全權，黃也許想致力於礦業，以協助鐵路建設，但未能如願。最後受任爲漢粵川鐵路督辦，直接參加了孫中山所提倡的鐵路建設事業。不幸的，由於政局動盪，經費無著，孫、黃獻身於實業的計劃皆歸落空。

在開國初期的政壇上，黃興繼續爲孫中山的追隨者。但黃終究是實踐者，對孫中山的革命理想了解不深。宋教仁被刺後，孫中山欲號召同志再起革命，黃見當時有機會能以和平的方法獻身於國家建設，即不願支持。後雖因各地革命軍紛起，黃身爲黨內重要領袖，不能不勉強興起，但從此黃興與孫中山之間即有間隙。此與政

⁵⁸ 同上，頁二四。

⁵⁹ 同上，頁三六。

⁶⁰ 同上，頁三四。

⁶¹ 同上，頁三七。

⁶² 同上，頁四二。

黨政治關係較少，茲不多論。

宋教仁 宋教仁，字遜初，湖南桃源人，一八八二年（光緒八年）生，比黃興小八歲，比孫中山小十六歲。家世務農，父親早逝。一八九九年（十八歲）入漳江書院肄業，一九〇一年考入縣學爲生員⁶³，一九〇三年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學堂肄業。

宋教仁至武昌之年爲革命風潮陡起之年，當年由於俄國不依約自東北撤兵（一九〇〇年乘八國聯軍之際佔有），留日學生組拒俄義勇隊，是隊旋改爲軍國民教育會，成爲革命組織，並派員回國運動。同時湖北文高等學堂學生亦上書兩湖總督張之洞，表示願披甲執戈，與俄人戰。是年六月，軍國民教育會員黃興自日返國運動，經過武昌，在文普通學堂講演滿漢畛域及國體政體需要改革之由，宋教仁深爲悅服，遂與相結。是年十一月華興會在長沙成立，宋教仁參加。之後宋並回武昌運動革命，至一九〇四年六月與本縣同鄉胡瑛（湖北陸軍第八鎮工程營士兵）等組科學補習所，推湖北武高等學堂學生呂大森爲所長，胡瑛爲總幹事，宋任文書。科學補習所計劃響應華興會預計在是年十一月十六日的起兵計劃。但至是年十月宋自武昌經長沙回常德聚集同志時，華興會的計劃已爲官廳偵破，黃興已逃上海轉東京，宋教仁聞訊，乃買舟東下，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上海，十二月十二日抵東京⁶⁴。

宋教仁抵東京後，即發起「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鼓吹革命。雜誌第一期於一九〇五年六月出版，宋於「漢族侵略史」一文中力倡民族主義和復仇主義。七月二十八日受約與孫中山見面，決定加入同盟會。七月三十日與黃興等參加同盟會籌備會，八月二十日同盟會成立，孫中山被推爲總理，黃興任執行部庶務幹事，宋教仁任司法部檢事。宋時年二十四歲。同盟會成立後，二十世紀之支那改爲同盟會的機關報，但第二期出版，即因「日本政客之經營中國談」一文遭日警沒收。同盟會旋另出民報爲機關報，推宋教仁爲民報庶務幹事，常川駐社經理一切⁶⁵。

一九〇六年二月，宋教仁入早稻田大學留學生部預科，修習半年⁶⁶。一九〇七年一月黃興謀響應萍醴瀏之役赴香港，宋教仁代理同盟會庶務幹事，與孫中山在東

⁶³ K. S. Liew, *Struggle for Democracy: Sung Chiao-jen and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 P. 8.

⁶⁴ 吳相湘「宋教仁」頁一六～二二。

⁶⁵ 同上，頁二九～三九。

⁶⁶ 宋入早稻田大學以前，「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二九三～二九九宋教仁傳謂其曾入法政大學，「胡北革命知之錄」頁六七～七三宋先生傳謂其曾入宏文學院，前引吳相湘書僅提及入早稻田大學，見原書頁四二。

京策劃一切。嗣萍醴瀏事敗，黃興於二月十五日返東京，因國旗問題與孫中山發生衝突，一度欲退出同盟會；宋亦與孫有隙，決辭庶務幹事。三、四月間，黃、宋謀聯絡遼東馬俠，為革命運動開闢新基地，宋且親自前往，但無成就。值章炳麟、譚人鳳等反對孫中山接受日本贈金風潮起，宋頗憤鬱。黃興續與孫中山合作，宋則意念消極，與孫疏遠⁶⁷。

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是同盟會內部大分化的時期，一九〇七年一批人自同盟會分離而出，組織共進會，主張在長江流域運動會黨起兵；是年原與同盟會聯合的光復會離同盟會而去。一九〇八年隸屬光復會的章炳麟、陶成章聯合攻擊孫中山以及支持孫中山的吳敬恒；是年民報被日本查封，又產生真民報、偽民報之爭。宋教仁也就是在這個時期與同盟會的領導中心疏離。當時孫中山、黃興雖在廣東、廣西、雲南發動一連串的軍事行動，宋均不感興趣。一九一〇年二月，廣州新軍之役失敗，四月汪兆銘在北京謀刺攝政王事洩被捕，孫中山為重振黨務，曾在東京與宋晤談兩次，均不歡而散。宋此時有意與譚人鳳等在長江流域發展，乃於一九一〇年多回上海策劃⁶⁸。

宋教仁回上海後，任民立報主筆。一九一一年四月黃興等在廣州起事，宋曾參加。事敗之後，仍回上海主民立報筆政。宋鑒於前此革命失敗，建三策取決於眾，上策為中央革命，聯絡北方軍隊，以東三省為後援，一舉而佔北京，然後號令全國。中策在長江流域，各省同時大舉，設立政府，然後北伐。下策在邊隅之地，設秘密機關於內地，進據邊隅以為根據地，然後徐圖進取。僉以上策運動稍難，下策已行之而敗，決採用中策，遂設同盟會中部總部，選宋教仁、陳其美、譚人鳳、楊譜笙、陳祖彝為總務幹事，並決定由居正立湖北分會，曾傑、焦達峯立湖南分會，范鴻仙、鄭贊丞立安徽分會，吳永珊、張懋隆立四川分會，井勿幕立陝西分會。

一九一一年八月，四川鐵路風潮起，宋教仁擬乘時大舉，欲赴鄂主持。會漢口黨人起兵，宋乃於下游謀響應，於南京則令范鴻仙、柏文蔚為之，於上海則由陳其美、李柱中主之。是年十月，宋與黃興赴鄂，黃被舉為總司令，宋則佐胡瑛辦外交，並與居正、湯化龍等草定鄂省臨時約法，通電各省舉代表赴鄂，組織臨時政府，宋主行內閣制。嗣漢陽失守，宋教仁東下謀取南京。各省代表先集會於滬，決定採內閣制，設政府於武昌。其後各省代表復集會於武昌，部分代表反對內閣制，

⁶⁷ 同上吳書，頁四五～五一。

⁶⁸ 同上，頁五一～五二。

遂草擬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規定行總統制，不設國務總理。同時因南京克復，武昌危殆，復決定遷臨時政府於南京。嗣孫中山返國，被選為臨時大總統，宋主行內閣制不果，旋出任法制局長⁶⁹。及孫中山決定以臨時大總統之位讓袁，宋教仁草擬臨時約法，才將其內閣制的理想納入其中。

在同盟會中，宋教仁不像黃興那樣一意擁護孫中山，在革命思想上，宋也不像黃興那樣完全追從孫中山。宋的革命思想，主要表現在他一九一一年主民主報筆政時。他的民族思想是反帝國主義的，與孫中山欲借用列強的力量推動中國革命不同；他的民主思想是以國會、內閣為主的立憲政治，與孫中山的軍法、約法、憲法的漸進於民主者不同；他的社會主義思想是溫和的，只贊同國家社會政策，與孫中山力謀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民生主義不同⁷⁰。武昌革命爆發前夕，主要在宋教仁等策動下所成立的中部同盟會總部，以「推覆清政府建設民主的立憲政體為主義」，就是要把孫中山的政治與社會合一的革命，變為純政治的革命。

由於中部同盟會總部的革命理論較為溫和，武昌革命爆發以後的革命運動在中部同盟會總部的指導下即較富妥協性。當時孫中山不在國內，革命軍開始與清內閣議和，並將民國總統的位置保留給清內閣總理袁世凱⁷¹。孫中山回國後雖受推為臨時大總統，但旋即按南北議和的秘密條款，把位置讓給袁世凱，使革命的理想無法實現。孫中山事後曾感慨地說：

乃至武昌起義，各省不約而同，寢而北軍議和，清帝退位，進行之順適，迥出意料，所立方略，百未施一⁷²。

實則，早在孫中山回國之初，即對宋教仁亟亟於國會、內閣的主張加以糾正。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同盟會在南京舉行會員大會，將誓詞修訂為「顛覆滿清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清帝退位後，同盟會於三月三日改為公開政黨，確定以「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為宗旨，會中選孫中山為總理，黃興、黎元洪為協理，汪兆銘為總務部主任幹事，宋教仁為政事部主任幹事⁷³。此後由於孫、黃專務於實業，同盟會務實際由宋教仁負責。

當時關於同盟會發展的方向，孫中山與宋教仁有不同的意見。孫中山主張退為

⁶⁹ 「湖北革命知之錄」頁六八～七一。

⁷⁰ 有關宋教仁於一九一一年在民主報所發表的一些文章，見吳相湘「宋教仁」頁六八～八四。

⁷¹ 王德昭「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分析研究」，「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二冊頁一〇〇～一一一。

⁷² 「國父全集」第六集頁一。

⁷³ 吳相湘「宋教仁」頁一五九～一六一。

在野黨，對政府進行監督，宋主張聯絡原與同盟會有關係的黨派，合併改組成一個大黨，先在議會中獲得優勢地位，然後組成以政黨為基礎的責任內閣。黃興和多數黨人贊同宋的意見，孫只好讓宋去進行^④。

宋教仁在南北統一後任唐紹儀內閣的農林總長，又實際負責同盟會務，乃有機會聯絡新舊各方，同時也有機會對國事作全面的考慮。在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前夕，宋曾代草國民黨政見，其要點如下：

- ①對政體的主張：主張單一國制，反對聯邦國制；主張責任內閣制，由內閣代總統對議會負責；主張省行政長官由民選制進於委任制；主張省為自治團體，得依法辦理地方財政、地方實業、地方交通業、地方工程、地方學校及慈善公益事業；主張政黨內閣，國務總理由眾院多數黨推出，其他國務員由總理組織，無須議會同意。
- ②對於政策的主張：主張整理軍政，包括統一軍制，裁汰冗兵，興辦軍事教育，擴充兵工廠；主張劃分中央地方行政，中央行政包括軍政、國家財政、外交、司法行政、重要產業行政（礦政、漁政、路政、墾地）、國營實業、國營交通業、國營工程、國立學校、國際商政（移民、通商、航政），地方行政包括官治行政（警察、衛生、宗教、禮俗、戶口、田土等民政事宜以及產業行政和教育行政）和自治行政（地方財政、地方實業、地方交通業、地方工程、地方學校、慈善事業、公益事業）；主張整理財政，包括勵行會計制度、統一國庫、設立中央銀行並集中紙幣發行權、整理公債、劃定國費及地方費、劃定國稅及地方稅、改良幣制行虛金本位；主張整理行政，包括劃分中央與地方官權限、裁汰冗員、裁併閑署、勵行官吏登庸考試、實行懲戒官吏失職；主張開發產業，包括興辦國有山林、治水、放墾荒地、振興礦業、獎勵仿造洋貨工業、獎勵輸出品商業；主張振興民政，包括整頓警察、勵行衛生、釐正禮俗、調查戶口、勵行地方自治；主張興辦國有交通，包括急辦國有鐵道、整理電信、擴充郵信、興辦海外航業、整理鐵路會計；主張振興教育，包括法政教育、工商教育、中學教育、中小學師範教育、女子教育；主張統一司法，包括劃一司法制度、養成法官律師、改良監獄；主張運用外交，包括聯絡素日親厚之與國、維持列國對我素持之

^④ 仇鯨「辛亥革命前後雜憶」，「辛亥革命回憶錄」(一)頁四四八～四四九。

主義^⑥。

此一政見，自然不完全代表宋教仁個人的意思，但即就此一政見而論，已與孫中山的主張有些基本的不同：其一、此政見主張立即實行責任內閣和政黨政治，與孫中山所提出的軍法、約法、憲法的建國程序不同。其二、此政見主張省為自治團體，孫中山主張縣為自治單位。其三、此政見主張三權分立，孫中山主張五權憲法。其四、此政見忽略民生主義，孫中山當時則集全力宣揚民生主義^⑦。

宋教仁不僅在政見上與孫中山有差異，在當時政壇上的角色也與孫不同。孫的興趣在實業方面，宋則一直有興趣於實際政治。自唐內閣倒後，外間即傳說宋有組閣可能，共和黨甚至指宋暗用手段，使唐去職，以便得其位。實則宋教仁與唐紹儀、陳其美皆屬意黃興，惟黃不就。

唐去職後，袁世凱傾向共和黨的超然總理混合內閣說，不合同盟會的政黨內閣主張，宋乃辭農林總長職。及陸徵祥組超然總理混合內閣失敗，政黨內閣的主張復活，外間又傳說宋有組閣可能。事實上，八月二十日左右，范源廉、劉揆一曾勸宋出任內閣總理，宋以不能組織政黨內閣，堅辭不允。旋孫中山至北京，袁世凱與孫商議內閣總理人選，孫以宋對，而黃興亦電勸宋就內閣總理職。宋以威望不足，力薦黃興出任。黃興至北京見袁世凱時，袁亦請黃興出任，時黃已傾心實業建設，不肯就任。黃不就內閣總理後，袁世凱提出沈秉堃、趙秉鈞二人，黃均不贊成，宋則贊同趙秉鈞，因沈為國民黨員，威望又不足以勸使各國務員加入國民黨，無法組成政黨內閣，破壞黨議。而趙雖亦入國民黨，屬袁世凱一派的人物，可網羅袁派人物組織內閣，國民黨當亦贊同^⑧。

趙秉鈞組閣後，在黃興等人的努力下，一度說服全體非國民黨閣員加入國民黨，趙亦虛與委蛇。但另一方面，由於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大獲勝利，宋教仁於各地演說，以為國民黨將組政黨內閣，這對趙秉鈞及袁世凱的實權都構成很大的威脅。趙乃設計謀殺宋教仁，於一九一三年三月得逞。宋死後，孫中山等重要黨內領袖皆活動以武力反袁，在國會中爭憲法、爭內閣的國民黨員，缺乏強有力的領導，遂為袁政府所分化。

^⑥ 葉楚傖等編「宋漁父」，宋漁父先生政見，頁一～一五。

^⑦ 同註(7)頁一二三～一二四。

^⑧ 民國元年十月七日「民立報」，追記政局之變遷。

(2) 進步黨

進步黨的領袖人物，不像國民黨那樣單純，雖然大都來自舊日的立憲派，但立憲派比同盟會散漫得多。梁啟超是進步黨的靈魂，他之所以極力組黨以抗國民黨，基本上因為他篤信溫和的改革，欲依附政府做改革的工作，故自清末即與同盟會抗。惟民國建立之初，梁啟超不在國內，與同盟會抗者主要為擁護黎元洪以湖北人為中心的民社（同盟會所組的南京臨時政府排擠湖北勢力）和擁護章炳麟以江浙人為中心的統一黨（章自一九〇七年與同盟會決裂）。惟章炳麟終是革命黨人，與同盟會分是意氣的，故與梁啟超拉攏反國民黨各派所組的進步黨不合。黎既有武昌首義之功，身又為副總統，遂被進步黨推為黨魁（理事長）。惟黎並不親理黨務，真正代表黎元洪主持黨務的，為湯化龍（湖北）。故論述進步黨的領導人物，當推黎元洪、梁啟超、湯化龍。

黎元洪 黎元洪，字宋卿，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十月九日生。湖北黃陂人，世業商。幼時不樂帖括，投入天津水師學堂，畢業後任職北洋艦隊，累擢至副管駕。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黎為鎮遠艦砲兵長，與日本海軍接戰。艦覆，黎遇救，得不死。戰後至煙臺，上書兩湖總督張之洞，張令幫辦湖北武備學堂，未幾轉常備軍統帶，後轉新軍協統。黎在湖北，頗致力於軍事改革，建議張之洞派人出洋習軍事，及學成歸國，之洞忱於革命之禍，輒心疑之，不令宅身軍界，黎則曲為維持，使其因材得職，以是深得鄂中軍心。時湖北新軍為第八鎮和二十一混成協，第八鎮統制為張彪，二十一混成協統為黎元洪。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革命事起，總督瑞澂聞變逃走，第八鎮統制張彪亦遁，全城無主，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等，遂擁黎為湖北都督⁷⁸，黎時年四十八歲。

黎元洪本非革命黨人，任都督係出於被迫。元洪為人忠厚，平素頗得軍心，武昌革命由士兵及下級軍官掀起，因重要革命領袖均不在，遂強擁黎元洪出。初擁之至楚望臺，黎拒不接受推舉；又擁之至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副議長張國溶、以及議員阮毓崧、劉廣藻、胡瑞霖等推之為都督，黎亦不承認。經諮議局議員及革命黨

⁷⁸ 辛亥十月初一日「民國報」第一號（上海），黎元洪傳；戊辰年（民國十七年）四月二十日「雷風」第二號（上海），黎元洪小史。章炳麟「大總統黎公碑」謂元洪父以游擊隸北洋練軍，存疑。又謂清與日本戰於威海時元洪以廣甲管輪自廣州赴之，船覆泗水至大連。若泗水至大連，當為參與大東溝之役。前二資料亦彼此矛盾，蓋皆聽自傳聞。章文見「太炎文錄續編」卷五上頁二。

人連日勸逼，始勉強應允⁷⁹。黎之出任都督係受革命派人和立憲派人共同推擁，然所謂立憲派人，與康梁並不屬同一系統，多係湖北諮議局中人；所謂革命派人，與孫、黃、宋並不屬同一系統，主要為共進會和文學社的成員。這是黎元洪能够自成一派的重要原因。

湖北都督府於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一日開始組織，至二十五日粗定，其組織和重要成員有如下表⁸⁰：

軍政府都督黎元洪 秘書長饒漢祥 (舉人)	軍令部長杜錫鈞
	參謀部長楊開甲
	軍務部長孫武 (武備學堂畢業，共進會員)
	外交部長胡瑛 (士兵出身，文學社員)
	內務部長馮濬
	理財部長李作棟 (士兵出身，共進會員)
	司法部長張知本 (優貢，共進會員)
	交通部長熊繼貞
	編制部長湯化龍 (進士，諮議局議長)

上表黎元洪、孫武、湯化龍皆為進步黨的理事，他們能成為同一政治集團的人物始於此。湯化龍在都督府初成立時原掌民政兼領秘書，其能號召政學界響應革命，亦如黎元洪之能號召軍界。後湯雖為湖北軍界所排，由於黎元洪是民初政壇上僅次於袁世凱的人物，湯仍附驥元洪。

黎元洪在民初政壇上能够受到一批人的擁護，成為一大勢力，可以說是當時的政局造成的。第一、湖北首起革命，全國各省響應，黎元洪被推為湖北都督，一時無論革命派，還是與革命派交涉的清軍一方，均以黎為中心人物。第二、孫中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組織南京臨時政府，給予黎元洪以副總統的頭銜，使寧漢成為南方兩大勢力中心。但武昌革命諸元勳未被網羅進入南京臨時政府，孫武以實際策劃武昌革命之功，求一陸軍部次長而不可得，於是湖北方面的革命黨人另組民社，擁護黎元洪，與以同盟會為主體的南京臨時政府抗。第三、湖北方面的革命黨人未受重用，可能因為他們大多是共進會和文學社人，與同盟會有距離。另一位老同盟會員章炳麟，可能因為與光復會關係過於密切，欲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而不得，

⁷⁹ 沈雲龍「黎元洪評傳」頁一〇～一四。

⁸⁰ 同上，頁一五～一七。

亦與黎元洪接近而疏孫中山。民社後演為共和黨，共和黨又演為進步黨；章炳麟初組統一黨，統一黨後來有一部分人併入共和黨，又有一部分人併入進步黨，可謂助長了進步黨的力量。第四、孫中山退位，袁世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後，黎元洪續被選為副總統。北京與南京對抗的態勢消失，武漢與北京聯合的局勢形成。黎頓時成為袁世凱控制南方的中樞人物。

黎元洪在任副總統期間，對袁世凱所主持的北京政府極力支持，同盟會和國民黨既與北京政府對抗，黎遂為反同盟會和反國民黨派的結合中心。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民社成立，推黎元洪為理事長。民社為代表湖北人的政治勢力，常務理事五人：孫武、劉成禺、饒漢祥、張伯烈、孫發緒，皆湖北人。五月九日，民社擴大為共和黨，黎元洪為得票最多的理事，其次為張謇、章炳麟、伍廷芳、那彥圖。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共和黨合民主黨、統一黨為進步黨，黎元洪當選為理事長，理事有梁啟超、張謇、伍廷芳、孫武、那彥圖、湯化龍、王賡、蒲殿俊、王印川^①。民社為湖北反同盟會者的結合，共和黨和進步黨為全國立憲派和官僚派為反同盟會和國民黨所作的大結合。

進步黨成立前後，黨爭政爭激烈，黎元洪於政治則站在袁世凱的一方抗國民黨，於黨務則竭力提携進步黨。進步黨成立前夕，擬推黎為理事長，電黎求同意。黎以進步黨成立，在對抗國民黨，覆電贊同兩黨政治，實即贊同進步黨之組合，其言云：

政黨公例，以兩大黨對峙為原則，英之自由、保守，美之民主、共和，互相提携，同臻福利^②。

時眾議院選舉，民主黨的湯化龍當選為議長，共和黨的陳國祥當選為副議長，黎致電眾議院賀之^③。參議院正副議長由國民黨人選得，則未見黎有電致賀。

進步黨成立後，部分共和黨員以權力分配不均，又鬧獨立。黎元洪速電進步黨本部勸止。六月十六日電云：

內訌外患，迭起環生，非有穩健政黨，決難救國，決難自存。吾共和、統一、民主三黨，內感於政見之相同，外迫於時勢之危險，毅然合併，斷不容絲毫權利之念羈雜其間。元洪自去年以來，本此目的，慘淡經營，曾屢派代表孫君堯

^① 張玉法「民初國會中的保守派政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八期。

^② 「黎副總統政書」卷二〇頁一。

^③ 同上。

卿（武），竭誠磋商，幸私願克償。大黨成立，茫茫前路，或有轉機。諸公熱心黨務，當同慶幸。竊維政黨首重人才，決非囿於一隅，循於偏見，所能制勝。元洪猥以孱庸，謬膺重任，朝夕求賢，惟恐不及，常恐海內豪傑棄我如遺，豈宜以垂成之局重行破壞、動搖團體、離散人心？前有少數議員因意見未通，輒宣佈共和黨不曾合併，元洪再三勸解。頃鄂共和黨支部派員赴京，磋商一切，元洪復面加訓誥，諒不至有決裂之虞。希同舟共濟，毋事紛爭，致為他人所竊笑，本黨幸甚⁶⁴。

六月二十一日電云：

進步黨成立，元洪謬被推為理事長，自維才力駭薄，常恐弗勝。惟國步方艱，諸待建設，非合穩健份子，同心一德，不足以策進行。三黨主義相同，自應結為一體。此次合併之舉，適符初志，逆計大局，裨益宏多，執鞭相從，實所深願。元洪對於國家前途之計劃，皆將於新黨是望，自當以愛國家者愛新黨，阻勉從事，弗知其他，願我同仁，努力偕行，共肩重任。倘以閱牆之儻，門戶自分，同室操戈，授人以柄，匪特非元洪投身政黨之意，亦辜諸君組織政黨之心。元洪與新黨為一體，力所能逮，靡敢告勞，矢忠弗渝，希共鑒察⁶⁵。

黎元洪的勸止，並未發生效力，六月二十二日，部分共和黨及統一黨黨員發表獨立宣言，痛斥民主黨包攬⁶⁶。進步黨雖未因此解體，但共和黨、統一黨的名義仍存。

進步黨的成立，目的在對抗國民黨，翼助袁政府。黎元洪極力參與進步黨事務，已表白了他的政治態度。如果把國民黨和袁世凱視為兩個對立的政治勢力，國會中的進步黨議員大體站在中間而偏袁，黎元洪則完全站在袁的一方，這也許是他身在其位的關係。一九一三年四、五月間的政局，國民黨為宋案及大借款案等嚴責袁政府，黎元洪對政府力加維護，五月四日上電大總統並致京外各機關，對宋案主張「共圖鞏固共和，維持大局。寧可以宋君殉全國，不可以全國殉宋君」。對大借款案主張「保存國體，監督用途，忍痛吟辛，力圖懲愆」，但「不能罪政府以違法」⁶⁷。七、八月間的政局是國民黨掀動二次革命，於南方各省起兵，黎對鎮壓二次革命，不遺餘力，黎以此獲一等文虎勳章⁶⁸。九、十月間的政局是醞釀總統

⁶⁴ 同上，卷二十二頁一。

⁶⁵ 同上，頁六。

⁶⁶ 同註64。

⁶⁷ 「黎副總統政書」卷二〇頁二～三。

⁶⁸ 同上，卷二十五頁九～一〇。

選舉，北京共和黨本部擬擁黎元洪競選總統，黎覆電示意擁袁，謂「若復狗愛個人，致隳成局，則惟有擔筇携屨，徜徉湖山」⁹⁸。九月二十八日黎致電參眾兩院並京外各機關，主速選袁世凱為大總統，以使「政府有強固之力，鄰邦無窺伺之心」⁹⁹。三十日並致電進步黨重要領袖梁啟超、湯化龍，力促先選總統，後定憲法¹⁰⁰。十、十一月間的政局是國民黨與進步黨聯合制定憲法，規定國會對國務員有同意權，眾院對國務員得為不信任投票。袁世凱於十月二十九日通電反對，作為進步黨黨魁的黎元洪，無視黨議，於十一月一日上電，完全支持袁世凱的立場¹⁰¹。

黎元洪是進步黨中的極右派，他的主張雖不一定能完全影響國會中的進步黨議員，但因為他身為副總統，又兼湖北都督，他個人的意見，較所有其他進步黨黨員更能影響政局。

梁啟超 作為進步黨的領袖之一，梁啟超與黎元洪的出身背景不同。就對政治的意向而言，黎元洪原為軍人，其從政是受逼而來，後來忝列進步黨黨魁，也是「黃袍加身」式的。黎談不上有什麼政治理想，基本上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官僚。梁啟超出身士紳階層，十餘歲時即獻身於政治改革運動。梁在政治上是一個不斷改革論者，有時也有革命的意向。

梁啟超，號任公，廣東新會人，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生。其族耕讀傳家，祖及父皆為生員。啟超十二歲為生員，十六歲入省城學海堂，十七歲中舉，前此皆習訓詁詞章之學。十八歲（一八九二）入京會試，下第歸，道經上海，購得瀛環志略，並得見江南製造局譯西書若干種，是為梁知有新學之始。是年秋，由陳千秋之介，在廣州從康有為學，專究陸王心學及史學、西學。至二十二歲入京參加會試，適逢甲午戰敗，從康有為運動公車上書，並辦「中外公報」，作變法宣傳。一八九五年八月，康有為在北京聯絡官紳組強學會，梁任書記，得睹會中購藏之譯書。北京強學會既開，在天津小站練新軍的袁世凱亦捐款入會，此為梁、袁建立關係之始。不及三月，北京強學會封閉，上海強學會旋亦封閉。次年四月，梁自北京至上海。一八九六年八月，以上海強學會餘款所辦之「時務報」出版，梁任時務報撰述，大力鼓吹變法。梁於此時，在上海得結交張謇、章炳麟等人¹⁰²。張後為進步

⁹⁸ 同上，卷二十九頁一一～一二。

⁹⁹ 同上，卷三〇頁一四～一六。

¹⁰⁰ 同上，卷二十七頁一六。

¹⁰¹ 同上，卷三十三頁一～五。

¹⁰² 梁啟超「三十自述」，「戊戌變法」(IV)頁四三～四六；毛以亨「梁啟超」頁三六～四五。

黨理事，章亦一度被進步黨推為理事。

梁啟超在上海主時務報筆政年餘，因報館同仁梁鐵君、章炳麟互毆，梁又與汪康年失和，梁決定離開時務報。一八九七年十一月應湖南時務報學堂之聘，任該堂總教習。時熊希齡任該堂總理。時務學堂學生有蔡鐸、范源廉等人⁹⁴。熊希齡、蔡鐸、范源廉後來皆為進步黨的重要人物。

梁啟超在時務報及時務學堂時代極富民族思想。梁離時務報原因之一，即是兩湖總督張之洞不許其發表民族思想的文字。梁在赴湘前，曾與康有為等商時務學堂教育方針，康主張以漸進的方法改革政治，以立憲為本位；梁則主急進，以種族革命為本位⁹⁵。故梁在時務學堂批學生割記，每詆清廷、倡民權，梁於一九一二年在蒞報界歡迎會演說辭中云：

當時吾之所以為諸生語者，非徒心醉民權，抑且於種族之感，言之未嘗諱也⁹⁶。

梁並引揚州十日記以為宣傳，並函請湖南巡撫陳寶箴，以籌備自治為名，佈置獨立事。後因與守舊派王先謙等發生衝突，被解聘⁹⁷。

一八九八年春，梁離湘赴滬，時康有為方在北京運動變法，梁又赴京與康等組保國會。變法事起，受命辦理譯書局事務。政變發生後，康、梁東渡日本，日懼影響與清廷邦交，將康驅逐出境，梁留居橫濱辦清議報，一度與革命黨醞釀合作，後為康所尼。一八九九年保皇會成立，梁佐康發展保皇會務，委唐才常（前時務學堂教員）於長江一帶組自立軍，謀勤王。北方義和團事起，梁曾返滬有所策劃，事旋敗。一九〇二年一月，梁所辦的清議報毀於火，二月復創刊新民叢報。嗣康有為發表政見，謂主張革命，效法共和，使內亂不已，非所以愛國，亦非所以愛民。啟超自戊戌東渡以後，與革命黨人接觸，革命思想日濃，曾與康發生辯駁，然不願捨康有為而去，一時內心頗為痛苦⁹⁸。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

啟超既日倡革命排滿共和之論，而其師康有為深不謂然，屢責備之，繼以婉勸，兩年間函札數萬言。啟超亦不慊於當時革命家之所為，懲羹而吹壺，持論稍變矣。然其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相矛

⁹⁴ 毛以亨「梁啟超」頁四七～五二。

⁹⁵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上）頁四四。

⁹⁶ 「民國經世文編」第一冊頁四八。

⁹⁷ 毛以亨「梁啟超」頁五三。

⁹⁸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四八～一七三；毛以亨「梁啟超」頁五五～九四。

盾⁹⁹。

至一九〇三年梁啟超遊美，眼見華僑社會之凌亂，深認我國民無共和國民應有之資格，加上其他因素的激盪，遂使梁放棄革命的主張，而專致力於改革、立憲¹⁰⁰。

梁啟超的立憲主張，最早見於一八九九年（光緒廿五年）四月發表於「清議報」的「各國憲法異同論」一文，該文就立憲君主國與共和國加以討論，撇開專制君主國不談，即有提倡君主立憲之意¹⁰¹。其後續於一九〇一年五月出版的「清議報」中發表「立憲法議」一文，正式提出立憲的主張：

君主立憲，政體之最良者也。民主立憲政體，其施政之方略，變易太數；選舉總統時，競爭太烈，於國家幸福，未嘗不間有阻力。……然則中國今日遂可行立憲政體乎？曰是不能。立憲政體者，必民智稍開而得能行之。日本維新在明治初元，而憲法實施在二十年後，此其證也。中國最速亦須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語於此¹⁰²。

其後梁續假新民叢報鼓吹憲政思想，而以「開立憲政體政府」為目的的保皇會，在康梁的領導下，亦在海內外展開活動。

作為立憲派的領袖之一，梁啟超與康有為不同。康之立憲離不開君主，故從未與主張推翻君主的革命派合作，到民國建立，亦無意於共和的憲政運動；梁重立憲，有君主固宜，無君主何妨？故在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三年間一度傾心革命，民國建立後，續從事憲政運動。在梁傾心革命的時期，傾心於與革命派合作；在梁從事立憲運動時，則與革命派對立。民初與革命派對立，因為對憲政的理想不同；清末與革命派對立，因為對實行憲政的手段看法不同。自一九〇三年梁確定了立憲的立場之後，其與革命派之間的對立，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革命與立憲的文字論戰，主要在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七年之間；另一方面由於清廷實施預備立憲，一九〇七年以後梁把注意力集中在國內的政黨活動以及在預備立憲的指導上，革命派則對立憲派及各種立憲措施大肆抨擊。梁在政治立場上與革命派對立，自清末已然。

關於與革命派論戰，主要發生於新民叢報時代。一九〇三年夏梁確定了君憲的立場後，於九月二十一日出版的「新民叢報」發表「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

⁹⁹ 原書頁六三。

¹⁰⁰ 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頁二八九～二九三。

¹⁰¹ 文見「清議報」第十二、十三冊。

¹⁰² 同上，第八十一冊。

標明保皇，力闢革命。梁又於「福澤諭吉語錄」一文中懷疑中國國民資格，以為中國國民智未開，不宜行共和政體。到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創刊，汪兆銘於創刊號中發表「民國的國民」，鼓吹排滿，對梁啟超引伯倫知理等人學說，謂中國國民無立國資格，予以駁斥。梁啟超受到民報的抨擊後，於新民叢報發表「開明專制論」，反擊民報，謂中國今日萬不能行共和立憲，中國今日尚未能行君主立憲，中國今日當以開明專制為立憲之預備，並謂民生主義為「奪富人所有，以均諸貧民」。其後民報連續發表反駁文字，汪兆銘堅持「不革命決不能立憲」，孫中山、胡漢民、朱大符等則闡明民生主義的真義，謂民生主義的「均富」，並非使財產平分，乃是使人民機會均等，依其才能而定酬勞。其間梁雖續有文對同盟會人的主張提出駁論，嗣因國內實行預備立憲，梁忙於立憲運動的實務，無暇多顧，新民叢報停刊，論戰遂告結束^⑧。

關於一九〇七年以後梁集注意力於國內的政黨活動及預備立憲的言論指導，可以分兩方面敘述。一九〇七年後立憲派的政黨活動，在海外有康有為所領導的帝國憲政會。帝國憲政會正式成立於一九〇七年二月十三日，是由保皇會改組而成。梁啟超另組政聞社，由上海聞人馬良出面，聯合國內官紳。政聞社於一九〇七年十月十七日成立於東京，國內參加者除馬良外，有雷奮、鄧孝可等。政聞社因與康有為關係過密，到一九〇八年八月被禁^⑨。政聞社被禁後，康梁一派的人即附於內地的立憲派從事活動，同時由於梁啟超的幕後指導，使康梁一派的人物，在國內的立憲運動中仍能居於領導的地位，代表康梁勢力的是徐公勉。徐公勉是政聞社的首要，與上海的立憲派人有密切往來，自一九〇九年冬國會請願運動開始後，即正式與國內的國會請願勢力結為一起。國內的國會請願勢力，曾先後結合為國會請願同志會和各省諮議局聯合會兩個團體。這兩個團體的成員，於一九一〇年冬醞釀組織政黨，幾經磋商，到一九一一年六月四日成立憲友會，徐公勉被選為常務幹事^⑩。此期間，梁啟超在政黨活動上雖居幕後，但對預備立憲的言論指導，卻仍在幕前。政聞社所辦的「政論」，以及在上海所發行的「國風報」旬刊，筆政均由梁啟超主持。政論今不多見，僅就梁在國風報上所發表的文字看來，他對預備立憲的指導與監督，可謂已無微不至。

^⑧ 引見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頁三八七～三九六。

^⑨ 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頁三二〇～三六一。

^⑩ 同上，頁四六三～四六四，四七八～四八二。

武昌革命爆發後，清廷詔除黨禁，「所有戊戌以來，因政變獲咎，與先後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懼罪逃遷，以及此次亂事被脅自拔來歸者，悉被赦免。」時清內閣總理大臣為袁世凱，袁為拉攏各方，改組內閣，任梁啟超為司法部副大臣。康有為懷戊戌舊恨，反對梁與袁合作，梁雖未就司法部副大臣職，但極欲回國，於政界有所活動。梁一度潛回大連，謀聯合保皇派奪取政權，事不成。清帝退位後，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同盟會擴大為國民黨，欲透過國會選舉，爭取政權。舊立憲派人為圖對抗，擬組織大黨，請梁回國主持。梁既思在國內政界活動，決定拉袁世凱支持舊立憲派人組黨。康有為見無法阻梁回國從事政治活動，乃相約國內組新黨，海外存舊會，以不拉海外幹部回國為條件。一九一二年十月，梁返國抵北京，國民、共和等黨爭歡迎之。由於歷史的積怨和政見的不同，梁不可能入國民黨。梁初以湯化龍的共和建設討論會為中心，組織民主黨，既又加入共和黨為理事。正式國會選舉結果，國民黨獲勝，梁乃聯合民主、統一、共和三黨組進步黨，以與國民黨對抗。進步黨在國會中的勢力，初較國民黨勢力為弱，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後，進步黨勢力漸盛，熊希齡所組織的名流內閣，即以進步黨為中心。梁在熊內閣中任司法總長，大政方針多出其手。

實際由梁啟超領導的進步黨雖號稱政府黨，仍自有其立場，特別關於制憲問題，與國民黨的觀點頗多一致之處，如兩黨均主責任內閣。依照臨時約法規定，總統選舉、憲法通過，須議員四分之三及三分之二之多數，進步、國民兩黨若在國會中取敵對態度，則無法解決。梁曾主兩黨合作，以防國會以外的勢力干涉制憲與選舉，然兩黨終未完全合作。總統選舉，進步黨人及國民黨人不少選黎元洪，袁用脅迫方法始獲當選。憲法的制訂，則完全受外力干涉而流產。嗣國會停閉，內閣形同虛設，熊希齡於一九一四年初辭總理職，出任熱河都統；梁亦辭司法總長職，改任幣制局總裁¹⁰。民初的政黨政治，此時已經告終。

湯化龍 在進步黨的領袖人物中，湯化龍是舊官僚和舊士紳的代表。他的經歷沒有梁啟超、黎元洪突出，黎出身軍人，在武昌革命爆發前，從沒有過問國家政治的經驗；梁雖出身士紳，但為了改良中國的政治，不惜放棄士紳階層的特權與榮耀，作政治通緝犯，流浪異國，但仍獻身於改良中國的政治。湯一直留在士紳階層中，他能在進步黨中居重要地位，是大總統袁世凱需要他拉攏梁啟超，副總統黎元

¹⁰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三四五～四二九；毛以亨「梁啟超」頁一〇五～一一〇。

洪需要他作代表，湯與袁、黎皆有關係，又為梁啟超所倚重。

湯化龍字濟武，湖北蘄水人，一九〇四年（光緒卅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由北京進士館選為官費生，留學日本，入東京法政大學速成科，受業於梅謙次郎。一九〇八年畢業回國，任民政部主事，喜治刑法之學。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各省諮議局成立，湯被選為湖北諮議局議員，初任副議長，後任議長。當時國內外各地正發起國會請願運動，湯亦投身其中。一九一〇年，北京有國會請願同志會成立，以直隸諮議局議長孫洪伊為會長，邀集各省新進青年及學生，請願資政院，奏請速開國會，湯化龍任湖北支會書記。為進一步推動國會請願，湯與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等發起各省諮議局聯合會，湯任會長，各省諮議局議長參加者有湖南譚延闓、四川蒲殿俊、福建劉崇佑、山西梁善濟等。湯與彼等相聚京師，縱談大計，並到處演說、運動，冀有所成。及請願失敗，化龍等各歸鄉里，領導地方，憤於清廷立憲之無誠意，鬱鬱不得志。一九一一年五月皇族內閣成立，士民譁然，各省諮議局聯合會集議彈劾之，湯與副議長張國淶被舉為湖北軍商學界代表赴京師，上疏極論皇族內閣之非及政府施政之乖謬，清廷下詔譴責，湯知事無可為，乃轉而同情革命^{①⑦}。

武昌革命爆發，眾欲推黎元洪為都督，元洪初不應，乃議由湯化龍組織軍政府，化龍以不諳軍事辭，任政事部長，仍以黎元洪為都督。政事部人選，若張國淶、夏壽康、胡瑞霖、劉賡藻、石山儼、沈維周等，幾全是立憲派人^{①⑧}，這激起革命派的反對，化龍旋轉任法制局長。雖然如此，湯仍然為湖北軍政府中在政事上資歷最高的人物。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日，袁世凱派蔡廷幹、劉承恩為代表至武昌議和，表示如能承認君主立憲，兩軍即可息戰，湯化龍代表武昌方面答云：

今日蔡、劉二君來到武昌，我等同胞極為歡迎。但是我們武昌此次首義，並非專行種族革命，實政治革命。我中華民國據有二十二行省，內有漢滿蒙回藏五大族，求五族平等，所以必須改建五族共和。處現在二十世紀時代，君主國逐漸減少，民主國日益增多，如能按照共和制度，實事求是，則滿清永久立於優待地位，享共和幸福，較之君主時代之危險，至有世世子孫莫生帝王家之慘，勝百倍矣。我想清廷真有覺悟，順應潮流，必以吾言為然，請蔡、劉二君轉達

^{①⑦} 「中國革命記」第二冊傳記頁三～四；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頁三九五～四一〇；「辛亥革命回憶錄」(一)頁一〇八。

^{①⑧} 吳玉章「辛亥革命」頁二一；李時岳「辛亥革命時期兩湖地區的革命運動」頁八一。

項城，不必固執也^⑨。

由此可以看出湯在湖北軍政府中的地位，亦可以看出武昌革命爆發後湯的思想一斑。

不過，湖北的革命力量，實以共進會、文學社和當地新軍力量為主，在革命初起時，需要網羅各方面的力量，湯化龍以立憲派首要受重用，黃興以同盟會領袖身份前往受拜為總司令，都是暫時的合作。黃、湯諸人受當地革命黨人的排擠是可以理解的，故漢陽失守，黃興東下至滬，化龍亦隨黃興而去。或謂湯之離鄂，係因其在通電各省諮議局響應武昌後，復密電清廷，表示「不甘心附逆」，事為湖北革命黨人偵悉，湯不自安，才隨黃興走滬。湯化龍離開湖北，對他的政治前途有決定性的影響，此後他在政壇上的角色是全國性的，而非地方性的。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黃興任陸軍部長，黃以化龍為秘書長，因湖北方面反對，湯復赴滬。此後，湯轉與袁世凱相結，先組共和建設討論會，繼受袁命，赴日迎梁啟超，聯合梁啟超，將共和建設討論會擴大為民主黨。由於他有多方面的運動力量，不僅在國會議員選舉的時候當選為眾議員，更在國會成立的時候當選為眾議院議長。其後又佐梁啟超將民主、統一、共和三黨合組為進步黨，梁、湯皆被選為進步黨理事，湯的政治運動費，據說由袁世凱付出者，即有一百萬之多^⑩。可以看出，袁確在拉攏各方，培植國民黨的反對派。

三、組織與運動

政黨組織的要素，黨魁而外為黨綱、行政組織、黨員和黨費。黨綱是政黨的政治主張，政黨以黨綱為號召，屬於思想的層面，需要借助於宣傳。行政組織指各級黨部，黨員為構成各級黨部的主體，黨費則為政黨組織和運動的血脈。

(1) 國民黨

黨綱 國民黨的政治主張，淵源於清季革命時代，以三民主義為中心思想。與中會的秘密誓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包括民族、民權二主

^⑨ 「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三五三。

^⑩ 「武昌首義」頁三九二；「辛亥革命回憶錄」(一)頁一〇八～一〇九；沈雲龍「近代史事與人物」頁一六一～一六二。

義，與中會後期，將「平均地權」納入誓詞，作為民生主義。光復會、華興會及其他革命團體多只倡民族主義，較為激烈的鄒容、陳天華，兼倡民族、民權。同盟會的秘密誓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包括民族、民權、民生三主義，但許多會員並不贊同平均地權的主張，胡漢民就曾為此與孫中山辯論終宵^⑩。其後一度與同盟會聯合的光復會人，大都只傾心民族主義；自同盟會分出的共進會，則只言民族、民權，不言民生。

民國建立，同盟會改秘密為公開，標榜以「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為宗旨，政綱九條：①完成行政統一，促進地方自治；②實行種族同化；③採用國家社會政策；④普及義務教育；⑤主張男女平權；⑥實行徵兵制度；⑦整理財政，厘定稅制；⑧力謀國際平等；⑨注重移民墾殖事業。同盟會因政綱中有「採用國家社會政策」、「主張男女平權」等項，當時被認為是激進的政黨，或社會主義的政黨。實際上，同盟會實際負責人宋教仁因急於實現民主政治，既忽略了一九〇六年同盟會宣言中的建國三程序，更沒有把民生主義的理想具體的納入政綱中。除政綱九條外，從同盟會日後的宣傳和運動中尚可看出其他方面的主張，譬如政黨內閣、軍國主義、側重實際教育、融合國粹並吸收歐西文化等^⑪。

一九一二年八月，同盟會聯合其他五個政團改組為國民黨。國民黨由於是聯合諸政團而成，政綱益趨溫和，標明以「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為宗旨，放棄了同盟會的以「實行民生主義為宗旨」。政綱五條：①保持政治統一，將以建單一之國，行集中之制。②發展地方自治，將以練國民之能力，養共和之基礎，補中央所未逮。③厲行種族同化，將以發達國內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風之效。④採用民生政策，將以施行國家社會主義，保育國民生計；以國家權力，使一國經濟發達均衡而迅速。⑤維持國際和平，將以尊重外交之信義，維持均勢之現狀，以專力於內治。取此以與同盟會的政綱相比，被放棄的有男女平權、義務教育、徵兵制度等，皆為遷就被合併的小黨之故^⑫。

國民黨的政綱，除見於宣言書者外，尚可於宋教仁所草的「大政見書」中略窺一斑。宋教仁的政見，有如在政黨領袖一節中介紹宋教仁時所引述，不外議會政治、政黨內閣、和三權分立政治。孫中山雖宣揚民生主義，但對政治運動的實際

^⑩ 「辛亥革命回憶錄」(一)頁一七。

^⑪ 張玉法「民初國會的激進派政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七期。

^⑫ 同上。

指導，亦主張兩黨政治、政黨內閣。證諸國民黨的宗旨為「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當時國民黨的政治綱領不外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同盟會秘密時代的革命理想多已犧牲^⑭。雖然如此，國民黨政綱中的「厲行種族同化」屬民族主義，「發展地方自治」屬民權主義，「採用民生政策」屬民生主義，三民主義的輪廓仍厘然可見。

宣傳 國民黨的宣傳，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為刊布報紙雜誌，一為口頭演說。口頭演說，甚為普遍，前論述政黨領袖時，曾介紹孫中山、黃興在各地的演說，一般黨員演說發表政見者亦所在多有，如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張繼在南昌國民黨支部演說，闡述國民黨政綱，其言云：

中央集權，萬不可行。……地方自治，須就一省著手。……著手之法有三：一調查戶口，二修築道路，三研究衛生。……至省長一事，本黨主張民選。……又如政黨內閣，亦為本黨擬定之政見^⑮。

此類演說，有時對象是本黨黨員，有時對象是社會大眾，均能使國民黨的政綱與政策獲得廣泛的了解。

刊佈報紙雜誌，為當時利用傳播工具最普遍的宣傳方法。國民黨的此類宣傳機構，遍佈全國各地，而以上海、京津、武漢三地為中心。上海的國民黨報，包括同盟會時代在內，重要的有以下各家：

①民立報：創刊於一九一〇年十月十一日，于伯循主辦，于任社長兼主筆，吳忠信任總經理，章士釗（非同盟會人，一九一二年五月離職）、徐血兒先後任總編輯，先後參與編務及筆政者有宋教仁、張季鸞、葉楚傖、馬君武、景耀月、呂志伊等人，任外勤者有陳其美等人，經濟支助人為上海中國區商會會長沈縵雲。武昌革命爆發後，大量刊佈革命消息^⑯，民初標榜共和主義，宣揚同盟會及國民黨的政綱政策。一九一三年九月四日停刊。

②天鐸報：創刊於一九一〇年三月十一日，原為浙人湯壽潛辦，初由陳訓正（陳布雷之兄）任社長，後讓渡給粵人陳芷蘭，李懷霜為總編輯，戴傳賢為總

^⑭ 王德昭「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分析研究」，吳相湘編「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二冊頁一四一～一四三。

^⑮ 「張溥泉先生全集」頁一五六。

^⑯ 張雲家「于右任傳」頁六九～七二；朱宗良「辛亥革命時期之報紙」，董顯光等著「新聞學論集」（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四十年）頁一六六～一七三；「張溥泉先生全集」頁三四八。

主筆，參與撰文者有陳布雷、柳亞子等^⑩。民初標榜自由主義，為自由黨的機關報^⑪，社會黨亦假以宣傳，與同盟會接近，對袁世凱、章炳麟和親袁的黨派都持反對態度^⑫。

③民權報：創刊於一九一二年四月，標榜自由民權，為同盟會的機關報，主筆周浩、戴傳賢，編輯有何海鳴、徐天嘯等。對袁世凱、章炳麟、張謇、熊希齡及擁袁黨派持反對態度^⑬。

④太平洋報：創刊於一九一二年四月，同盟會的機關報，由姚雨平發起，朱少屏任總經理，葉楚傖任總編輯，宣揚共和主義。到十月，因資紕停刊^⑭。

⑤中華民國報：一九一二年七月發刊，鄧家彥辦，手下有陳匪石、劉畏民、胡樸安等。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鄧被捕入獄。該報由汪洋接辦，不久停刊^⑮。

⑥民國新聞：創刊於一九一二年七月，邵元冲主之，汪兆銘為主筆，助之者有寧調元等^⑯。

⑦神州日報：創刊於一九〇七年，民初由汪彭年主持，接近同盟會。至袁稱帝時，汪因受威脅，讓與孫震東接辦^⑰。

⑧公論報：創刊於一九一三年，吳敬恒、蔡元培主之。宋案發生，鼓吹討袁，二次革命失敗後，二氏赴歐^⑱。

⑨民強報：創刊於一九一二年五月，或謂為大同民黨的機關報，接近同盟會^⑲；或謂為共和建設討論會與共和促進會的機關報^⑳。

至於期刊，中文的以創於一九一三年五月的「國民」月刊為主，由國民黨上海交通部發行，執筆者有戴傳賢、王寵惠、邵元冲等。西文的以創於一九一二年四月六日的「共和西報」(*Republican Advocate*)為主，共和西報是週刊，為國民黨的對外

⑩ 張玉法「近代中國書報錄」，「新聞學研究」第九集頁四四七；朱宗良前引文。

⑪ 「支那ニ於ケル政黨結社」頁一三五。

⑫ 「支那ニ於ケル政黨團體紀要」頁六五。

⑬ 「支那ニ於ケル政黨結社」頁一二四；「支那ニ於ケル政黨團體紀要」頁六五；前引朱宗良文。

⑭ 「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一〇〇二；前引朱宗良文。

⑮ 「辛亥革命回憶錄」(四)頁八〇～八一；前引張玉法「近代中國書報錄」頁四六三。

⑯ 「支那ニ於ケル政黨結社」頁一二五；前引朱宗良文。

⑰ 「辛亥革命回憶錄」(四)頁七九。

⑱ 「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七三二。

⑲ 「支那ニ於ケル政黨結社」頁一二五。

⑳ 「支那ニ於ケル政黨團體紀要」頁六六。

宣傳刊物，常譯載民立、民權、民強、民國新聞、太平洋、民聲、神州等報的社論，至一九一三年九月停刊^⑳。

京津兩地宣統年間為同盟會人策動中央革命之地，自那時就辦有革命報紙。武昌革命爆發後，繼之南北統一，北京為民國的首都所在，成為政黨活動的中心，出版的宣傳刊物不少。國民黨在北京的報刊，重要的有：

- ①國風日報：創刊於一九一一年，同盟會員白逾桓、陳家鼎主之，鼓吹中央革命。民國成立，轉為國民黨的機關報。宋案、大借款事起，著文指袁為民賊，引起軍警注目，社員三人因此被捕^㉑。
- ②國光新聞：創刊於一九一一年，同盟會員田桐、景定成主之，鼓吹中央革命。民國成立後，改名國事新聞，時批評袁政府闕失，袁曾使農商次長張仲華以十萬元賄之，不納。宋教仁被殺後，該報編輯龔國煌曾為文申討，因被通緝^㉒。
- ③亞東新聞：創刊於一九一二年五月，宋教仁委仇鰲、易象、張琴所辦，日出對開紙兩大張，以宣傳政黨政治為主。宋教仁以「桃源漁父」為筆名，常在該報發表政論。二次革命起，張琴著論勸袁辭職，被警廳逮捕，報館亦被封^㉓。
- ④中央新聞：創於武昌革命爆發後，曾攻擊趙秉鈞、烏珍等。
- ⑤守真日報：創於一九一二年，同盟會人所辦^㉔。

此外，北京方面屬於國民黨系的報紙尚有大國民日報（景耀月）、大聲報、民生報（張我華）、民蘇報（周亮三）、醒華報（王湘、龔煥辰）、民主報（馬君武）等^㉕，天津方面有國風日報、民意報、中華民報、天民報、民國報、民約報等^㉖。

武漢為辛亥革命首義之地，又為兩湖民黨活動的中心，國民黨在此地發刊報紙甚多，重要的有：

^⑳ 胡道靜「上海的定期刊物」，「上海市通志館期刊」一卷三期頁八六三。
^㉑ 張玉法「近代中國書報錄」，「新聞學研究」第九集頁四五八；「各省光復」（中）頁三六六。
^㉒ 「湖北革命知之錄」頁一二六～一二七、一四〇；前引張玉法「近代中國書報錄」頁四五八；「支那ニ於ケル政黨結社」頁一二三。
^㉓ 「辛亥革命回憶錄」（一）頁四四八；「民國之精華」頁二四〇。
^㉔ 二報見「支那ニ於ケル政黨結社」頁一二三。
^㉕ 日本參謀本部「支那政黨史」頁九一～九二。
^㉖ 「支那ニ於ケル政黨結社」頁二二～二三、一二三。

- ①大江報：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創於漢口，革命黨人詹大悲、何海鳴、黃侃、胡瑛等主之，次年文學社成立，爲其機關報，旋被封¹³⁵，詹、何被捕。武昌革命爆發後，詹、何出獄，於漢口組軍政分府，爲黎元洪所忌。詹、何將大江報重新出版，取激進路線，與同盟會接近。時中國社會黨人江亢虎至漢，投稿該報，鼓吹社會主義，何海鳴並著論爲之發揮。黎元洪藉此查封大江報，捉拿何海鳴。何逃上海，入民權報館，大江報編輯凌大同爲此被殺¹³⁶。
- ②民心報：一九一一年冬創於漢口，蔡寄鷗主之¹³⁷，爲同盟會的機關報，石瑛爲經理。大江報被封的次日，蔡寄鷗在民心報著文攻擊黎元洪，報遂被封¹³⁸。
- ③震旦民報：一九一二年春創刊於漢口，張振武出資所辦，張芸天爲經理，方覺慧任協理，初擁黎元洪。自張振武與孫武相爭後，言論爲之一變。張振武被殺後，激烈反黎。嗣以經費無著，由同盟會派鄧狂言、劉天讒、蔡寄鷗等接辦，以反黎反袁爲目標，與共和黨的羣報筆戰不已，後爲黎所封。
- ④民國日報：一九一三年一月創刊於漢口法租界，由湖南都督譚延闓出資，由黃九言、曾毅、楊端六等主辦，出版不及半年，黎元洪照會法租界，謂該社內儲有械彈，遂被查封。
- ⑤自由日報：一九一二年創於漢口，原爲自由黨的機關報，自由黨漢口支部負責人陳醒黃爲社長，言論激進，與國民黨接近，後與民國日報同被查封。陳與國民黨交通部庶務幹事劉化歐逃到江西，住國民黨九江交通部，二人於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被捕，劉判十年監禁，陳遇害¹³⁹。
- ⑥大漢報：一九一一年十月創刊於漢口，爲同盟會員胡人杰（字石菴）所辦，黎元洪資助五千元爲開辦費，因贊助共和有功，黎每月予津貼。黎曾勸胡入共和黨，但爲所拒。二次革命期間，該報處超然地位，對兩方不是皆直言無諱，黎戒之，不聽。該報編輯余慈舫爲國民黨員，黎指其與李烈鈞有密切關係，被捕殺¹⁴⁰。

¹³⁵ 前引張玉法「近代中國書報錄」。

¹³⁶ 蔡寄鷗「鄂州血史」頁二一四～二一五。

¹³⁷ 前引張玉法「近代中國書報錄」。

¹³⁸ 「鄂州血史」頁二一五。

¹³⁹ 震旦、民國、自由三報見「鄂州血史」頁二一五～二一七及前引張玉法「近代中國書報錄」。

¹⁴⁰ 「鄂州血史」頁二一七；「黎黃陂軼事」頁一八、三七、五一。

⑦經濟雜誌：一九一二年春創於武昌，主持人為財政司參議王世杰。王為同盟會員，國民黨支部幹事，後因王出洋留學，無人主持，停刊。

⑧教育雜誌：一九一二年春創於武昌，省議員張國恩主辦。張為同盟會員，國民黨支部幹事。後因民心報查封後，其機器交由該社保存，遂予查封^⑭。武漢報紙原有二十餘種，二次革命之際，反袁報紙皆被封禁，其出版者僅三數家擁袁報紙而已^⑮。

除上海、平津、武漢三地外，其他各地亦有許多國民黨的機關報，如江西支部所辦的「預章日報」^⑯、長沙支部所辦的「民國日報」^⑰等。但到二次革命前後，各地國民黨報紛紛被封，僅廣東就有六家國民黨報被封^⑱。國民黨在宣傳的聲勢上，也就大減了^⑲。

組織 國民黨的組織，淵源於清季革命時代。興中會之設，有本會，有支會（或稱分會）。同盟會之設，有本部，有支部，有分會。一九一二年三月同盟會改為公開政黨後，發表會綱三十四條，其對組織的規定，要點如下：

①本會設總理一人，協理二人，由全體會員選舉。下置幹事部，分為五部：(一)總務部，(二)交際部，(三)政事部，(四)理財部，(五)文事部。每部設主任幹事一人；主任幹事由會員選舉十人，呈總理選任。每部分設各科，科員若干人，由各該部主任幹事薦任。各部幹事會每年改選一次，但得連選連任。

②本部設評議部，評議員由本部會員選出，每省以一人以上、四人以下為限，任期一年。評議部決議本會章程及一切臨時發生事項。

③各支部得自定支部章程，但不得變更本會之宗旨及政綱。各支部每半年須以支部之黨員名冊及會務情況報告於本部。

④本會全體大會，每年開會一次，各支部皆派代表蒞會。常會每季開一次，只限於本部會員。

實際的組織，並未按章程辦理。可知者，總理孫中山，協理黃興、黎元洪，由選舉

⑭ 「鄂州血史」頁二一八。

⑮ 「黎黃破軼事」頁五一。

⑯ 「民國之精華」頁四〇七。

⑰ 馬五「我的生活史」頁一六～一七。

⑱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XLV, No. 1, pp. 65-70.

⑲ 黃遠庸謂二次革命發生後，各地國民黨報未被封者，僅言論較溫和的大同報、大中華日報、民國日報等數家，見「遠生遺著」卷二頁一五五。

產生，另選出主任幹事平剛、劉揆一、宋教仁、李肇甫、胡漢民、張繼、汪兆銘、居正、田桐、馬君武等十人，但總理如何從選出的十個主任幹事中遴選五人為總務、交際、政事、理財、文事五部主任幹事，則不詳。或謂孫中山指定汪兆銘、張繼任總務，馬君武、田桐任文書，居正任財務；如是則交際、政事二部缺如，而文書、財務二部名稱，亦與會綱所規定者不符。或謂汪兆銘掌庶務，宋教仁掌政治，張繼掌社會，李肇甫掌交際，居正掌財政，會綱上並無社會部的規定，而庶務、政治、財政三部名稱亦與會綱所規定者不符。但到本部移北京後，總務、理財、交際、文事、政事五部，則已完全按照會章設立。

評議部的選舉未見記載，同盟會改為公開政黨開會選舉職員時，曾選出安慶、天津、潮州、南昌、杭州、廣州、福州、嘉興、紹興、處州、寧波、武昌、上海、湖州等十五處支部代表二十七人。其中浙江七個支部十四人，約占總額的一半；廣東二個支部四人；安徽、福建、湖北各一個支部，每個支部各二人；直隸、江西、江蘇各一個支部，每個支部各一人。如果以此二十七人組織評議部，並不合會章的規定，因為會章規定每省選出一至四人，而浙江省竟選出十四人之多。

支部的組織，除設支部長、副支部長外，大體與本部同。見於記載的，上海支部和南京支部均設總務、交際、政事、理財、文事五科，另有評議員。有些支部尚有分部的設置，如廣東支部設有西寧縣分部¹⁰。可以看出，同盟會的組織發展已注意縣級的基層，不是只集中在大都市。

國民黨成立後，組織的基礎擴大，本部的組織，廢黨魁獨裁制，改為合議制，選理事九人，推孫中山為理事長。同時廢評議部，改設參議三十人。本部除九理事、三十參議外，另有五部一會的組織，五部組織與同盟會時期略同，總務、交際、政事、文事四部名稱照舊，理財部改名會計部。一會為新添，名「政務研究會」。五部一會的編制非常龐大，除各設主任幹事二人外，總務部設主管幹事及幹事共四十六人，交際部設主管幹事及幹事共二五六人，政事部設主管幹事及幹事共一四八人，文事部設主管幹事及幹事共一五一人，會計部設主管幹事及幹事共二十六人，政務研究會設主管幹事及幹事共三三〇人。共九六九人。由於編制龐大，能包羅各方面的人物，不僅可以使運動面廣，而且富有滲透力。

國民黨的地方組織，也較同盟會時期為龐大。除支分部外，另有交通部。交通

¹⁰ 張玉法「民初國會中的激進派政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七期。

部設於交通便利的大都市，上海、漢口、九江、蕪湖、保定、寧波，以及加拿大的域多利和日本的神戶皆設有交通部。交通部設執行部為最高行政機構，執行部設部長、副部長。下設總務、政事、文事、交際、會計五處，各處設主任幹事及幹事。另置評議部，設部長、副部長及議員。支部設於各省重要城市，鎮江、南京、長沙、南昌、開封、蘇州、太原、天津、廣州、蕪湖、安慶、武昌、福州、溫州、昆明、西安、桂林、瀋陽、濟南、吉林、杭州、長春、重慶、成都等地，以及美國的舊金山、日本的東京和橫濱等地，都設有支部。支部設正副支部長，分科辦事，下有總務、政事、交際、文事、理財五科。另置評議部議長、副議長及議員。分部設於較小的城鎮，大城設有交通部者，亦有另設支部（如蕪湖）或分部（上海）者。分部設正副部長及評議部正副議長和議員。辦事職員的編制，如支部^⑬。

黨員 國民黨是一個組織龐大的政黨，本部職員近千人，各地交通部及支分部職員，從數十人到百餘人不等。黨員的數目，不能確知。部分資料顯示，有些支分部有數千黨員，據此估計，全國應有數十萬人。限於資料及篇幅，此處無法將全部黨員拿來作分析，只能選取一部分作為示例。此處擬作兩種示例性的分析，一為國民黨籍國會議員的分析，一為本部、交通部、支分部重要職員和著名黨員的分析。

國民黨籍國會議員的資料大體完整，以年齡而論，參議院國民黨議員一四一人，平均三六·五五歲，較進步黨少〇·七五歲。眾議院國民黨議員三〇七人，平均三三·一九歲，較進步黨少四·七一歲。兩院平均，國民黨三四·九歲，較進步黨少二·七歲。就教育背景而論，兩院中國國民黨議員有傳統功名者四十五人，佔全體議員百分之九·〇二，較進步黨少百分之〇·五九。兩院中國國民黨議員受新式教育者二三八人，佔全體議員百分之四七·六九，較進步黨多百分之一四·〇二。國民黨議員之所以激進，部分原因與年齡較輕和受新式教育者較多有關^⑭。

國民黨本部、交通部、支分部重要職員及著名黨員，此處僅舉出一百名作為示例，茲先列其姓名、字號、籍貫、年齡、學歷、黨職如下：

^⑬ 張玉法「民初國會中的激進派政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七期。

^⑭ 張朋園「從民初國會選舉看政治參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七期頁二五～二七。

姓名	字號	籍貫	年齡 (1912)	學歷	經歷	黨職
于伯循	右任	陝西三原	35	舉人	同盟會員，民立報主筆，交通部次長	參議
王人文	采丞	雲南大理	49	進士	四川布政使，同盟會員，國民公黨協理，參議員	理事
王正廷	儒堂	浙江奉化	30	北洋大學，耶魯大學	明德中學教員，工商次長，參院副議長	上海交通部名譽幹事
王用賓	太蕤	山西猗氏	32	日本法政大學	同盟會員，臨時省議會議長，參議員	山西支部副支部長
王守愚	玄一	湖北京山		藝師養成所	士兵，文學社員	漢口交通部評議員
王芝祥		直隸通縣	44	舉人	廣西布政使，廣西副都督，袁世凱的軍事顧問	理事
王法勤	勳齋	直隸高陽	35	秀才，留日	諮議局議員，臨時省議員，參議員	直隸支部副部長
王觀銘	咸三	直隸寧晉	33	直隸優級師範，日本早稻田大學師範科	同盟會員，省議會副議長，參議員	直隸支部幹事
王寵惠	亮疇	廣東廣州	30	北洋大學，耶魯大學	同盟會員，外交總長，司法總長	理事
仇亮	式匡	湖南湘陰		日本士官學校	同盟會員，南京臨時政府陸軍部司長	會計部主任幹事
仇鰲	奕山	湖南湘陰	34	日本法政大學	同盟會員，湖南民政司長	政治部幹事，湖南支部副支部長
田桐	梓琴	湖北蕪州	33	留日	同盟會員	參議
石蘊光	青陽	四川南里	34	秀才，日本蠶桑學校	同盟會員	重慶支部幹部
李根源	雲生	雲南騰越	34	日本士官學校	同盟會員，雲南講武堂監督，衆議員	雲南支部長
李烈鈞	協和	江西武寧	31	江西武備學堂，日本士官學校	同盟會員，江西新軍管帶，江西都督	參議，江西支部理事長
李肇甫	伯申	四川巴縣	27	日本法政大學	共進會員，總統府秘書，衆議員	交際部主任幹事
李懷霜		廣東	32		天鐸報主筆，自由黨首領	上海交通部評議員
宋教仁	漁父	湖南桃源	31	武昌文普通學堂，日本早稻田大學	華興會員，同盟會員，民立報主筆，農林總長	理事
谷鍾秀	九峯	直隸定縣	40	生員，北京法政學堂，日本早稻田大學	諮議局議員，衆議員	政事部主任幹事
沈秉堃		湖南長沙	50	監生	雲南布政使，廣西巡撫，統一共和黨幹事	參議
呂志伊	天民	雲南思茅	31	舉人，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科	同盟會員，民立報撰述	黨員
何海鳴	時俊	湖南衡陽	27		司法部次長，參議員，新軍副目，文學社員，大江報主筆	黨員
沈懋昭	縵雲	江蘇無錫			商人，民立報出資人，上海軍政府財政部長	上海分部副部長
吳景濂	蓮伯	奉天興城	42	舉人，京師大學堂，日本考察	教育會長，諮議局長，衆議員	理事
吳鐵城		江西九江	25	九江同文書院	同盟會員，辛亥參與九江獨立	九江交通部副部長
邵元冲	翼如	浙江紹興		拔貢，浙江高等學堂	同盟會員，鎮江地方審判長	上海交通部評議員
居正	覺生	湖北廣濟	37	秀才，日本法政大學	同盟會員	上海交通部執行部長

林 森	子超	福建閩侯	46	福州英華書院	同盟會員，任職九江關	福州支部長
松 毓	秀濤	吉林 (滿旗)	41		，臨時參議員，參議員 巡警局總辦，響應辛亥 革命	吉林支部長
查光佛	競生	湖北蘄州			文學社員，商務報編輯	漢口交通部評議 員
姚宇龍	雨平	廣東平遠	31	秀才，陸軍速成學堂	同盟會員，參與黃花岡 之役	黨員
姚勇忱		浙江吳興	33		光復會員	上海交通部執行 部副部長
姚錫光	石泉	江蘇丹徒	41	舉人，留日	湖北陸軍學堂監督，陸 軍部侍郎	參議
恒 鈞	詩峯	京兆宛平	25	日本早稻田大學	大同報總理，衆議員	交際部主任幹事
馬 和	君武	廣西臨桂	31	日本西京帝國大學， 德國工學博士	同盟會員，全國鐵路督 辦秘書長，參議員	參議
胡秉柯	質齋	湖 北	30	巴黎大學法學博士	同盟會鄂支部評議員， 參議員	黨員
胡衍鴻	漢民	廣東番禺	34	日本法政大學	民報主筆，廣東都督	廣東支部長
胡 瑛	經武	湖南桃源	27	湖南經正學校，湖北 陸軍學堂	湖北新軍士兵，日知會 案入獄，鄂軍政府外交 部長	參議
胡韞玉	樸安	安徽涇縣	34	附生	同盟會員，中國公學教 員，民立報編輯	上海交通部評議 員
柏文蔚	烈武	安徽壽縣	37	秀才，安徽武備學堂	同盟會員，南京新軍管 帶，安徽都督	參議
徐定超	班侯	浙江溫州	65	進士	翰林院編修，溫州軍政 分府顧問	溫州支部長
徐秀鈞	子然	江西九江		留日	軍國民教育會員，入東 三省總督徐世昌幕，衆 議員	黨員
徐鏡心	子鑑	山東黃縣	38	日本早稻田大學	同盟會員，臨時省議員 ，參議員	濟南支部長
徐 謙	季龍	安徽歙縣		進士	奉天高等審判廳丞，司 法次長	參議
秦毓鎰		江蘇無錫	33	日本早稻田大學	明德中學教員，神州日 報編輯，南京臨時政府 秘書	無錫分部長
貢桑諾 爾布	樂亨	蒙 古	46	留日	蒙古郡王，資政院議員 ，參議員	理事
殷汝驪	鑄夫	浙江溫州	29	日本早稻田大學	衆議員	總務部主任幹事
孫 文	中山	廣東香山	47	香港西醫書院	同盟會總理，臨時大總 統，全國鐵路督辦	理事長
孫道仁	靜珊	湖南慈利	48	藝生	新軍統制，福建都督	黨員
孫毓筠	少侯	安徽壽州	41	稟貢生，留日	同盟會員，萍醴劉案入 獄，安徽都督	參議
張官雲	紀五	直隸東鹿	31	北洋大學	保定德育中學校長，衆 議員	保定交通部長
張治祥	輯五	四川彭山	26	日本法政大學	同盟會員，謀革命入獄 四年，辛亥出獄	成都支部幹部
張培爵	烈武	四川隆昌	31	成都高等學堂	同盟會員，重慶府中學 堂監督	參議
張 琴	治如	福建莆田	36	進士	京師閩學堂監督，亞東 新聞主筆，衆議員	參議
張瑞璣	衡玉	山西趙城		進士	縣知事，財政司 長，參議員	黨員

張鳳翽	翔初	陝西咸寧	40	秀才，陝西武備學堂，日本士官學校	同盟會員，陝西新軍參謀長，陝西都督	理事
張耀曾	榕西	雲南大理	24	東京帝國大學法科	雲南雜誌編輯，衆議員	政務研究會主任
張繼	溥泉	直隸滄州	31	日本早稻田大學	明德中學教員，同盟會員，參議院議長	幹事，燕支部長
莫永貞	伯衡	浙江安吉	35	日本早稻田大學	省議會議長	參議
陳其美	英士	浙江湖州	35	日本警監學校	同盟會員，上海都督，工商總長	黨員
陳炯明	競存	廣東海豐	35	生員，廣東法政學堂	同盟會員，諮議局議員，廣東都督	黨員
陳家鼎	汗園	湖南寧鄉	37	留日	同盟會員	黨員
陳陶怡	劍虹	江蘇金山	33	留日	同盟會員，在南洋活動，辛亥返國	蘇州支部長
陳錦濤		廣西南海		法政進士	大清銀行副監督，財政部駐外財政員	參議
常恒芳	藩侯	安徽壽州	30	日本大學法科	光復會員，臨時參議員，衆議員	安慶支部長
曹茂瑞	亞伯	湖北興國	38	兩湖書院，牛津大學	同盟會員	黨員
蒙經		廣西藤縣		舉人，日本法政大學	同盟會員，諮議局議員	廣西支部長
湯漪	斐子	江西泰和	31	舉人，日本慶應大學	臨時參議員，衆議員	政事部主任幹事
葉楚傖		江蘇吳縣	30		民立報記者	上海交通部評議員
彭允彝	靜仁	湖南湘潭	34	日本早稻田大學	臨時參議員，統一共和黨幹事，衆議員	文事部主任
溫世霖	支英	直隸天津	42		參加國會請願，被充軍新疆，衆議員	燕支部幹事
溫宗堯	欽甫	廣東	34	香港中央書院	兩廣電報局長，國民公會副會長	參議，上海交通部執行部副部長
溫壽泉	靜菴	山西洪洞		日本士官學校	小學教習，山西軍務司長	山西支部副支部長
覃振	理鳴	湖南桃源	28	東京宏文書院	同盟會，臨時參議員，衆議員	黨員
黃炎培	韜之	江蘇上海	33	舉人，留日	滬東中學校監督，諮議局議員	蘇州支部幹事
黃興	克強	湖南善化	38	秀才，兩湖書院，留日	同盟會員，陸軍總長，漢粵川鐵路督辦	理事
曾昭文		河南光山			同盟會員	參議
景定成	梅九	山西安邑		留日	同盟會員	山西支部幹部
景耀月	太昭	山西芮縣	31	山西大學堂，留日	同盟會員	參議
鈕永建	惕生	江蘇上海	43	舉人，日本士官學校	同盟會員，松江都督府參謀次長	黨員
楊王鵬	子鬯	湖南湘鄉			士兵，慕治學社社員，參與武昌革命	漢口交通部幹事
楊永泰	暢卿	廣東	33	北京滙文大學	參與辛亥革命，衆議員	粵支部黨員
楊策	貽珊	吉林吉林	33	日本警監學校	吉林巡警局長，吉林都督府副官	吉林支部長
楊增新	鼎臣	雲南蒙自	53	進士	新疆提法使，新疆都督	參議
褚輔成	慧僧	浙江嘉興	41	監生，日本東洋大學警政科	同盟會員，教員，諮議局議員，衆議員	參議

鄒魯	海濱	廣東大埔	28	韓山書院，廣東法政學校	同盟會員，諮議局書記，衆議員	黨員
董耕雲	話年	吉林長春	48		衆議員	長春支部長
鄧家彥	孟碩	廣西臨桂		留日	同盟會員	上海交通部評議部長
詹大悲	質存	湖北蘄春		黃州府中學	文學社文書部長，大江報主筆，入獄	漢口交通部副部長
解榮祿		山西萬泉	48	進士，日本法政大學	同盟會員，山西大學堂監督，諮議局議員	晉支部幹部
趙炳麟	竺垣	廣東全縣	34	進士	翰林院編修，衆議員	參議
趙戴文	次隴	山西五臺	46	山西令德堂（山西大學堂），東京宏文書院師範科	同盟會員，山西軍政府秘書廳長	晉支部幹部
廖恩熙	仲愷	廣東惠陽	35	日本中央大學政經科	同盟會員，廣東財政司副司長	黨員
閻錫山	伯川	山西五臺	30	日本士官學校	同盟會員，新軍標統，山西都督	參議，晉支部長
蔡大輔	雲舫	湖北京山		兩湖師範	新軍士兵，文學社員	漢口交通部評議員
劉綿訓		山西潞氏	26	進士，日本法政大學	同盟會員，法政大學監督，諮議局議員	晉支部幹部
蔣中正	介石	浙江奉化	26	日本振武學校	同盟會員，參與杭州光復	黨員
蔣伯夔	翊武	湖南醴縣	36	中國公學	新軍士兵，文學社長，北京政府軍事顧問	參議，漢口交通部執行部長
戴傳賢	季陶	四川廣漢		日本大學	同盟會員，天鐸報、民權報主筆，全國鐵路督辦公秘書	上海交通部評議員
魏宸組	注東	湖北	24	留法	臨時政府外交次長，國務院秘書長	總務部主任幹事
蕭輝錦	實中	江西永新		舉人	諮議局議員，衆議員	南昌支部文事科主任

上表一百人，就籍貫而論，廣東、湖南各十三人，湖北、浙江、直隸、山西各九人，江蘇七人，安徽、江西、四川各五人，吉林、雲南各三人，廣西、福建、陝西各二人、河南、山東、奉天、蒙古各一人。關內十八省，只貴州、甘肅沒有黨員列入。重要黨員最多者為廣東、湖南二省。就年齡而論，可查者八十二人，平均三五·三七歲，與兩院國民黨議員平均三四·九歲比較，僅多〇·四七歲。就教育背景論，除不詳者十一人不計外，純受傳統教育者十五人，佔百分之一六·八五；受新式教育者七十四人（其中二十四人先受傳統教育再受新式教育），佔百分之八三·一五；受留學教育者六〇，佔百分之六七·四二。此一教育背景，與兩院國民黨議員教育背景略似，兩院國民黨議員，受傳統教育者佔百分之一五·九〇，受新式教育者佔百分之八四·一〇。就職業分，議員三十九，官僚三十，新聞界八，軍人三，政客二，教育界、商界各一，不詳十六。就黨職分：理事九，參議二〇，交通部及支分部長副二二，幹事一五，評議員八，黨員（包括不詳黨職之幹部）二

六。

黨費 國民黨的黨費，見於記載的，有三種來源，一為黨員入黨費，二為在中央和地方任行政主管的國民黨員之籌措，三為黨員的自由捐輸。

黨費的來源，依照一九一二年三月所發佈的同盟會會綱，有三種：一為入會捐一元，二為常年捐二元，三為對會員募集特別捐^⑭。但是年八月所發佈的國民黨規約，僅有「黨員入黨時須納入黨金一元」的規定^⑮，別無常年捐及特別捐的辦法。嚴格說來，入黨費只是對黨員設限的一種規定，並不是籌集黨費的主要辦法。

國民黨的黨費，主要是由在中央和地方任行政主管的國民黨員設法籌措的。在中央任行政主管的國民黨員，譬如全國鐵路督辦孫中山和漢粵川鐵路督辦黃興曾討論到籌集黨費問題。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孫中山電賀黃興就任漢粵川督辦，並請其接濟國民黨本部經費，電中云：

聞兄接辦粵漢，喜慰無已。弟所籌路策，現已訂立條例，派人往京呈總統交參議院，俟通過後再定行止。近得北京本部消息，存款將盡，弟處將無從為力，望兄設法接濟，以速進行為荷。

黃以方就斯職，經費無從籌措，覆電云：

北京本部款盡，弟處亦無法籌措，仍請密電梁燕孫再撥前款數萬兩接濟，並希電覆^⑯。

此兩電所顯示的意義有三：①所謂「弟處將無從為力」，似前此曾經資助。②黃望孫電覆找款結果，對黨費問題自極關心，如有可能，彼必資助。③梁士詒對國民黨曾加以資助。至於梁何以資助國民黨，可能的原因有二：其一、當時國民黨與袁政府的關係甚好，袁可能透過其秘書長梁士詒對國民黨資助。其二、梁為廣東人，與孫中山為同鄉，亦可能對孫的事業加以資助。但就梁與袁的關係來說，梁不可能私通國民黨，必然是得袁的允許，企圖以金錢安撫國民黨的。

地方行政首長為國民黨員者為湘督譚延闓、皖督柏文蔚、贛督李烈鈞、粵督胡漢民和陳炯明。北京國民黨本部的一切費用，主要由這四省負擔。惟湘皖二省，對國民黨的資助較少，資助較多者為贛粵二省。贛督李烈鈞資助國民黨本部和國民黨國會議員，是透過江西籍眾議員徐秀鈞的^⑰。故到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袁世凱下

^⑭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七八～八二。

^⑮ 民國元年八月三十一日「民立報」，國民黨規約。

^⑯ 引見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三一七。

^⑰ 「張溥泉先生全集」頁二四〇。

令褫奪國民黨國會議員證書並解散國民黨時，指斥「李烈鈞先後接濟該黨本部鉅款，動輒數萬，復特別津貼該黨國會議員以厚資」¹⁵⁴。

廣東方面資助國民黨本部經費是由粵籍眾議員鄒魯經手的¹⁵⁵。國民黨三督被免職後，國民黨議員集上海，聯電陳炯明請求接濟，陳時奉命繼胡漢民為粵督，即電滙十萬元，以資接濟¹⁵⁶。陳所電滙的錢來源如何不詳，但有公款在內是可以肯定的。據李朗如回憶，袁世凱曾應陳炯明之請，資助廣東方面國民黨人留學，予李朗如港幣一萬七千元，朱大符、古應芬各五千元，及二次革命發生，均將此款移交孫中山作革命經費之用¹⁵⁷。

黨員自由捐輸的，見於記載的有富商張人傑、工人劉謙祥等。張人傑，浙江吳興人，於法國經營通運公司，獲利甚多，於萍醴瀏之役及黃花岡之役，皆有財力上之貢獻。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回國，佐孫中山從事革命工作，旋用心於商業，二次革命前後，供黨費不少¹⁵⁸。劉謙祥，在南洋宿霧做工，一九一三年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捐全年工金一千元助餉，孫中山曾致函慰勉之¹⁵⁹。

(2) 進步黨

黨綱 進步黨黨綱的演變，與國民黨略同。國民黨的黨綱是由同盟會的黨綱遞變而來，同盟會擴大為國民黨，只吸收了許多小政團加入，仍以原來的同盟會勢力為主，故國民黨的黨綱雖與同盟會有些不同，但還可以看出演變之迹。進步黨雖是由統一、共和、民主三黨合併而成，但進步黨承襲共和黨的地方，較統一、民主二黨為多，不僅共和黨的黨魁黎元洪變成了進步黨的黨魁，而且共和黨黨綱的基本精神，也為進步黨所承襲。梁啟超是民主黨的靈魂，又為進步黨的締造者，但民主黨的黨綱並未納入進步黨，可以看出，梁為了擴充黨勢，一方面向袁世凱妥協，另一方面也向黎元洪妥協。

統一黨以「鞏固全國統一，建設中央政府，促進共和政治」為宗旨，政綱十一條：①團結全國領土，厘定行政區域。②完成責任內閣制度。③融合民族，齊一文

¹⁵⁴ 民國二年十一月四日大總統令，「政府公報分類彙編」（上海掃葉山房北號發行），弭亂。

¹⁵⁵ 鄒魯「回顧錄」第一冊頁五三。

¹⁵⁶ 「近代史資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頁一〇九。

¹⁵⁷ 「辛亥革命回憶錄」(二)頁四一五。

¹⁵⁸ 「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五五三～五五五。

¹⁵⁹ 「國父全集」第五集頁一六七～一六八。

化。④注重民生，採用社會政策。⑤整理財政，平均人民負擔。⑥整理金融機關，發達國民經濟。⑦整理海陸軍備，提倡徵兵制度。⑧普及義務教育，振興專門學術。⑨速設鐵路幹線，謀便全國交通。⑩厲行移民開墾事業。⑪維持國際和平，保全國家權利^⑩。統一黨成立於一九一二年三月二日，次日同盟會公開為普通政黨，所發表的政綱與統一黨的政綱有許多相同的地方。

從政綱上看，兩黨所共同注意者有九大問題：①謀政治統一：統一黨政綱第一條為「團結全國領土，厘定行政區域」；同盟會政綱第一條為「完成行政統一，促進地方自治」。②整理財政，規定稅制：統一黨政綱第五條為「整理財政，平均人民負擔」；同盟會政綱第七條為「整理財政，厘定稅制」。③籌國民生計：統一黨政綱第六條為「整理金融機關，發達國民經濟」；同盟會的宗旨為「實行民生主義」。④採國家社會政策：統一黨政綱第四條為「注重民生，採用社會政策」；同盟會政綱第三條為「採用國家社會政策」。⑤普及國民教育：統一黨政綱第八條為「普及義務教育，振興專門學術」；同盟會政綱第四條為「普及義務教育」。⑥融和民族：統一黨政綱第三條為「融和民族，齊一文化」；同盟會政綱第二條為「實行種族同化」。⑦移民實邊：統一黨政綱第十條為「厲行移民開墾事業」，同盟會政綱第九條為「注重移民墾殖事業」。⑧整軍經武：統一黨政綱第七條為「整理海陸軍備，提倡徵兵制度」；同盟會政綱第六條為「厲行徵兵制度」。⑨爭外交主權：統一黨政綱第十一條為「維持國際和平，保全國家權利」；同盟會政綱第八條為「力謀國際平等」^⑪。此外，統一黨政綱第一條所提到的「完成責任內閣制度」、第九條所提到的「速設鐵路幹線，謀便全國交通」，雖不見於同盟會政綱，但皆為同盟會奮鬥的目標。所異者，只同盟會政綱第五條所提到的「主張男女平權」，未見統一黨提倡，此條到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時亦予放棄。

共和黨的成立，在統一黨成立和同盟會改為公開政黨兩月以後。標明以「防止小黨分裂，便利政務進行，實行共和政治」為宗旨，政綱有三：①保持全國統一，採取國家主義；②以國家權力，扶持國民進步；③應世界大勢，以平和實利立國。此一政綱的精神在翼護政府，使能應付國內外情勢。分析起來，約有四點：即國家統一、中央集權、現實外交、世界和平。取此與同盟會的政綱相比，共和黨政綱第一條第一句的「保持全國統一」，與同盟會政綱第一條第一句的「完成行政統一」，

^⑩ 「支那ニ於ケル政黨結社」頁二九。

^⑪ 空海「論各政黨與中國之前途」，民國元年三月九日「民立報」。

大體相似，但前者範圍較廣。其他可以說全與同盟會政綱不同。取此與統一黨的政綱相比，其爭取「國家統一、中央集權」的目標，與統一黨宗旨中的「鞏固全國統一，建設中央政府」和政綱中的「團結全國領土」接近；其爭取「現實外交、世界和平」的目標，與統一黨政綱中的「維持國際和平，保全國家權利」相似。這可能是統一黨與共和黨容易合併的原因。

民主黨的成立，較統一黨晚六個多月，較共和黨晚四個多月，較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晚一個多月。但民主黨是由共和建設討論會改組而來，民主黨的政綱悉依共和建設討論會之舊，而共和建設討論會成立於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三日，較共和黨為早，較統一黨和同盟會為晚。共和建設討論會的政綱是梁啟超草擬的，自然代表梁啟超的政治主張。梁啟超的政治主張，淵源於清末，其演變分為三個時期：時務報時期主變法，清議報時期主保皇，新民叢報時期主立憲^⑩，也主國家社會主義^⑪。此後他的立憲主義未變，但與革命派的共和立憲不同。梁啟超基本主張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其權力由憲法約束。故在清末主君主立憲，民國建立，力主中央集權。中央集權、立憲政治，可以說是梁啟超的基本政治主張。他為共和建設討論會所草的政見，包括五點：①建立平和大國，俾競立於世界。②最高政府集權，都督不由民選；下級自治團體分權。③推行保育政策（即干涉政策），反對自由放任。④實現完全政黨內閣。⑤實行兩黨政治^⑫。此一政見的草擬雖在統一黨成立和同盟會改公開以後，但似無擷取統一黨和同盟會之處。此後歷五個月，共和建設討論會改組為民主黨，其間有國民黨的成立，但民主黨仍堅持共和建設討論會的政綱。

取民主黨的政綱與各黨比較：「建立和平大國，俾競立於世界」，相當於統一黨的「整理海陸軍備，提倡徵兵制度」和「維持國際和平，保全國家權利」；相當於共和黨的「應世界大勢，以平和實利立國」；略近於國民黨的「維持國際和平」。「最高政府集權，都督不由民選，下級自治團體分權」，第一句相當於統一黨的「鞏固全國統一，建設中央政府」，相當於共和黨的「保持全國統一，採取國家主義」；第一、三句相當於國民黨的「保持政治統一」、「發展地方自治」。「推行保育政策，反對自由放任」，略近於統一黨的「採用社會政策」、共和黨的「以國

^⑩ 「國民日日報彙編」（上海，光緒三十年）第三集，社說。

^⑪ 光緒二十九年梁在「新大陸遊記」中提出這種主張。

^⑫ 民國元年四月十二日共和建設討論會發佈「中國立國大方針商榷書」。

家權力，扶持國民進步」，此點為國民黨政綱所無。「實現完全政黨內閣」，相當於統一黨的「完成責任內閣制度」，此點為共和黨和國民黨政綱所無，但國民黨主張政黨內閣。「實行兩黨政治」，此點為統一、共和、國民三黨政綱所無，但國民黨主張兩黨政治。從此一比較看，入民國後梁啟超的政治主張較接近國民黨，與統一黨、共和黨的主張反較遠，但最後民主黨之所以與統一、共和二黨合併為進步黨，完全是人為的因素。

進步黨的政綱係就共和黨的政綱加以損益，共有三點：①取國家主義，建設強善政府；②尊人民公意，擁護法賦自由；③應世界大勢，增進和平實利¹⁶⁵。取此與國民黨的政綱相比較，僅第三條與國民黨政綱第五條「維持國際和平」有相近處，其他全不相同。唯有些不見於政綱的政策是相同的，如政黨內閣、兩黨政治等。

宣傳 進步黨的宣傳，亦如國民黨的宣傳，除口頭演說外，主要以報刊為媒介。進步黨一派的報刊，不像國民黨報刊那樣單純，第一、進步黨是由統一、共和、民主三黨合併而成，三黨的報刊大體皆屬進步黨一派。第二、許多沒有黨派背景的報紙，都站在政府的一邊，與進步黨一派的報刊立場略同。茲分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將進步黨一派的報刊略作介紹：

上海的報刊，除屬於國民黨一系者外，約有四類，一類為統一黨的，一類為共和黨的，一類為民主黨的，一類為沒有黨派色彩、但傾向政府的：

- ①大共和日報：創於上海光復之初，馬敘倫籌辦，章炳麟為社長，杜傑鳳為經理，馬敘倫任總編輯，汪東任編輯¹⁶⁶。初為中華民國聯合會（章炳麟組）的機關報，中華民國聯合會改為統一黨後，該報即改為統一黨的機關報。
- ②時事新報：創刊於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五日，原名時事報，一九一一年五月十八日改名時事新報，張竹平為經理，潘公展為主筆。一九一二年五月為民國公會及國民協進會（二者皆共和黨前身）接辦，成為共和黨的機關報，主筆張雲博。後與梁啟超關係密切，反帝制運動起，在言論上與雲南護國軍呼應¹⁶⁷。
- ③共和建設討論會雜誌：創於一九一二年四月，與康有為、梁啟超關係密切。梁為共和建設討論會撰立國大方針商榷書，主張中央集權；康有為撰共和建設討論會雜誌發刊詞，反對共和¹⁶⁸。其立場引起民權報、天鐸報、民立報等

¹⁶⁵ 「謙報」第三期本黨消息頁三～七。

¹⁶⁶ 「辛亥革命回憶錄」(一)頁一七八。

¹⁶⁷ 胡道靜「上海的日報」，「上海市通志館期刊」二卷一期；「支那ニ於ケル政黨結社」頁一二五。

¹⁶⁸ 發刊詞見「康有為文集」。

之非議^⑩。

④神州日報：共和黨的機關報，主筆汪允中。

⑤民聲日報：一九一二年創刊，共和黨的機關報。

⑥民強報：為共和建設討論會與共和促進會（二者皆民主黨的前身）的機關報。

⑦時報：創刊於一九〇四年，清末為立憲派的機關報，民初標榜中立，實與共和黨接近。

⑧民報：與時報同標榜中立，但與共和黨接近。

⑨申報：無黨派背景，但擁護政府。

⑩新聞報：無黨派背景，但擁護政府，主筆金世和。

此外，上海尚有啟民愛國報、中國商務日報、晚鐘等^⑪，背景不詳。

北京進步黨一派的報刊，以屬於共和黨者為多，其他屬於統一黨者、屬於舊君憲派者、屬於袁世凱者、標榜中立者亦多，茲分述於下：

①中國日報：舊名帝國日報，楊度等創，共和黨的機關報。

②亞細亞日報：創於武昌革命爆發後，楊度等主之，後為共和黨的機關報。

③北京時報：一九一二年創，共和黨的機關報。

④國民公報：舊諮議局聯合會的機關報，徐公勉為主筆，民初轉為共和黨的機關報。

⑤北京日報：袁世凱的宣傳刊物，朱洪為主筆，同情共和黨。

⑥民視報：舊君憲派于邦華、陳樹楷主之，對共和黨同情。

⑦大同報：舊帝國新聞改名，對旗人同情。

⑧新紀元報：北京日日新聞改名，主筆章炳麟。

⑨「震旦」月刊：一九一三年二月創刊，統一黨的機關報。

⑩京津時報：為上海時報的分支，標榜中立，對共和黨同情。

此外，北京尚有中國公報、中國報（黎宗嶽為主筆）^⑫、以及五族協和會所辦的共和報（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五日創刊）^⑬等，立場不詳。

天津進步黨的機關報，以「庸言」半月刊為主，「庸言」創於一九一二年十二

^⑩ 葉夏聲「國父民初革命紀畧」頁六五～六六。

^⑪ 「支那ニ於ケル政黨結社」頁一二五；「支那ニ於ケル政黨團體紀要」頁六四～六六。

^⑫ 「支那ニ於ケル政黨結社」頁一二三～一二四。

^⑬ 民國元年二月二十九日、三月十四日「順天時報」五版廣告。

月一日，梁啟超辦，發行人為梁德猷，編輯人為吳貫因，進步黨假此宣傳政見，如一卷十二號（一九一三年五月十六日出版）載梁啟超提案「進步黨調查政費意見書」，對財政之意見主張嚴格的量入為出、不許用外債以充行政費；一卷十三號（六月一日出版）載梁啟超提案「進步黨政務部特設憲法問題討論會通告書」，主張絕對排斥聯邦主義，以保國家統一。天津其他進步黨一派的報紙，尚有民興報、大公報、北方日報等¹⁷³。

其他各地進步黨一派的報紙有：①長沙「湖南公報」：共和黨的機關報¹⁷⁴。②濟南「大東日報」：共和黨魯支部辦¹⁷⁵。③奉天「民政日報」：民社的機關報¹⁷⁶。④貴陽「黔風報」：共和黨的機關報¹⁷⁷。⑤漢口「羣報」：共和黨的機關報。⑥東京「讜報」月刊：一九一三年四月創，進步黨東京支部辦。

組織 進步黨的組織，淵源於統一、共和、民主三黨，但較三黨中的任何一黨為完備，並較國民黨為完備。各黨的本部組織，可大別為三部門：一為理事部門，二為幹事部門，三為諮議部門；地方組織大別為三級：一為交通部，二為支部，三為分部。就各部門綜合言之，組織以進步黨最完備。

就理事部門而論：進步黨有理事長、理事、名譽理事之設，統一、共和、國民三黨皆只有理事長、理事之設，沒有名譽理事之設，而民主黨行幹事制，沒有理事部門。

就幹事部門而論：進步黨分政務、黨務兩部，政務部分法制、財政、外交、軍政、教育、實業、地方自治、庶政八科，另有議員會和政務研究會；黨務部分文牘、會計、交際、地方、庶務五科。統一、共和、國民、民主四黨的幹事皆無政務、黨務之分，實際上只有黨務部門，統一黨分為總務、書記、會計、交際、庶務五科；共和黨幹事不分科，另置交際員、基金監、審計員、事務員，事務員分書記、庶務、會計三科；國民黨幹事分總務、交際、政事、文事、會計五部；民主黨幹事除幹事長外分掌政務、交際、文書、會計、庶務。四黨之中，統一黨的政務討論會、共和黨的政務研究會、國民黨的政務研究會，可謂為政務部門，但不分科。民主黨根本沒有類似的組織。

¹⁷³ 「支那ニ於ケル政黨結社」頁一二四。

¹⁷⁴ 民國元年十二月四日「大共和日報」，衡湘言論界之面面。

¹⁷⁵ 民國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中華民國報」，共和黨造謠可恨。

¹⁷⁶ 民國元年四月二十日「順天時報」二版。

¹⁷⁷ 「民國之精華」頁三五八。

就諮議部門而論：進步黨有參議，統一黨有參事和評議員，國民黨有參事，共和黨和民主黨沒有類似的職位。

就地方組織而論：交通衝要之地，進步黨設交通處（漢口稱交通事務所），共和黨設交通事務所，國民黨和民主黨皆設交通部。至於支分部，統一、共和、民主、國民，進步各黨皆有設置，惟民主黨未見設分部。

論及本部組織的規模，國民黨和進步黨都在千人左右，可謂相當龐大。仔細審視本部職員名單，兩黨又有互見之處，且互見者多官僚、名流，可見兩黨皆拉攏官僚、名流作門面^{①⑧}。

黨員 進步黨像國民黨一樣，是一個開放性的政黨，吸收黨員不厭其多，但大多仍在中上層運動，不走羣眾路線。黨員的數目，無法統計。本部的職員約千人，湖南支部有黨員千餘人，估計全國黨員應有數萬人。由於資料缺乏，將全部黨員作一分析並不可能。此處僅擬作兩項示例性的分析：一為國會議員的分析，一為本部、各支分部重要職員和著名黨員的分析。

國會議員的分析，對屬於國民黨籍者比較容易，因為國民黨籍國會議員有名單可查，進步黨籍國會議員名單不甚完全。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暫將國會中不屬於國民黨的議員，均列入進步黨統計，好在其他小黨派人數無多，不大影響分析的結果。就年齡而論，參議院進步黨員一二二人，平均三七·二九歲，比國民黨多〇·七四歲；眾議院進步黨議員二八九人，平均三七·九〇歲，比國民黨多四·七一歲。兩院平均，進步黨三七·六歲，比國民黨多二·七歲。就教育背景而論，兩院進步黨議員有傳統功名者四十八人，佔全體議員百分之九·六一，比國民黨多〇·五九；進步黨議員受新式教育者一六八人，佔全體議員百分之三三·六七，比國民黨少一四·〇二。進步黨人所以比較保守，部分可能與受新式教育者較少有關^{①⑨}。

本部及各支分部的重要職員和著名黨員，因限於資料及篇幅，此出僅選擇一百人作示例性的分析。茲首將此一百人的姓名、字號、籍貫、年齡、學歷、經歷及黨職列表於下：

^{①⑧} 藉資比較的資料，見張玉法「民初國會中的保守派政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八期；張玉法「民初國會中的激進派政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七期。

^{①⑨} 張朋園「從民初國會選舉看政治參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七期頁二五～二七。

姓名	字號	籍貫	年齡 (1912)	學 歷	經 歷	黨 職
丁世嶧	佛言	山東黃縣	32	廩貢，日本法政大學	諮議局議員	黨務部長
于元芳		山東萊陽	28	副貢	民政部主事	黨員
王文芹	采章	直隸清苑	30	拔貢	知州，同知	保定支部幹部
王印川	月波	河南修武	33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科	統一黨理事，衆議員	理事
王家襄	幼山	浙江山陰	42	貢生，日本警察專科	吉林警務學堂總辦，諮議局議員，共和黨員	文牘科主任
王紹鰲		江蘇吳江	26	日本法律學校	統一黨員，衆議員	黨員
王 湘	芷塘	四川重慶	37		四川軍醫局長，參議員	實業科副主任
王敬芳	搏沙	河南登縣	36	中學畢業，留日	諮議局議員，衆議員	黨員
王蔭棠		奉天海龍	40	廩生	諮議局議員，衆議員	黨員
王 廣	揖唐	安徽合肥	35	進士，日本士官學校	吉林督練公所參議，參議員	理事
尹昌衡	碩權	四川華陽	36	日本士官學校	同盟會員，四川陸軍小學堂總辦，四川都督	名譽理事
伍廷芳	秩庸	廣東新會	65	在香港習法律，留美	駐美公使，外務部侍郎，外交總長	理事
朱 瑞	桂卿	浙江海鹽	30	秀才，日本士官學校	浙軍管帶，浙江都督	名譽理事
牟 琳	貢三	貴州遵義	35	舉人，日本宏文學院師範科	諮議局議員，資政院議員，衆議員	政務研究會員
李 素		山西平定		舉人	資政院議員	實業科副主任
李國珍	碩遠	江西武寧	30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科	共和黨員，衆議員	黨員
李 槃		河南潢川	35	日本法政大學	資政院議員，參議員	黨員
李慶芳	楓圃	山西襄垣	33	日本法政大學	山西提學使司科員，衆議員	黨員
宋伯魯	芝田	陝 西			陝西第一師參謀長，陝西孔教會支部長	陝西支部幹部
克希克圖	仲養	蒙古，鎮江駐防	35	日本明治大學	清華學校教師，衆議員	外交科副主任

吳鼎昌	謙辰	直隸清苑		北洋法政學堂	保定女子師範學堂監督，省議員，衆議員	財政科主任
谷芝瑞	謙堂	直隸臨榆	39	進士，日本法政大學	諮議局副議長，參議員	黨員
邢彥圖		蒙 古	54		鑲黃旗滿洲都統，資政院議員	理事
汪大燮	伯棠	浙江杭縣	53	舉人	駐英公使，教育總長	名譽理事
汪有齡	子健	浙江杭縣	33	日本法政大學	京師大學堂教習	法制科副主任
汪彭年	瘦岑	安徽旌德	32	日本法政大學	神州日報主筆，共和黨員，衆議員	地方自治科主任
汪榮寶	克甫	江蘇吳縣		拔貢，日本法政大學	民政部左參議，外務部主事，衆議員	法制科主任
阿穆爾 靈上	安甫	蒙 古	28		蒙古親王，參議員	名譽理事
孟 森	繩生	江蘇武進	44	生員，日本法政大學	諮議局議員，衆議員	上海交通處幹部
金 還		浙 江				會計科主任
周自齊	子沂	山東萊陽	42	同文館，留美	資政院議員，山東都督，交通總長	名譽理事
林志鈞	宰平	福建閩縣	31	附生，日本法政大學	外務部科員，外交部科長	外交科主任
林長民	宗孟	福建閩侯	36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法科	諮議局副議長，臨時省議會會長，民主黨員，衆議員	政務部長
林 獬	白水	福建福州	37	日本早稻田大學	同盟會員，共和黨福建支部幹部	福建支部幹部
范源廉	靜生	湖南湘陰	41	時務學堂，東京大同學校	資政院議員，教育次長	黨員
胡汝麟	石青	河南通許				黨務部副部長
胡景伊	文瀾	四川巴縣	34	日本士官學校	廣西新軍協統，四川都督	名譽理事
胡鄂公		湖北江陵	34	北洋高等農業學堂	同盟會員，衆議員	黨員
胡源滙	海門	直隸永年	35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科	北洋法政學校校長，臨時省議會議長，共和黨員，衆議員	庶政科副主任
胡瑞霖		湖 北			湖北軍政府實業司長	會計科副主任
時功玖		湖北枝江	32	兩湖書院，日本同文書院	同盟會員，衆議員	黨員

唐文治		江蘇上海	47	進士	商部右侍郎，統一黨員，共和黨員	黨員
唐繼堯	黃慶	雲南東川	28	秀才，日本士官學校	雲南講武堂監督，貴州都督	名譽理事
凌文淵	直支	江蘇泰州	35	師範學校	諮議局議員，臨時參議員，眾議員	文牘科副主任
袁家普	雲安	湖南醴陵	37	日本早稻田大學	奉天法政學校教員	黨員
高登鯉		福建順昌	45	舉人	諮議局議員	福建支部幹部
耿臻顯	揚延	山西渾源	26	日本高等農業學校	農校教師，眾議員	教育科主任
徐勤	君勉	廣東三水	39	康有為弟子	大同學校校長	廣東支部長，名譽理事
梁啓超	任公	廣東新會		舉人，旅居日本	政治運動家，共和黨員	理事
梁善濟		山西崞縣	49	進士，日本法政大學	翰林院檢討，諮議局議長	地方科主任
陸宗輿		浙江海寧		舉人，留日	憲政編查館行走，資政院議員	參議員
陸榮廷	堯卿	廣西武恩	54		廣西提督，廣西都督	名譽理事
郭桂芬		河南孟津	30		眾議員	黨員
崔廷獻		山西壽陽			諮議局議員	山西支部幹部
孫洪伊	伯蘭	直隸天津	43	舉人	諮議局議員，民主黨員，眾議員	黨務部副部長
孫武	堯卿	湖北夏口	35	湖北武備學堂，留日	湖北都督府軍務部長，民社武漢支部長	理事
孫熙澤	煥廷	安徽舒城				地方科副主任
馮國璋	華甫	直隸河間	54	北洋武備學堂	陸軍部副大臣，直隸都督	名譽理事
曹汝霖	潤田	江蘇上海	36	東京法學院	外務部右侍郎，資政院議員，參議員	參議員
陳廷策	幼蘇	貴州平壩	39	舉人，日本法政大學	河南法政大學教務長，臨時參議員，眾議員	教育科副主任
陳昭常	簡樞	廣東新會	44	進士	翰林院編修，吉林巡撫，吉林都督	名譽理事
陳國祥	敬民	貴州修文	33	進士，日本法政大學	河南法政大學監督，眾議員	名譽理事

陳敬第		浙江杭縣	38	進士，日本法政大學	諮議局議員，資政院議員，衆議員	黨員
陳獻辰		浙江瑞安	54	進士	度支部主事，諮議局議長，衆議員	黨員
張伯烈		湖北隨縣	40	生員，日本大學法科	自治研究所長，衆議員	黨員
張紹曾	敬輿	直隸大城		日本士官學校	二十鎮統制	名譽理事，直隸支部長
張國溶		湖北蒲圻	46	進士，日本法政大學	翰林院編修，諮議局副議長，衆議員	黨員
張善輿	天放	河南新鄉	37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科	臨時參議員，衆議員	實業科主任
張鳳翽	翔初	陝西咸寧	40	秀才，日本士官學校	同盟會員，新軍參謀官，陝西都督	名譽理事
張嘉璈	公權	江蘇寶山	23	日本慶應義塾	郵傳部路政司員，浙督朱瑞的秘書長	庶政科主任
張 睿	季直	江蘇南通	60	進士，日本考察	翰林院修撰，諮議局議長	理事
張鎮芳	馨庵	河南項城	52	進士	湖南提法使，長蘆鹽運使，河南都督	名譽理事
黃遠庸		江西九江	30	進士，留日習法律	新聞記者	交際科主任
黃德潤	玉田	雲南東川	51	進士	候補道，厘金局會辦	雲南支部幹部
黃 羣		浙江永嘉	30	日本早稻田大學	臨時參議員，衆議員	黨員
湯化龍		湖北蘄水	38	進士，日本早稻田大學	法部主事，湖北諮議局議長，衆議院議長	理事
虞廷愷	拍廬	浙江瑞安	32	日本法政大學	浙江代理財政司長，衆議員	庶務科副主任
董昆瀛	堯封	湖北新陽	36	日本法政大學	省議員，參議員	地方自治科副主任
楊增新	鼎臣	雲南蒙自	46	進士	新疆提法使，新疆都督	名譽理事
解榮輅	子仁	山西萬泉	39	進士，留日	山西大學堂監督，諮議局議員，教育司長	黨員
解樹強	斐賁	江蘇阜寧	33	日本早稻田大學	參議員	財政科副主任
廖名縉	笏堂	湖南瀘溪	44	拔貢，日本師範學校	巡防營統帶，共和黨員	湖南支部幹部
廖宇春	少游		43	留日	保定陸軍小學堂監督	政務研究會員
熊希齡	秉三	湖南鳳凰	46	進士	時務學堂總辦，政聞社員，財政總長，統一黨員	黨員

蒲殿俊		四川廣安	37	進士，日本法政大學	法部主事，諮議局議長	理事
齊耀琳	震巖	吉林伊通	49	進士	河南巡撫，吉林民政長	名譽理事
閻錫山	伯川	山西五台	29	日本士官學校	新軍協統，山西都督	名譽理事
鄭萬瞻	雲築	湖北秭歸	33	舉人，京師大學堂	諮議局議員，衆議員	地方科副主任
黎元洪	宋卿	湖北黃陂	46	北洋水師學堂	新軍協統，湖北都督	理事長
蔡 鐸	松坡	湖南邵陽	32	時務學堂，日本士官學校	新軍協統，雲南都督	名譽理事
蔣耀奎	洽亭	直隸慶雲	47		臨時省議員	天津副支部長
劉成禺		湖北武昌	38	留日	商業學堂教務長，參議員	黨員
劉崇佑		福建閩侯	35	舉人，日本早稻田大學	諮議局副議長，衆議員	黨員
蹇念益		貴州遵義	36	舉人，日本早稻田大學	財政部主事，共和黨員，衆議員	黨員
戴聲教		安徽合肥	45		衆議員	黨員
藍公武	志先	江蘇吳江	26	東京帝國大學	國民公報主筆，參議員	參議員
羅 綸	梓卿	四川西充	38	舉人	諮議局副議長，保路同志會長	軍政科主任
蕭晉榮	曜海	四川富川			衆議員	政務研究會員
蕭 湘		四川涪州	41	進士，日本法政大學	法部主事，諮議局副議長	教育科副主任
籍忠寅		直隸任邱	35	舉人，日本早稻田大學	資政院議員	參議員

上表一百人，就籍貫分：湖北十一人，浙江、江蘇各十人，直隸九人，河南、四川、山西各七人，福建、湖南各五人，廣東、貴州、安徽各四人，山東、雲南、蒙古各三人，江西、陝西各二人，廣西、奉天、吉林、不詳各一人。關內十八省，只甘肅沒有黨員列入。重要黨員最多者為湖北、浙江、江蘇三省。就年齡而論，可知者八十七人，平均三八·四一歲。比國民黨多三·〇四歲。就教育背景而論：除十五人不詳外，純受傳統教育者十九人，佔百分之二二·三五，國民黨為一六·八五；受新式教育者六十六人（包括先受傳統教育者二十八人），佔百分之七七·六五，國民黨為八三·一五；留學者六十一人，佔百分之七〇·七六，國民黨為六七

· 四二。就出身而論，議員四十六，官僚二十，教育十三，軍人十二，新聞界三，政客一，不詳五。就黨職論：理事及名譽理事二十九，本部部長及副部長四，主任及副主任二十六，參議員四，政務研究會員三，支部長一，黨員三十三。

黨費 進步黨的黨費，主要靠袁世凱資助。部分資料顯示，袁世凱對重要的反對同盟會和反對國民黨的政黨，都予以資助。有時並派專人加入，作金錢上的運用。譬如章炳麟所組織的中華民國聯合會和統一黨，袁世凱就派張弧參加，並透過張弧資助中華民國聯合會和統一黨。據統一黨黨員王紹鏊的回憶：

張弧是袁世凱派進來的奸細。張是熊希齡的人，也是袁世凱的親信，袁就是利用熊的關係，介紹張混入（中華民國）聯合會的。聯合會和統一黨的經濟權一直操縱在張弧手裏，其經費表面上說是從各方面募捐得來，原先我對此深信不疑，以後隨章（炳麟）先生到北京，從各方面的接觸中，了解到一些政治內幕，才知道我們所花的，可以說完全是袁世凱的錢^⑩。

統一黨所以成爲袁世凱的死黨，不是沒有原因的。

袁世凱不僅資助章炳麟辦黨，也資助梁啟超辦黨。一九一二年冬梁啟超自日本歸國，袁備極招待。自梁回國之日，袁卽月給三千，供其應用。梁謂要辦報，袁卽給予二十萬辦報之資^⑪；梁要聯合民主、共和二黨，袁亦許助二十萬元作經費。另一方面，袁並撥款一百六十萬元給統一黨，要該黨參事王賡等人積極聯繫與民主、共和二黨合併的事；而共和黨員李國珍、郭同等，亦得袁世凱鉅金，挾議員之力，力謀三黨合併^⑫。這可以看出來，統一、共和、民主三黨無不受袁世凱的資助，而進步黨的成立，部分卽是袁以金錢運動的結果。

四、地方勢力

檢討兩黨的地方勢力，對國民黨比較容易，對進步黨比較困難。國民黨是由同盟會演變而來，同盟會於武昌革命爆發前後卽在全國各地展開積極的組織發展。有些同盟會員和日後的國民黨員做了省的都督，力足控制一個省；許多省份雖不與同盟會員或國民黨員爲都督，但由於黨在民間的勢力發展，使國民黨在一九一三年初

^⑩ 「辛亥革命回憶錄」(一)頁四〇〇。

^⑪ 張朋園「維護共和——梁啟超之聯袁與討袁」，張玉法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四輯頁二七四。

^⑫ 張玉法「民初國會中的保守派政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八期頁四三~四四。

的國會選舉中得了超過半數的議席。因為參議員是由各省省議會選出來的，如果一省所選的參議員，國民黨籍者佔半數以上，該省省議會議員，當以國民黨員佔多數；如果一省所選的參議員，國民黨籍者不及半數，則該省省議會當不在國民黨的控制之下。進步黨雖淵源於清季的立憲派，但進步黨與立憲派的關係，遠較國民黨與同盟會的關係為疏。武昌革命爆發以後，立憲派人雖亦在各省爭奪政權，但很少有人獲得都督的地位，有人暫時稱都督，如四川蒲殿俊，旋即取消。有人居都督之位較久，如湖南譚延闓，但譚很快加入了國民黨。雲南都督蔡鍔為梁啟超的學生，雖然與進步黨接近，但與國民黨的關係也不錯。所以就各省都督而論，可以說最初沒有一人算是屬於進步黨的。即就進步黨的前身統一、共和、民主三黨而論，統一、民主黨人沒有人做到都督，鄂督黎元洪初受共和黨的推戴，後受進步黨的推戴，黎本人原非黨派中人。不過，由於黎在政治立場上與袁政府結在一起，進步黨人最初也與袁政府結在一起，暫時可以把親袁的都督視為進步黨一派都督。至於從議會選舉看進步黨的地方勢力，頗不容易，主要因為進步黨的成立在國會選舉以後，進步黨的前身統一、共和、民主三黨雖然在國會選舉期間已經存在，照理在三黨合併為進步黨以後，三黨的議員總和即為進步黨的議員總和，但在統一黨合併為共和黨後，部分統一黨員又獨立；三黨合併為進步黨後，部分共和黨員又獨立。國會中屬於進步黨的議員，因此有很大的流動性。雖然如此，由於國民黨和進步黨是對立的兩大政黨，各省的國會議員，除隸屬國民黨籍者外，大部當屬於進步黨。

剖視國民、進步兩黨的地方勢力，當從武昌革命爆發後革命、立憲兩派對各省政權的爭奪着手，而清帝退位前後袁世凱對各省權力的爭奪尤不可忽視。在這一連串的爭奪中，有些省落入同盟會及日後的國民黨之手，有些省落入立憲派之手，有些省則落入袁世凱之手。由於在南北統一後立憲派轉與袁世凱合作，故實際上地方勢力就分為反袁、擁袁兩派，反袁者屬國民黨系，擁袁者屬進步黨系。其次能表現地方勢力的為一九一三年初的參眾兩院選舉，當時進步黨尚未組成，只要了解國民黨在各省所獲議席的比例，就可大體看出國民黨在該省民間的力量，也可窺知後來的進步黨在民間的力量。

探討兩黨在各省的勢力，自宜分省論列，但為論述方便起見，將當時中國的省份分為華南、華中、華北、東三省和新疆四個單元。

(1) 華南

華南四省，國民黨可以控制的為廣東，進步黨可以控制的為雲南、貴州，至於廣西，兩黨皆有勢力，但大權掌握在出身防營、態度親袁的都督陸榮廷之手。

廣東 廣東為革命的策源地，武昌革命爆發前，廣東的革命起事達十餘次。武昌事起後，同盟會人胡漢民、陳炯明等在香港策動民軍進攻香山、博羅、惠州等地，署兩廣總督張鳴岐一度宣佈獨立，旋遁走。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日胡漢民至省垣，被推為都督，惠州民軍總司令陳炯明被推為副都督^⑧。胡漢民以蔣尊簋為軍政部長，李郁堂為財政部長，黎國廉為民政部長，王寵惠為司法部長，伍廷芳為外交部長，梁如浩為交通部長，王寵祐為實業部長，丘倉海為教育部長，另設樞密處，容納朱大符、廖仲愷、陳少白等人^⑨。十二月二十二日，胡隨孫中山赴滬，以陳炯明代理都督。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胡任秘書，此期間，粵人曾先後選汪兆銘、朱大符、馮自由為都督，皆不就。及孫中山辭職，胡漢民回粵，仍以胡漢民為都督，繼為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並於七月正式加以任命^⑩。胡被正式任命為都督後，陳炯明被任命為廣東護軍使。一九一三年六月胡以抨擊政府被免職，陳炯明繼為都督。二次革命發生，陳炯明應之，旋以部隊譁變，離粵赴港^⑪。龍濟光繼為都督。

廣東都督胡漢民、陳炯明皆為國民黨人，省議會亦由國民黨控制。臨時省議會選舉，辦法由胡漢民、陳炯明、朱大符等草擬，特定同盟會代表十二人，婦女代表十人，各界當選者，亦十九俱同盟會籍^⑫。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後，在廣東的黨勢繼續發展，正式國會選舉，國民黨於十個參議員名額中獲得十席，可見其能完全控制省議會；於三十個眾議員名額中獲得廿八席^⑬，亦可見其地方勢力之盛。

廣西 廣西在武昌革命爆發前數年，為同盟會與立憲派人相爭之地。立憲派人蔡鍔，任兵備處總辦和幹部學堂監督，掌握督練新軍大權。一九一〇年蔡因於幹部學堂學生舉行甄別試時，錄取湖南人（蔡為湖南人）太多，引起廣西學生不平，散佈於幹部學堂、陸軍小學、學兵營、師範學堂、政法學堂的同盟會人乘機掀動學潮，蔡不得已，離桂赴滇^⑭。武昌革命爆發後湖南獨立，湖南遣人赴廣西運動，廣

⑧ 尚秉和「辛壬春秋」廣東第十八頁一～三。

⑨ 「各省光復」（中）頁四四九；「辛亥革命回憶錄」（一）頁四三〇。

⑩ 「辛壬春秋」廣東十八頁四～六。

⑪ 「陳競存先生年譜」頁十九。

⑫ 「革命文獻」第二輯總頁四三一。

⑬ 張朋園「從民初國會選舉看政治參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七期，以下各省凡論及參眾議員名額皆據此文，不另註明。

⑭ 「辛亥革命回憶錄」（一）頁四六七～四六八。

西遂於十一月五日宣佈獨立，諮議局推巡撫沈秉堃（湘人）爲都督、藩司王芝祥（直隸人）爲副都督。沈宣佈暫攝督篆，旋改巡撫衙門爲軍政府，改諮議局爲議院，添設臨時議員，由官、紳、學三界中選充，所有一切法制，概由議院議決施行^⑩。同盟會人以沈不欲久留，不欲擁北人王芝祥爲都督，乃嗾使桂林防營兵變，並拉攏新軍。嗣新軍標統陳炳焜等電舉南寧提督陸榮廷（桂人）爲都督，沈秉堃乃辭職，王芝祥則率軍北伐。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陸榮廷至桂林就都督任，以陳樹勛爲民政司長，嚴端爲財政司長，張仁普爲司法司長，蒙經爲銓敘司長，盧汝翼爲法制局長。陳、蒙、盧等皆同盟會人，可控制軍政府，但一切政權仍歸於由諮議局所改的議院。及臨時省議會召集，同盟會人於南寧自由集會，非同盟會人則在桂林集會。袁世凱一度宣佈在南寧集會者爲非法，但在廣西軍政府內同盟會人的運動下，以及在同盟會人佔多數的北京臨時參議院的支援下，廣西省會改遷南寧，南寧臨時省議會變成合法的組織。同盟會人雖拉攏陸榮廷，排擠王芝祥，但陸出身舊軍，於革命素無淵源，不爲民黨所用。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起，民黨屢運動陸獨立，陸皆不爲所動，且助龍濟光定廣東^⑪。

同盟會及日後的國民黨無法左右廣西都督。在臨時省議會時代，同盟會亦無法左右議會。在南寧的省議會中，同盟會和統一黨議員各約佔半數，留在桂林的議員則屬共和黨。後部分留在桂林的議員赴南寧，也只有少數加入了同盟會^⑫。雖然如此，到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後，勢力大增，參議員選舉十席獲九席，眾議員選舉，十九席獲十三席。

雲南 雲南鄰近安南，爲同盟會人邊區革命覬覦之地，一九〇八年有河口之役，但同盟會並未在雲南建立穩固的勢力。雲南響應武昌革命者主要爲新軍，當時雲南新軍一鎮，鍾麟同爲統制，蔡鏞、曲同豐爲協統。湖南獨立，譚延闓電蔡鏞（湖南人）響應，十月三十一日，蔡鏞及講武堂總辦李根源（同盟會員）等起兵，鍾麟同兵敗自殺，曲同豐亦亡去。蔡初推雲南總督李經羲爲大統領，至十一月十二日經羲遁，蔡自爲都督，組雲南軍政府^⑬。以李根源爲參議院長（置參議二十三人），羅佩金（統帶）爲軍政部長，殷承燾爲參謀部長，沈汪度爲軍務部長，周鍾嶽爲秘

⑩ 「各省光復」（中）頁二三二。

⑪ 「辛壬春秋」廣西第十七頁一～四。

⑫ 民國元年九月二日「民立報」。

⑬ 「辛壬春秋」雲南第七頁一～三。

書處長（秘書有呂志伊等四人）。另置臨時省議會，以張惟聰為議長，殷宇清、張世勳為副議長¹⁹⁴。又以楊福祥為民政司長，陳介為財政司長，周沅為外交司長，吳珉為實業司長¹⁹⁵。

蔡鐸為梁啟超的學生，屬立憲派，任雲南都督後，原親袁世凱，袁被選為臨時大總統後，有都南都北之爭，蔡屢次電袁，支持都北的主張¹⁹⁶。惟蔡在雲南為一大勢力，曾派兵入川，協助川省獨立，又曾以銀械助黔，使黔督楊善誠北伐。且蔡曾入統一共和黨，與同盟會接近，袁忌之，一九一三年十月調至北京，以唐繼堯為滇督¹⁹⁷。唐於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時曾入同盟會，回國後官至雲南第十九鎮參謀官。辛亥雲南獨立，唐任北伐軍總司令，道出貴陽，被舉為黔督。至一九一三年十月調滇督¹⁹⁸。惟唐入民國後，並不支持同盟會。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後，積極在雲南發展勢力，參議員選舉，十席中獲六席；眾議員選舉，二十席中獲十三席。

貴州 貴州在武昌革命爆發前為革命、立憲兩派鬭爭之地。同盟會員有楊善誠、于德坤、凌霄、張銘、彭述文、張先培等約四十人，與之接近者有張百麟所組織的自治學社。自治學社為哥老會的組織，有黨員數萬¹⁹⁹，分社遍全省，又有西南日報為之喉舌，並有公立法政學堂、法官養成所等為培養人才之地²⁰⁰。另一個哥老會的組織，黃澤霖的光復公會，到武昌革命爆發後，與自治學社接近，與之合組全黔保全會²⁰¹。立憲派除楊昌銘等所組的憲友會支部、陳元棟等所組的憲政實進會支部、雷述等所組的政學崇實會以外，以任可澄所組的憲政預備會勢力最大²⁰²。任另組有憲羣社，為運動哥老會的組織²⁰³。與立憲派接近者有耆老會，該會為退職的官僚和地方士紳組成，負責人郭重光，原任安徽蕪湖道²⁰⁴。革命、立憲兩派勢力，以自治學社和憲政預備會為主，大體言之，憲政預備會控制了行政機構、教育會、

¹⁹⁴ 蔡鐸「滇省光復始末記」，「革命文獻」第五輯；李根源「永昌府文徵」，「各省光復」（上）頁三二八。二者記載有出入處者，從蔡說。

¹⁹⁵ 「辛壬春秋」雲南第七頁三。

¹⁹⁶ 民國元年三月十七日「順天時報」，滇督致袁總統電。

¹⁹⁷ 「辛壬春秋」雲南第七頁七。

¹⁹⁸ 東南編譯社編「唐繼堯」（民國十四年出版）頁一一～二四。

¹⁹⁹ 「各省光復」（中）頁一七八。

²⁰⁰ 同上，頁一八〇。

²⁰¹ 「辛壬春秋」貴州第十一頁一。

²⁰² 「各省光復」（中）頁一八四。

²⁰³ 「辛壬春秋」貴州第十一頁一。

²⁰⁴ 「辛亥革命回憶錄」（二）頁四九三～四九六。

商會和農會，但諮議局議員的選舉，自治學社卻能在三十九席中得三十三席。故其後資政院議員選舉，由自治學社籍議員劉榮勛當選；北京各省代表組織國會請願同志會，由自治學社選蔡嶽、彭述文、李澤民三人代表貴州教育總會參加；北京各省諮議局聯合會成立，由自治學社籍諮議員楊壽鏡代表參加²⁹⁵。自治學社原為運動君主立憲的團體，因受憲政預備會人劉顯世、任可澄、唐爾鏞，以及熊範輿、陳國祥等人的排擠，才與同盟會人接近²⁹⁶。

武昌革命爆發，自治學社謀響應，憲政預備會人任可澄等虛與委蛇，旋告密於巡撫沈瑜慶。時憲政會人郭重光參預沈瑜慶機要，建議調屬於憲政會的防營管帶劉顯世晉省保衛，擬俟劉顯世部一到，即捕戮同盟會員及自治學社社員。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張百麟、黃澤霖等率哥老會人，聯合新軍教練官同盟會員楊蓋誠、隊官趙德全等宣佈獨立，舉楊蓋誠為都督，趙德全為副都督，成立軍政府。軍政府網羅了革命派和立憲派的人士，行政總長周培藝（報界），民政部長陳永錫，財政部長蔡嶽（自治學社），學務部長譚環，實業部長黃德銑，交通部長孫鏡，參謀處長文崇高，軍政部長廖謙，執法部長藍鑫，秘書廳長陳廷棻。另置樞密院，院長張百麟（自治學社），副院長任可澄（憲政預備會），樞密員楊昌銘（憲友會）、陳元棟（憲政實進會）、雷述（政學崇實會）、周培藝、平剛（同盟會）²⁹⁷。黃澤霖擁哥老會黨萬餘人，自稱巡防大總統。時張百麟與黃澤霖相結，張百麟控制樞密院，黃澤霖擁兵多。楊蓋誠懼，揚言援鄂，率兵入湘，趙德全攝行都督事²⁹⁸。時獨立各省選代表商組臨時政府，自治學社人平剛、文崇高膺選。憲政預備會人嫉自治學社日深²⁹⁹，一面派戴戡等向滇督蔡鍔求援，一面向梁啟超獻「定滇黔以併西南以一天下」之策，意在請梁啟超命蔡鍔出兵貴州。蔡鍔初以出師無名，命參謀次長唐繼堯陳兵黔邊。旋憲政會人策動防營兵變，殺黃澤霖，張百麟逃。至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唐繼堯率兵入黔，三月一、二日與黔陸軍第四標統帶劉顯世等抵省城，耆老會人遂推唐繼堯為黔督³⁰⁰。

²⁹⁵ 同上，頁四五六～四六五。

²⁹⁶ 「各省光復」（中）頁一七八。

²⁹⁷ 「辛壬春秋」貴州第十一頁一；「革命先烈先進傳」頁八九三～八九七；「各省光復」（中）頁一八四。

²⁹⁸ 「辛壬春秋」貴州第十一頁二。

²⁹⁹ 「辛亥革命回憶錄」（三）頁四五六～四六五。

³⁰⁰ 「辛壬春秋」貴州第十一頁三；「革命先烈先進傳」頁八九三～八九七。

唐繼堯任黔督後，政權為憲政會及耆老會所控制，這可由滇軍入黔後的軍政府組織看出^⑳。

都督：唐繼堯	軍務部長：劉顯世 (憲政會)	內務司長：郭重光 (耆老會)		
秘書長：唐慰慈			政務部長：周沆 (憲政會)	財政司長：華之鴻
參贊：任可澄 (憲政會)			衛戍部長：韓五峯	民政司長：朱益清
			戴戡 (憲政會)	軍警部長：梅若愚
		實業司長：黃祿貞		

嗣後楊蓋誠謀於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擬返黔任都督不成，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後，命唐繼堯署黔督^㉑。唐旋加入統一共和黨。一九一三年十月，政府調唐堯為滇督，不久又改都督為將軍，貴州因省份較小，不設將軍，置護軍使主軍政，劉顯世任之^㉒；置民政長主民政，戴戡任之。貴州在民初可以說完全為進步黨的勢力範圍，參議員選舉，十人皆為進步黨所得；眾議員選舉，十三人中國民黨僅獲其一。

(2) 華中

華中八省，為國民黨勢力最盛之區，江西、安徽、福建、湖南四省都督皆為國民黨人，其他各省，國民黨在民間的勢力亦盛。

江蘇 江蘇地處長江出口，居沿海各省的中央，經濟發達，人才薈萃，民性較溫和，傾心革命者較少。但上海為新思想侵入之地，又有廣大租界，為革命黨人所走集。光復會成立於上海，華與會在上海有分機關。同盟會成立後，又先後在上海設立上海分會、江蘇分會、同盟會中部總部。策動武昌革命的文學社和共進會，與同盟會中部總部有密切聯繫。

武昌革命爆發後，江蘇方面的響應以上海為最早。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五日上海民軍五十餘人到蘇州，與新軍會合，擁江蘇巡撫程德全為都督。是後，常州、松江、清江、鎮江、揚州等地皆響應革命，並各有都督，合上海、蘇州，共七處。民軍攻南京，新軍統制徐紹楨響應，遂組織江浙聯軍，以徐紹楨為聯軍總司令，參加

^⑳ 「辛亥革命回憶錄」(三)頁四六六~四七六，四九三~四九六；「雲南貴州辛亥革命資料」頁三一三。

^㉑ 「辛壬春秋」貴州第十一頁四~五。

^㉒ 「雲南貴州辛亥革命資料」頁三一三。

者有揚州都督徐寶山、鎮江都督林述慶、蘇軍統制劉之黎、浙軍司令朱瑞、濟軍統領黎天才，另有滬軍，共約萬餘人。至十二月一日，清兵退出南京²⁴，全蘇皆入革命軍勢力。

江蘇在革命之初勢力派別甚多，江蘇都督府的組織，包括各派人物，其情形可如下表：

都督程德全	參謀總長程德全 (舊官僚)	參謀次長顧忠琛 (光復會)
		鈕永建 (同盟會)
		陶駿葆 (光復會)
		政務廳長宋教仁 (同盟會中部總部)
	外務司長馬良 (立憲派)	次長楊廷棟 (立憲派)
		內務司長張一畧
		次長沈恩孚
		財政司長熊希齡 (立憲派)
		次長姚文枬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成立的臨時省議會，仍以諮議局議員為成員，張謇為議長，蔣炳章為副議長²⁵。可以看出江蘇省政一開始就為舊官僚派所把持，同盟會居於從屬的地位。

另方一面，南京光復後在南京所組織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則為同盟會所控制。及南京臨時政府以程德全為內務總長，蘇督由莊蘊寬繼任，莊為前廣西右江道，亦舊官僚出身。一九一二年四月南京臨時政府結束，莊辭職，仍以程德全為都督。時上海軍政府、江北軍政府，以及揚州、常州兩軍政分府皆未撤，而黃興又於南京設留守府。論階級，留守最高，然號令僅行於軍隊，且不及省外。論名分，江蘇都督最正，但權限不能及於上海、江北軍政府及揚州、常州兩分府。臨時政府北遷後，江蘇為謀統一，徐寶山首請取消揚州分府。五月，陳其美、蔣雁行赴北京，上海、江北軍政府以及分府皆廢。六月，南京留守府亦取銷，至是江蘇才統一²⁶。

²⁴ 「辛壬春秋」江蘇第十三頁一～六。

²⁵ 「各省光復」(上)頁三四七、四五二。

²⁶ 「辛壬春秋」江蘇第十三頁七～八。

蘇督程德全是一位以權位爲重的官僚人物，加入共和黨。同盟會及以後的國民黨雖極力拉攏，但始終不與推誠合作。江蘇紳商富資財，重社會地位，政治態度保守，在張謇等人的領導下，大體接近進步黨。惟同盟會和國民黨以江蘇爲重要核心區，努力在江蘇獲取優勢地位，國會選舉，眾議員四十席雖只得十四席，參議員的十席則獲得六席。

江西 江西有洪江會（屬哥老會），清末不乏反清活動，一九〇六年的萍醴瀏之役，哥老會人即參加。但同盟會能於武昌事起後控制江西，是由李烈鈞聯絡新軍起兵而成。李烈鈞，江西武寧人，江西武備學堂畢業，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入同盟會，並入同盟會軍人會員所組的「鐵血丈夫團」。畢業後回江西任第五十四標管帶，駐南昌。嗣赴雲南，先後任雲南講武堂教官和陸軍小學堂總辦。武昌革命爆發後，趕赴九江。九江新軍五十三標已於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宣佈獨立，推標統馬毓寶爲都督，蔣羣任參謀長，烈鈞至，蔣羣以參謀長讓之。烈鈞嗣受馬毓寶之派，率兵援皖，被推爲皖督。繼因武漢乞援，又率部援鄂，被任爲五省聯軍總司令²⁷。

南昌方面，新軍於十月三十一日起兵，原擬推巡撫馮汝驥爲都督，汝驥不受，改推新軍協統吳介璋爲都督。介璋江蘇人，爲李烈鈞的老師，以出身翰林院的劉起鳳（江西人）爲民政長，與九江方面的馬毓寶互爲聲援，頗爲相得。十一月十二日江西測量司長彭程萬（貴谿人）假孫中山、黃興之命爲都督，洪江會人不服，彭於二十一日辭職，南昌軍政府請九江馬毓寶繼任。馬不孚人望，江西臨時省議會選李烈鈞爲都督，請孫中山任命。一九一二年三月，李至南昌就職²⁸。

李任江西都督後，江西即完全爲同盟會所控制，各司廳處組織及人選多取決於黨部會議。都督府的組織及重要黨政人員，可如下表²⁹：

內政司長鍾震川	總務廳長王良箴
財政司長魏斯靈	警察總監吳昭軒

²⁷ 「李烈鈞將軍自傳」，民國三十三年，三戶書店；「辛亥革命」頁三八五～三八八。「辛壬春秋」江西第十頁一謂馬爲第五十五標標統。

²⁸ 「辛壬春秋」江西第十頁二～六；「各省光復」（上）頁一八五；「辛亥革命回憶錄」四頁三〇五～三〇八；「辛亥革命」內頁三八七～三九〇；「辛亥革命資料」頁五六八、五七三、六〇七；「中國革命記」第十二册大事記頁七。「辛壬春秋」謂一九一二年三月李烈鈞遣陳建訓等據九江，逼馬辭職，選李爲都督。

²⁹ 「辛亥革命」（六）頁三九〇～三九二；「各省光復」（上）頁一八六～一八七。

司法司長王侃	高等審判廳長漆璜
教育司長宋育德	高等檢察廳長潘學海
軍政司長俞應麓	兩淮鹽運使黃緝熙
交通司長胡澤	高等顧問陳戎生、陳德生
審計處長高巨瑗	同盟會支部長賀國昌
參謀處長何文斌	臨時省議會議長劉景烈

上列人員雖非盡屬同盟會，然就江西省政而論，同盟會及其以後的國民黨可以控制全局。

江西臨時省議會，議組於彭程萬任都督時期，諮議局原欲召集原有議員成立，但到者不多，未能開會。到馬毓寶任都督時，贛省紳民請由各屬旅省紳商學界，各就本縣選三人，再由各府複選，每縣額選一人，加上舊有諮議局議員，合為臨時省議會。一九一二年一月六日，初選人在諮議局舉行複選，舉出八十人，合諮議局在省議員，共一百二十八人^⑳。同盟會大體能控制臨時省議會，議長劉景烈雖非同盟會員，然甚與同盟會合作，李烈鈞之任贛督，即為臨時省議會所選^㉑。由於李烈鈞的努力，國民黨的勢力在江西有很好的發展，參議員選舉，十席全為國民黨所得；眾議員的選舉，亦在三十三席中得二十三席。

安徽 安徽為光復會人活躍之地，一九〇七年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一九〇八年熊成基在安徽起兵，徐、熊皆光復會人。安徽留日學生加入同盟會者亦多，如王天培、孫毓筠等。他們亦常返國運動革命。惟武昌革命爆發後，在安徽運動獨立的，主為新軍及諮議局人士。

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安慶新軍起兵，同盟會人王天培等亦從中運動，至十一月八日，各界代表集諮議局，推巡撫朱家寶為都督，王天培為副都督，天培一度迫奪督印，因引起眾怒，天培走避。適九江都督馬毓寶派司令官黃煥章率兵八百至安慶，開軍事會議，欲合皖軍攻南京，舉朱家寶為總司令，黎宗嶽、胡惟棟為中央司令，宋邦翰、劉國棟為參謀部長，胡萬泰、龔克定為司令部長，唐潤甫、管鵬為軍務部長，張國越為作戰部長，朱殿科為情報部長，羅心源為軍制部長，歐陽豪為憲兵部長，吳介璘為執法部長，金鼎彝為軍械部長，黃健祿為文牘部長，沈多文、

⑳ 「各省光復」(上)頁二二七。

㉑ 同上，頁一八五～一八六。

婁養源爲軍需部長，台樹仁爲運送部長，夏爾嶼、顧英（黃煥章的兵站長）爲庶務部長，黃煥章爲招募部長，童挹芳爲民政股長，竇以珏（諮議局議長）爲財政股長，洪思亮爲司法股長，王天培爲軍事顧問官（旋改左翼司令部長），趙繼椿爲皖南道，劉廷鳳爲皖北道。嗣贛軍因索餉不遂，圍攻都督府，朱家寶遁去。馬毓寶遣海陸軍總司令李烈鈞到皖，被推爲都督。自贛軍來，大權盡入贛軍之手，皖軍胡萬泰不平，率軍逼之。烈鈞見皖眾不服，命黃煥章拔隊返九江，已則率三軍艦援鄂。十一月二十八日皖紳設維持皖省統一機關處，攝行都督事，已而舉孫毓筠爲都督²²。

孫毓筠，安徽壽州人，秀才出身。一九〇六年四月東渡日本，加入同盟會。是年萍醴瀏之役發生，東京同盟會本部派毓筠回國策應，在南京被捕，入獄五年²³。武昌革命爆發後，毓筠出獄赴滬，至是被推爲安徽都督。皖人有黎宗嶽者於贛軍離皖後聯合青紅幫佔據大通，毓筠率淮上軍王占一所部赴省過大通時，爲黎宗嶽所阻。毓筠折回南京，再由第一軍長柏文蔚率隊護送，於十二月二十一日抵省就職，委桂山峯爲軍政司長，胡萬泰爲總司令，洪朗齋爲民政司長，黃書霖爲財政司長²⁴。各地都督蕪湖吳振黃、廬州孫萬乘、大通黎宗嶽等先後皆以武力迫使取消，惟穎亳間尙爲前清安徽布政使倪嗣冲所據。一九一二年六月，孫毓筠因病請假，七月一日以柏文蔚爲安徽都督²⁵。

柏文蔚，安徽壽州人，少與孫毓筠共謀革命。一八九九年入安徽大學堂，嗣又入武備練軍學堂，與趙聲、熊成基、倪映典、陳獨秀、張孟介、劉師培等相結，初入光復會，又入同盟會。辛亥南京光復後，任第一軍長²⁶。文蔚任都督後，以鄭芳蓀爲總務司長，黃書霖爲財政司長，鄧神侯爲教育司長，劉梧桐爲實業司長，吳霖生爲軍政司長，徐子駿爲參謀長，陳獨秀爲秘書長。文蔚在都督任內，袁世凱先後派鄭汝成、段祺瑞、江朝宗等前來拉攏，文蔚虛與委蛇而已²⁷。

安徽歷任都督，除朱家寶外，皆同盟會員。故同盟會能在安徽獲穩固的勢力。參議員選舉，於十席中得九席；眾議員選舉，於二十七席中得十席。

浙江 浙江爲光復會活躍的省區，光復會的重要領袖徐錫麟、秋瑾雖於一九〇

²² 「辛壬春秋」安徽第十六頁一～六。

²³ 「袁世凱竊國記」頁二〇～二四。

²⁴ 「各省光復」（中）頁二五七。

²⁵ 「辛壬春秋」安徽第十六頁六～八。

²⁶ 柏烈武先生事略，「安徽文獻」第四卷第一期，民國三十七年元月。

²⁷ 「各省光復」（中）頁二九七～三〇〇。

七年遇難，其餘黨仍以浙江為活動基地。武昌革命事起，浙江震動。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新軍八十一標、八十二標，以及由光復會人王金發、尹志銳、尹維俊等所組的敢死隊攻撫署，巡撫增韞逃，諮議局副議長陳時夏等草擬浙江光復通電和佈告，推滬杭甬鐵路局總理湯壽潛為都督，以諮議局議員褚輔成為民政部長，八十二標標統周承茲為軍政部長。十一月十五日，遣兵三千，以朱瑞為總司令，與蘇軍會攻南京²⁸。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湯壽潛為交通總長，湯檄各方選代表，公舉蔣尊簋為都督。蔣字百器，浙江人，光復會員，日本士官學校畢業，一九〇七年歸國，任浙軍第二標標統。武昌革命爆發時，在廣東任標統（或云協統），粵省光復，曾任臨時都督。及粵省正式舉出都督，蔣退職離粵赴浙，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受任為水陸軍總統。及湯壽潛任交通總長，浙督人選，或推蔣尊簋（浙江旅滬協會、旅滬寧波同鄉會、湖州旅滬同鄉會等），或推陶成章（金華軍界李傑等、衢州軍界章明新等、嚴州軍界陸金棧等、杭州巡防部黃忠義等），終於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一日，由臨時省議會代表、光復會員代表、參議部代表，合選蔣任都督。蔣任都督半年，至一九一二年七月，以朱瑞為都督²⁹。

蔣尊簋、朱瑞皆光復會員，蔣在廣東受同盟會排擠，雖同為民軍，未必能與同盟會推誠合作。朱瑞係保定軍校畢業，與段祺瑞有師生關係，早在南北議和之際，即向段密通消息，表示擁護袁世凱上台³⁰。雖屬民軍，亦不可能推誠支持同盟會。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後，多方拉攏，大體仍能獲得國會選舉的勝利，於十席參議員中得五席，三十八席眾議員中得二十五席。

福建 福建在光宣年間為同盟會人活躍之地，一九〇六年同盟會人組「橋南公益社」為掩護（當時福州的社團另有普明社、益聞社、啟明社等），鄭祖蔭主之。一九一〇年冬，曾與立憲派人林長民、劉崇佑等合辦建言報，劉通、張冠瀛任編輯，以宣傳革命為主。武昌革命爆發時，福建同盟會總機關部的組織已相當健全，計總務部：鄭祖蔭、黃光弼、李恢，文書部：陳星侯（慎侯）、黃魯貽、劉通（伯仁），交際部：林溫如、林徽蓀、李啟藩，財政部：莊壽松、陳秀榕，交通部：劉翰侯、趙桐友（桐官），庶務部：王鴻滋、陳景松，軍務部：馮秀山、吳必震，執

²⁸ 「辛壬春秋」浙江第十四頁一～三，「辛亥革命回憶錄」（一）頁一三九。

²⁹ 「辛壬春秋」浙江第十四頁三；「各省光復」（中）頁一七一～一七三。

³⁰ 「辛亥革命回憶錄」（一）頁二〇〇～二〇一。

法部：鄭祖蔭、吳必震，偵探部：林亞傑、陳韶受²³¹。

福建除有同盟總機關部以外，另有軍警特別同盟會，彭壽松（湘人）主之。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八日，壽松等聯合新軍第二十協起事，推協統許崇智（粵人）為總司令。閩浙總督松壽聞訊自殺，旗兵起與革命軍抗，新軍第十鎮統制孫道仁（湘人，同盟會員）調軍攻旗兵，事遂定，十二日彭壽松約集橋南公益社同志籌組軍政府，推孫道仁為都督，陳承澤任秘書。都督府的組織：

參事會（或謂為政務院）：以彭壽松為會長，林斯深、鄭祖蔭副之，參事員有劉通、黃光弼、林曉、陳景松、宋淵源、陳承澤、李恢。

民政部：以高登鯉為部長，劉松生副之（旋讓林森）。

外交部：以林長民為部長（旋讓陳能光），林樹棻副之。

財政部：以陳之麟為部長，蔡法平副之。

軍務部：以林之夏為部長，蕭其斌副之。

司法部：以鄭烈為部長，梁繼棟副之。

教育部：以黃展雲為部長，劉以鍾副之。

交通部：以黃乃裳為部長，潘訓初副之。

警務部：以翁浩為部長（旋由李倬繼任），熊丙生副之。

其中高登鯉、陳之麟為諮議局議員，非同盟會會員，餘皆同盟會會員。十三日，孫道仁就職，鄭祖蔭代表同盟會授都督印²³²，可以看出當時同盟會可以控制福建的局勢。日後由於民主黨勢力在福建發展，使國民黨在二十四席的眾議員選舉中僅得七席，但在參議員選舉中，卻能於十席中得七席。

湖北 武昌革命是文學社和共進會共同策動的，兩會在湖北新軍中極佔勢力。事起之後，得諮議局的支持。當時同盟會的重要人物無一在場，共進會的領導人孫武於事發前夕受傷，文學社的領導人蔣翊武調防在外，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倉卒起事的士兵和下級軍官，只好推新軍協統黎元洪為都督。元洪初不應，共進會人蔡濟民、高尚志、李作棟，文學社人陳磊等共十餘人推之至諮議局，由議員沈維周接見，蔡等提出三事：①借諮議局設軍政府，②請議長湯化龍擔任政治工作，③請諮

²³¹ 「各省光復」（中）頁三〇九、三二四～三二六，三三一～三三二；「辛亥革命回憶錄」（四）頁四五五；「革命之倡導與發展」（四）頁八六～八七。

²³² 「辛壬春秋」福建第十四頁一～三；「各省光復」（中）頁三〇八、三一、三四六；「辛亥革命回憶錄」（四）頁四五七～四六四。

議局接收武漢財政機關。沈不能決，偕陳磊往訪湯化龍，化龍即約副議長張國溶、夏壽康，議員阮毓崧、劉賡藻、胡瑞霖等至諮議局²³，共推元黎為都督。

黎元洪與革命黨無淵源，武昌革命後的局勢全由共進會和文學社控制。初組謀略處，共進會人蔡濟民、吳醒漢、鄧玉麟、高尙志、徐達明、陳宏誥、謝石欽，文學社人張廷輔、王憲章、王文錦等共十五人任謀略。十月十二日分設各部：

參謀部：部長楊開甲（新軍軍官），吳兆麟（新軍軍官）副之。

軍務部：部長孫武（共進會領袖），蔣翊武（文學社領袖）副之。

政務部：部長湯化龍（諮議局議長），張知本（共進會員）副之。

外交部：部長胡瑛（文學社員），王正廷副之。

軍令部：部長杜錫鈞（新軍軍官），張振武（共進會員）、蔡紹忠副之²⁴。

可以看出湖北軍政府是由共進會和文學社員聯合新軍軍官和諮議局人共同組織的。

湖北既為首義之區，革命勢力本甚盛，因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初，未注意安插湖北方面人士，致引起地域之爭。孫武起而組民社，聯合部分共進會、同盟會分子擁護黎元洪。黎元洪一直與袁政府接近，先後以共和黨、進步黨理事長的名義，對同盟會及國民黨的活動多所遏制。一九一二年夏秋間，湖北有國民黨、共和黨兩派之爭，湖北共和黨由孫武實際領導，因受黎元洪翼護，頗佔優勢。嗣曹亞伯自英國回，入黎幕府贊勳機要，國民黨大得其助力，卒為共和黨所排²⁵。正式國會選舉，國民黨在湖北不及共和黨，孫中山派胡秉柯回鄂部署，略能挽回頹勢²⁶。鄂省參議員選舉，國民黨於十席中得六席，但眾議員選舉，卻於二十六席中只得九席。

湖南 湖南的革命活動始於一九〇三年的華興會成立。華興會事敗後，其領袖人物黃興、宋教仁東渡，成為同盟會的重要領袖。一九〇六年，禹之謨在長沙設同盟分會，是年哥老會人受同盟會影響，於萍瀏醴一帶發動，聲震湘贛二省。一九〇七年由同盟會分出共進會，此後湖南成為共進會的活動地區。共進會以運動新軍、會黨為主，在湖南尤側重於會黨的運動。共進會在湖南運動會黨的是焦達峯，焦為湖南瀏陽人，一八八六年生，家務農，為華興會員。一九〇六年參加萍瀏醴之役，事敗亡命日本，入私立東斌學堂習軍事，後回湘策劃革命，聯絡洪江會黨（屬哥老

²³ 「武昌首義」頁三四九。

²⁴ 蔡寄鷗「鄂州血史」頁九二、九五。

²⁵ 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頁六六。

²⁶ 同上，頁一〇八。

會)組「四正社」，以心正、身正、名正、旗正為號。一九〇九年秋，洪江會龍頭大哥三十餘在瀏陽集會，焦於會中被推為龍頭大哥，手下可資號召的會眾十餘萬。除會黨外，焦亦注意巡防營與新軍的運動，辛亥湖南獨立時，新軍中的易堂齡、楊玉生、朱先杰、劉玉堂等，巡防營中的甘興典、袁國瑞、趙春霆等，都是參加的²³⁷。

不過，辛亥湖南獨立，不能忽視立憲派的力量。像湖北立憲派人湯化龍與革命派人劉堯激等周旋並捐款資助文學社一樣，湖南的立憲派人黃鈇給革命派人陳作新三百兩銀子去運動軍隊²³⁸。湖南的立憲派以諮議局議長譚延闓為首。武昌革命爆發後，譚延闓曾於十月二十日訪中路巡防營統領黃忠浩，希望他起兵，黃以事無把握拒之。次日，焦達峯、陳作新約新軍起事，中路巡防營兵變，巡撫余誠格逃，黃忠浩被殺，乃推焦達峯為正都督，陳作新為副都督。焦以同盟會人曾杰為秘書，譚人鳳為顧問。立憲派人欲起而奪權，一面要求請譚延闓任軍政部長，一面組織參議院，以譚延闓為院長。參議院操立法大權，凡募兵給餉、任免官吏及將校，皆須經參議院可決，方得施行。曾杰、譚人鳳等欲集權都督，十月三十一日召開會議，決定取消軍政部及參議院。之後，立憲派人即聯合黃忠浩餘黨發動政變，殺焦、陳，擁譚延闓為都督²³⁹。

策動此次兵變者為諮議局中人，早在湖南光復之初，一般諮議局議員即欲推譚為都督。焦、陳任正副都督後，諮議局議員即四出誹謗，並挑撥新舊軍的關係，副議長陳樹藩尤為出力。及譚被推為都督，即以陳樹藩為財政廳長²⁴⁰，大量引用立憲派人，並派唐乾一駐北京，專門和湯化龍聯絡²⁴¹。

譚延闓任都督後，湖南的同盟會勢力仍然很盛。湖南的同盟會初由司法司長洪春台領導，洪死後，同盟會北京本部派仇鰲回湖南發展黨務，籌辦國會選舉。仇到湖南，一面聯絡同盟會員和其他革命派人士，一面聯絡清末的殘餘黨派憲友會和辛亥俱樂部的成員，很獲成效。譚延闓就是在此時加入國民黨的。一九一二年九月下旬，國民黨湖南支部成立，推譚延闓為支部長，仇鰲為副支部長。仇並任湖南民政

²³⁷ 「辛亥革命回憶錄」(一)頁二一一~二一二。

²³⁸ 李時岳「辛亥革命時期兩湖地區的革命運動」頁二〇~二一。

²³⁹ 「辛壬春秋」湖南第五頁一~五；李時岳「辛亥革命時期兩湖地區的革命運動」頁九九~一〇五。

²⁴⁰ 「辛亥革命回憶錄」(一)頁一五二。

²⁴¹ 同上，頁一五三~一五四。

司長。民政司是主辦全省選舉的機關，民政司長是法定選舉總監督，各區的分監督也是由民政司選派的，主辦一縣選舉的縣長兼任選舉監督，縣長亦是由民政司委派的，而由湖南支部派往各縣組黨的人，亦直接代表黨來競選，故湖南的選舉可完全由國民黨來掌握。仇鰲到了民政司，先把各縣縣長作了一番調整，隨後派出了五區的選舉監督，一區龍璋，二區蘇鵬，三區唐璧，四區戴展誠，五區黃右昌。於是省、縣、區的選舉負責人聯為一氣，加上各縣國民黨組織的協助，所以湖南的選舉，從國會、省議會一直到各縣議會，國民黨的候選人，都以很高的比例當選^②。參議員十席全由國民黨獲得，眾議員二十七席，國民黨獲得二十三席。不過，由於許多國民黨人來自立憲派和舊官僚，對國民黨的主義並無認識，對國民黨的向心力是很弱的^③。

四川 四川地雖偏僻，光宣年間亦有同盟會人活躍其間。一九一一年四川保路風潮起，予革命以可乘之機。十一月二十一日同盟會人在重慶宣佈獨立，成立蜀軍政府，推中學堂監督張培爵為都督，夏之時為副都督，佐之者有楊庶堪、謝持、方聲濤、但懋辛等。二十七日立憲派人據成都獨立，成立大漢四川軍政府，推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為都督，新軍統制朱慶瀾為副都督。十二月八日成都兵變，蒲殿俊出走，舉新軍標統陸軍小學堂總辦尹昌衡為都督，與哥老會有密切關係的羅倫為副都督。尹昌衡，四川彭縣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隸籍同盟會，既為都督，引同盟會人董修武、王禕昌、周炯伯等佐之。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成渝兩軍政府合併，舉尹昌衡為都督，張培爵為副都督，羅倫為參議院長，夏之時為重慶鎮撫府總長。夏之時旋出洋留學，重慶鎮撫府總長由胡景伊繼任。是年七月，藏人侵川邊，尹昌衡統兵西征，袁政府以胡景伊權都督，張培爵為民政長。一九一三年四月，川邊定，袁政府改任尹昌衡為川邊經略使，正式以所信任的胡景伊為川督。時尹已傾心於袁，張培爵被袁殺害，四川遂為袁政府所控制^④。不過，國民黨在參眾兩院的選舉中仍能獲得一半的席位，於參議員十席中得五席，於眾議員三十五席中得十七席。

② 「辛亥革命回憶錄」(一)頁一七八～一八二。

③ 同上(一)，頁八七。

④ 「辛壬春秋」辛壬政記第一下頁十七，四川第二頁十三～十八；「各省光復」(中)頁八五～八六；何重仁「辛亥革命時期四川從保路到獨立的經過」，「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一集，一九五四年七月出版。

(3) 華北

華北六省，同盟會人在陝西、山西、山東三省勢力較強，直隸、河南、甘肅三省勢力較弱。然以華北民性保守，地又多在袁世凱北洋軍控制之下，即原來同盟會勢力較強之區，入民國後，亦漸為袁政府所控制。

直隸 直隸雖為京畿所在地，革命勢力亦早滲入此地。最早在一九〇五年前後，直隸留日學生張繼、呂復、王觀銘等在東京加入同盟會。其後到一九〇九年湖北革命黨人胡鄂公等在保定組織共和會，參加者多保定各學堂學生及第六鎮士兵，後北京、天津等地亦設分會。一九一一年十月，汪兆銘、李煜瀛等在天津設同盟會京津分會，以民意報、國光新聞、國風日報為宣傳機關，對促進清帝退位，甚有貢獻²⁴⁹。不過，入民國後，直隸為袁世凱坐鎮之地，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間先後任直隸都督的馮國璋、趙秉鈞皆袁的心腹，地方勢力較接近於擁袁的進步黨是必然的。不過在國會議員選舉期間，適逢國民黨與袁關係較好時期，國民黨在直隸，仍能於十席參議員中得五席，四十六席眾議員中得廿二席。

山東 山東在武昌革命爆發前，同盟會人即在各地活動。武昌革命爆發後，諮議局議長夏繼泉聯合軍警商學界人組聯合會，目的在求自保。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同盟會人運動下，新軍第五鎮部分軍官迫聯合會宣佈獨立，推巡撫孫寶琦為都督，新軍協統賈賓卿為副都督。不久，袁世凱舊識候補直隸州張廣建、候補知縣吳炳湘運動第五鎮另一部分軍官標統張樹勳等，迫孫寶琦取消獨立。是月二十四日，都督改為巡撫，清廷旋以張廣建為布政使，吳炳湘為巡警道²⁵⁰。山東取消獨立後，革命派人士分為兩派，一派主張赴南方參加軍政府，推謝鴻燾（山東人，同盟會員，主辦東牟中學）、雷光宇（湖南人，孫寶琦的幕賓）為代表；另一派主張赴北方，聯合京津一帶革命志士，相機進行，推原屬立憲派人士夏繼泉、丁世嶧為代表²⁵¹。嗣胡建樞繼孫寶琦為都督，大捕革命黨人，十二月二十日黨人杜潛在烟台獨立，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五日黨人徐鏡心在登州獨立，南京臨時政府嗣亦以胡瑛為山東都督北來，然民軍勢力不過數縣，不能與濟南方面的清軍抗。及清帝退位，南北統一，政府以周自齊為山東都督²⁵²。周為袁系人物，自是山東即在袁世凱的直接控

²⁴⁹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頁三三六，三四四～三四六，六七七。

²⁵⁰ 「辛壬春秋」山東第二十頁一～二。

²⁵¹ 「辛亥革命回憶錄」(五)頁三一三～三一四。

²⁵² 「辛壬春秋」山東第二十頁三～四。

制之下。國會議員選舉，國民黨於十席中得五席，眾議員選舉，於三十三席中得十四席。

河南 河南同盟會人無多，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同盟會人張鍾瑞以為各省皆獨立，河南獨否，以為恥，乃與學堂學生及仁義會黨各數百人，煽動巡防軍，密謀起兵，事洩，被捕十餘人，皆處死²⁴⁹。及南北統一，河南改巡撫為都督，歷任都督齊耀琳、張鎮芳皆忠於袁，故河南在民初亦直接在袁世凱的控制下。國會議員選舉，國民黨雖於十席參議員中獲六席，但於三十三席眾議員中卻只獲十一席。

山西 光宣之際，山西的同盟會人居領導地位者為新軍標統閻錫山。閻，山西五台人，出身地主之家，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在日加入同盟會之軍人組織「鐵血丈夫團」。回國後服務於山西新軍，累升至標統。武昌革命爆發時，山西新軍第四十三混成協駐太原，協統譚振德，轄八十五標和八十六標，八十五標標統是黃國梁，八十六標標統是閻錫山。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新軍管帶姚以价起兵，殺巡撫陸鍾琦，推閻錫山為都督，陸軍小學堂監督溫壽泉為副都督，諮議局副議長杜上化為總參議，設軍政府於諮議局。清廷命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率兵入晉，並授祿貞以山西巡撫。祿貞為同盟會人，十一月四日與閻錫山密約，會於娘子關，合組燕晉聯軍，吳任聯軍大都督兼總司令，閻任聯軍副都督兼副總司令，溫壽泉任聯軍參謀長。七日，吳祿貞被暗殺，清廷以張錫鑾為山西巡撫，許世英為山西布政使，以第三鎮統制曹錕率協統盧永祥攻山西，閻錫山棄太原北去，溫壽泉率敢死隊南下，盧永祥據太原，張錫鑾就巡撫任。不久，錫鑾轉就東三省總督，而以按察使李盛鐸權巡撫²⁵⁰。

清帝退位後，袁世凱在北京組臨時政府，日籠絡革命黨人，令第三鎮兵調離太原。閻錫山欲自晉北返回太原，遣孔庚至北京疏通，透過袁世凱的秘書長梁士詒，輸金四十萬，遂得被任命為山西都督。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錫山自忻州返太原，組織省政府，成立臨時省議會。臨時省議會由同盟會人王用賓等籌組，每縣出議員一人，推杜尚化為議長，王用賓、陳受中為副議長。省政府人選，谷如墉為民政司長（周渤曾任之），張瑞璣為財政司長，狄樓海為教育司長（解榮略曾任之），劉綿訓為司法司長，梁濟為實業司長（張聯魁曾任之），崔廷獻為內務司長，喬義生

²⁴⁹ 同上，直隸河南東三省甘肅第二十三頁一～二。

²⁵⁰ 「辛壬春秋」山西第六頁一～六；「近代史資料」，一九五七年第五輯頁二〇、三五～四〇、五七；「辛亥革命回憶錄」(五)頁一六九～一七二。

爲外交司長，景定成爲稽勳局長，邵修文爲高等審判廳長，王懋昭爲高等檢察長，南桂馨爲巡警道^⑮。

閻錫山既與袁世凱相結，卽刻意排擠同盟會人。時同盟會人在運城組河東軍政分府，由李鳴鳳掌軍，張士秀掌政，閻欲收河東財富，並打擊同盟會勢力，派南桂馨爲河東籌餉局長，張、李將南扣押，閻指張、李抗命，袁世凱卽電令駐豫毅軍統領趙倜率軍將張、李拿解進京，河東同盟會的軍事勢力遂告消滅^⑯。山西在民國初年成爲親袁的省份，實因閻錫山趨於妥協之故。可能由於這個原因，國民黨在二十八席眾議員選舉中雖得十四席，在十席參議員選舉中卻只得二席。

陝西 光宣之際，陝人于伯循在上海辦報宣傳革命，風聲所播，影響鄉里至大。陝西的革命勢力有兩派，一派爲同盟會，其會員任軍官、教員及政府職務者不少，一派爲哥老會，其會員多農工羣眾及下層士兵，由於哥老會人多不識字，他們的組織和宣傳方法與同盟會異，只有排滿的目標是一樣的^⑰。一九一〇年七月，同盟會人和哥老會人在西安大雁塔結盟，共謀革命，他們的領導人物分佈於陝西新軍中。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新軍督隊官錢鼎（同盟會兼哥老會）、與二標一營管帶張鳳翹（同盟會）、三營管帶張益謙等起兵，陸軍學堂號兵張雲山（哥老會首）率其徒數千人助戰，巡撫錢能訓走避，遂組織軍政府，設大統領：

秦隴復漢軍大統領張鳳翹（陝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同盟會員，新軍管帶）

秦隴復漢軍副統領錢鼎（陝人，陸軍速成學堂畢業，同盟會員，哥老會員，新軍督隊官）

秦隴復漢軍副統領張益謙（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新軍管帶）

大統領以下的組織：

總務府	{	參政處長郭希仁（同盟會員，諮議局副議長）
		參議處長張靖清（二標教練官）
		秘書廳長李子逸
		銓敘局長張衡玉

^⑮ 「近代史資料」，一九五七年第五輯頁四一、五七；「辛亥革命回憶錄」(四)頁一七六～一七七；「各省光復」(上)頁二五三。

^⑯ 「辛亥革命回憶錄」(四)頁一七六～一七七。

^⑰ J. C. Keyte, *The Passing of the Dragon*, pp. 23-24.

軍政部長黨自新（同盟會員，新軍砲隊隊官）

財政部長張靖遠

民政部長楊鼎臣

外交部長宋相臣（留學日本）

教育部長曹雨亭

實業部長張聚庭

司法部長黨松年

交通部長南雪亭

軍官方面有：

調遣兵馬都督張雲山（哥老會首，司號）

副都督吳世昌（哥老會員，新軍正目）

糧餉都督馬玉貴（哥老會員，新軍正目）

副都督馬福祥（哥老會員，新軍隊官）

軍令都督劉世杰（哥老會員，新軍工程隊正目）

副都督郭勝清（哥老會員，新軍正目）

第一標統劉剛才（哥老會員，新軍正目）

第二標統朱漢庭（哥老會員，新軍正目）

第三標統郭錦鏞（哥老會員，新軍正目）

第四標統丘彥標（哥老會員，巡防隊哨官）

第五標統鄧占雲（哥老會員，任職巡防隊）

第六標統余晉海（哥老會員）

四路總稽查朱福勝（哥老會員，新軍伙夫）

大統領衛隊統帶陳殿卿（哥老會員，新軍護兵）

大體言之，軍事操於哥老會之手，政治操於同盟會之手，雙方明爭暗鬪，同盟會人井勿幕等曾請湖北方面派軍驅逐哥老會勢力^②，沒有結果。到清帝退位後，張鳳翽逐漸平定各方，完成陝西統一，哥老會勢衰。唯張鳳翽此時像閻錫山一樣，已與袁世凱妥協。同盟會改爲國民黨後，仍極力在陝西發展勢力，參議員的選舉，國民黨於十席中得五席，眾議員的選舉則於二十一席中得二十席。

^② 「辛壬春秋」陝西第四頁一～三；「辛亥革命資料」頁六〇三；「辛亥革命回憶錄」（一）頁一五四～一五五，（二）頁一、一〇八～一〇九；「辛亥革命」頁四二；「各省光復」（上）頁五二。

甘肅 甘肅向少同盟會勢力，辛亥陝西獨立，甘肅一度派兵擊之。清帝退位後，布政使趙惟熙奉命為都督。甘肅自是為袁政府所控制²⁵，同盟會和國民黨僅在民間活動。參議員選舉，國民黨於十席得四席；眾議員選舉，於十四席中得七席。

(4)東三省與新疆

東三省與新疆為邊陲地區，但亦有同盟會人活動其間。民初，東三省及新疆雖在袁政府控制之下，但國民黨仍在民間發展勢力。

奉天 奉天在武昌革命爆發前夕，有革命、立憲、保皇三大勢力，立憲派以諮議局為代表，保皇派以巡防營統領張作霖為代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諮議局議長吳景濂聯合新軍總統伍楨祥擁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組保安會。同盟會人張榕等一度入保安會，謀與立憲派共謀革命，繼而別組急進會推動之，而新軍協統藍天蔚（同盟會）則自號關東大都督。嗣張作霖迫趙爾巽解散諮議局、急進會，張榕等事敗被殺，藍天蔚赴煙台指揮軍事²⁶。清帝退位，趙爾巽、張錫鑾先後為奉天都督，二人為袁系人物，趙且隸共和黨，奉天遂為袁世凱所控制。同盟會及其後的國民黨，則於民間發展勢力。國會選舉，國民黨於十席中得五席，眾議員選舉於十六席中得十一席。

吉林 吉林亦有同盟會人，但勢力不大。武昌革命爆發後，同盟會人在吉林圖大舉，然應者很少²⁷，吉林巡撫陳昭常在趙爾巽的影響下，於十一月十六日組保安會²⁸。清帝退位後，陳受命為都督。陳同情共和黨。關於地方議會，則以諮議局為核心，重加組織²⁹。其後國民黨極力在吉林活動，參議員選舉，於十席中得八席；眾議員選舉，於十席中得五席。

黑龍江 黑龍江受趙爾巽影響，於十一月十七日組保安會³⁰。時俄人煽動蒙古獨立，黑龍江之呼倫亦受其影響而宣佈獨立³¹。清帝退位，黑龍江巡撫宋小濂受命為都督。宋與趙爾巽為親交，其政治傾向與奉天、吉林為一體。惟同盟會及其後的

²⁵ 「辛壬春秋」直隸河南東三省甘肅第二十三頁四。

²⁶ 「辛壬春秋」第二十三頁二~四；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頁二〇六~二一〇。

²⁷ 「辛壬春秋」第二十三頁四。

²⁸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頁二一〇。

²⁹ 民國元年四月十日「順天時報」七版，十八日「順天時報」二版。

³⁰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頁二一〇。

³¹ 「辛壬春秋」第二十一頁十，第二十三頁四。

國民黨，仍在民間發展勢力。參議員選舉，國民黨於十席中得八席，眾議員選舉，於十席中得五席。

新疆 新疆有二行政中心，一為迪化，設巡撫；一為伊犁，設將軍。武昌革命爆發前後，兩地皆有同盟會人活動其間。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九日，伊犁同盟人郝可權等嗾新軍起兵，推前將軍廣福為新伊都督。新疆巡撫袁大化聞訊，遣軍攻之。清帝退位，袁世凱電大化息兵，大化憤而辭職，政府以喀什喀爾道袁鴻祐為都督，迪化道楊增新為布政使。嗣亂兵戕袁鴻祐，袁政府以楊增新為都督。增新為雲南人，既為都督，雲貴黨人多往投效，但楊完全服從中央^②，使同盟會及國民黨只能在民間發展勢力。參議員選舉，國民黨於十席中得三席，眾議員選舉於十席中得五席。

(5)綜合分析

前述二十二省，就都督的政治傾向而論，廣東、江西、安徽、福建、湖南五省屬國民黨一派，雲南、貴州、湖北三省屬進步黨一派，廣西、江蘇、浙江、四川、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甘肅、奉天、吉林、黑龍江、新疆十四省屬於袁世凱一派。擁政府派佔十七省，反政府派佔五省。

就國會的選舉結果而論，國民黨在廣東、廣西、雲南、江西、安徽、浙江、湖南、陝西、奉天、吉林、黑龍江十一省佔優勢，進步黨（或擁袁派）在貴州、江蘇、福建、湖北、四川、直隸、山東、山西、甘肅、河南、新疆十一省佔優勢。國會選舉，國民黨之所以能在許多屬於進步黨或袁世凱一系的省份中獲勝，約有兩個原因：其一、國民黨新組成，其組織力和運動力較統一、共和、民主三黨為強。其二、國會選舉期間，正是國民黨極力拉攏舊官僚和袁世凱的時候，也是雙方關係最好的時候，擁袁派對國民黨尚沒有很大的敵意。

無論如何，在國會選舉揭曉以前，國民黨雖與袁政府對立，但勢均力敵的態勢沒有形成。真正形成勢均力敵的態勢是在國會選舉揭曉以後，儘管反袁派的都督數僅及擁袁派都督數的三分之一弱，但國會選舉優勝的省數，雙方各得十一，已不相上下。最重要的是，兩院議員的總數，國民黨籍者居優勢，使國民黨的反對派，不得不重新結合。地方勢力影響中央政治，此為最顯著的例子。

^② 同上，新疆第十九頁一～七。

五、結 論

民初國民黨與進步黨的對抗，歷史的意義大於社會的意義，人的因素大於黨義的因素。嚴格說來，同盟會放棄了民生主義、男女平權等激進的政綱，與許多政團合組為國民黨，如果不是歷史的和人爲的因素，共和、統一等黨亦未必不可與合併。但由於共和黨主要是由革命派（民社）分出對抗同盟會者，統一黨主要是由同盟會分出（章炳麟）對抗同盟會者，各結合了立憲派、官僚派，甚至軍人。民主黨直接由立憲派蛻變而來，承襲着清末立憲、革命兩派對抗的傳統，繼續與同盟會對抗，並結合官僚派以厚實力。袁世凱因利乘便，拉攏共和、統一、民主三黨對抗同盟會及由同盟會改組而成的國民黨，乃形成民初政壇上兩大對峙的勢力。

民初兩大對峙的政治勢力肇始於清末。清末立憲派與革命派對峙，立憲派欲依附清政府，但清政府與立憲派之間的距離很大，特別是因為康梁為戊戌禍首，他們所領導的立憲運動始終受敵視。後來清政府雖欲採行立憲措施，與康梁以外的立憲派人接近，但由於清政府的憲政措施迂迴而保守，不能滿足立憲派人的希望，立憲派與清政府之間實際上也是對立的。民初進步黨與國民黨對峙，進步黨欲依附袁政府，袁政府與進步黨的距離較小，至少在表面上甚願與進步黨接近，特別在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十一月國民黨被解散以前。

清末立憲派保皇，革命派排皇，雙方勢同水火。武昌革命爆發後，革命黨人遂有仇殺保皇黨之舉。此舉雖在打擊保皇勢力，但顯干民國法紀，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曾於一月廿八日電各省禁止之，禁令中有云：

近聞各省時有仇殺保皇黨人事，彼黨以康梁為首，棄明趨暗，眾所周知，然皆受康梁三數人之蠱惑，故附和入會者，尚不解保皇名義，猶之赤子陷穽，自有推墮之人，受人欺者自在可矜之列。今茲南紀肅清，天下曠蕩，舊仇汚俗，咸與維新。法令所加，祇問其現在有無違犯，不得執既往之名稱以為罪罰。至於挾私復怨，藉是為名，擅行仇殺者，本法之所不恕^⑤。

由此禁令可知，清末立憲、革命兩派，到民國成立後，由於積怨甚深，頗難和衷共濟。另一方面，在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革命風潮中失位的中央和地方大吏，如

^⑤ 禁止仇殺保皇黨人電，民國元年一月廿九日「臨時政府公報」第一號。

盛宣懷、李準、張彪、張鳴岐、李經方等，此時一度與滯留日本的梁啟超有所聯絡^⑧，此更壯大了同盟會的反對勢力，也使同盟會警覺。

同盟會除與立憲派有宿怨外，在武昌革命爆發後不久又與袁世凱及其所代表的北洋軍人和官僚集團處於對抗之中。袁任清內閣總理，假擁清帝以自重，欲獲民國總統之位。時同盟會總理孫中山在南京組臨時政府，與清政府對抗。後雖因袁世凱迫清帝退位，孫中山讓臨時大總統之位給袁，使南北歸於統一，由於北京政府大體仍以滿清時代的軍人和官僚為班底，與同盟會間始終格格不入。在這種情形下，自革命派游離而出的政治勢力，以及早年與革命派對立的立憲派勢力，轉與袁政府結合，對抗同盟會和國民黨。

在民初的政黨結合中，國民黨以及與國民黨接近的黨派為一極端，袁政府以及與袁政府接近的進步黨等為另一極端，雙方狐疑仇視，終釀暴亂。國民黨籍參議院議長張繼有論云：

今天民黨有恒言，如袁黨得專政柄，必至共和掃地，帝制復興，端人正士，無一在位。而袁黨亦有恒言，如民黨得勢，必至彼黨外無噍類，暴民之禍，亙古未有。此種兩極端之恐慌，皆無從以言語口舌去其迷信。……民黨之分子，與袁黨之分子，兩相比較，平心而論，文采經驗，威儀舉動，皆後勝於前。……民黨之學術，偏於進取，以為鎖國之策，既不可行，必追逐他人之後，齊其步伐，始能與羣強競存，如此必當有一真正之憲政，始自由強固，而進步奮迅。……袁黨之學術，偏於保守，茫然於世界之大勢，惟迷信其所挾持之保育政策，因彼皆自譽有老練之經驗，盡以少年為躁妄，故力任父兄之責，貿貿然願保育其子弟^⑨。

此兩極端，可以說自南北議和以後，雙方未能真正化解，積漸有以致之。

對抗的態勢既然形成，國民黨謀求訴於選民，希望能透過國會選舉的勝利，在政治上取得優勢。但袁政府及進步黨都不相信選民，持官僚和軍人集團為靠山，與國民黨對抗。國民黨與官僚和軍人集團的淵源，遠較袁政府和進步黨為淺，國民黨雖亦拉攏官僚，且自樹些許武力，但與袁政府和進步黨相較，自然相形見絀，這是國民黨與袁政府爭，無法獲得成功的最大原因。

^⑧ 民國元年一月廿一日「天鐸報」，梁啟超黨惡。

^⑨ 「張溥泉先生全集」頁五五～五六，公私之別。